

從立法會補選到特首推選 官商壓榨市民苦上加苦



簡評中共「十五」計劃

工人維權鬥爭多

中國貿易是「黃禍」？

2000年美國大選 英工黨醫療服務私有化

巴勒斯坦特輯 工人階級推翻米洛索維奇

反全球化青年運動 世貿組織損你健康

評《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

公安惡法 必須修改！

軍行

特區政府以違反《公安條例》罪名拘控學聯代表，進一步激發出反對公安惡法的鬥爭，要求加以重大修改。香港各界人士（包括大律師公會）所齊聲譴責的它的主要錯誤是：

一、現行的《公安條例》，在97年臨立會修訂後，規定港人在公眾遊行或集會舉行前必須得到警方發出的「不反對通知書」（遊行人數不超過30人、集會人數不超過50人的，可予豁免）。

這就授予警務處長以批准權，是95年實行的《公安條例》所沒有的，表明回歸後警方在這方面的權力反而是大大膨脹，有權剝奪市民的應有遊行、集會權利。而且，97年的臨立會修訂，對於警方反對及禁止遊行和集會的「理由」，還增加了「國家安全」以及「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兩項，亦即增加了剝奪市民有關權利的更多藉口。

二、規定遊行集會須於7日前以書面通知。這個時限太長，既無必要，實際上只是要障礙遊行集會的進行，對於許多突發的緊急事件需要盡快舉行的遊行集會，將受到不必要的阻礙。例如工會因追討欠薪等而急需舉行的集會遊行，便會因這種規限而延誤。如果不足7日通知而急需遊行集會，警方便有藉口視之為「非法」，並加以控告。

三、條例規定，被指控為「非法集會」的組織者和參加者的最高刑罰是判監5年。這是非常嚴厲而絕不合理，違反《國際人權公約》甚至《基本法》的。保安局長以這項規定早在1967年已引入來作辯解。但當時是港英殖民地統治，香港的「左派」響應國內的「文革」運動，在香港進行反英暴動，以武力對抗英帝國主義者。港英這種鎮壓條例是反動的。歷史已過去了30多年，香港在回歸後已成為「社會主義」中國的一部份，港人已被宣傳是「當家作主」了，而且事實上，警方也宣稱已有6,000多宗遊行集會，幾乎都是和平進行的。保安局長以上述「理由」作辯護，等於無視了當時與今天的極大不同情況，又等於肯定了當時這樣規定也是需要和合理的，因而堅持要效法

英帝的殖民地政府鎮壓中國人民的殘酷手法，繼續採用來對付港人。這樣的苛例如不加以改變，就是要死硬堅持錯誤，拒絕任何正確、合理的批評意見。

但是，以保安局長為代表的回應，一方面，是發動親政府的社團起來響應它的堅持絕不修改公安條例，連大埔兒童合唱團也表態反對修法；而且，「其中部份團體的負責人，根本不知道所屬組織向立法會已遞交了（反對修法的）意見書（11月18日《星島日報》報道）；另一方面，在表示要諮詢公眾意見的同時，卻急不及待地向立法會突然提出動議，要立法會通過保留《公安條例》中有關規管公眾遊行及集會的條文，企圖藉助於立法會中親京保皇派佔了多數的優勢，以「快刀斬亂麻」的行政手段，壓平民間的反對聲音和訴求，玩弄假諮詢（實則至今仍未發出定期諮詢的文件）真獨裁的把戲。

即使立法會的多數議員完全漠視民間強烈的反對惡法和普遍的要求修法的訴求，在延遲一個月之後「照單全收」港府的動議草案，通過如儀，但民間這些反對和訴求是不會就此罷休，而會不斷提出意見，進行抗爭，直至獲致合理修改為止的。港人需要迫使當局就修改公安條例公佈綠皮書，定出期限進行全民討論，最後由立法會根據港人多數意見作出修改。而大律師公會提出的如下5點修訂《公安條例》合理方案，則可作為港人討論時的重要參考：1、參與未有知會警方的和平集會及遊行的市民，最高判監5年的條文應予取消；2、組織集會遊行者的最高監禁5年規定應改為只限罰款；3、集會遊行通知期7日應改為48小時；4、對集會遊行附加條件由警方決定應改由法官決定；5、遊行人數30人或以上及集會人數50人或以上，應改為100人以上。

2000年12月15日

啟事

本刊從2001年起，改為季刊，敬請垂注。

從立法會補選談到特首的推選

振言

2000年9月立法會選舉前爆出了程介南以權謀私的醜聞，但特區政府為有利於親中、保皇的政治勢力而制訂的政黨比例代表制條例，以及不能退選（雖然仍有其他一些情況可以退選）的規定，致使部份選民因要投民建聯名單而使它的第一位候選人程介南仍可當選，儘管當時民建聯已在鐵的證據面前不得不承認醜聞而公開譴責了程介南、撤去其黨內職責。這樣的選舉條例是非常荒謬、侮辱選民的，充分暴露出特區高層的無遠見及無能。在程介南當選而立即提出辭職後，當局決定於12月10日舉行補選，以填補這個席位，從而要浪費幾千萬港元的港人血汗錢和龐大的人力。

補選的參選者，主要是民主派和眾多法律界等人士所公開支持的余若薇，與代表民建聯的鍾樹根，其餘4位獨立參選者實力微薄，這實際上是余、鍾兩人的決戰，他們基本上分別代表著不同的政治觀點立場，余及其支持者要走的是擁護民主、人權、法治的路線，鍾走的是擁護京官、保衛特首的路線。

補選結果，余若薇得到10萬8千多票，得票率52.1%；鍾樹根得7萬8千多票，得票率37.6%，比余若薇少3萬多票，得票率低4.5%；儘管在這次競選中，民建聯已經傾全力出擊，有如曾鈺成所坦言的：「過往補選歷史上，從來未試過成個黨走入去『砌』。」鍾的宣傳品充斥港島各處，宣傳車不斷開動，出動全黨及其支持者（包括有20萬會員的工聯會和文匯報等）力量去進行這次爭奪戰，企圖全力保住立法會內程介南辭職而懸空的一席位。他們將這次補選定性為「愛國愛港」與「抗中亂港」之爭。鍾樹根在其傳單上影射余若薇（指她的競選顏色——綠色代表「偏激對抗力量」，「穩定確現危情」）；但在公開論壇上，對於後者的質詢卻無法舉出任何事實來支持其指責。從鍾樹根選前定下10萬票目標而結果差兩成多這點來看，他是逃不過多數選民的雪亮眼睛的！

余的勝利不但挫敗了民建聯的意圖，而且，對民主派今後在立法會內的鬥爭，也將會產生頗大的作

用。因為，在分組點票時，如果她信守競選諾言，則民主派在其中的一組（「地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組別）將會擁有30票中的15票；又如果加上可能的「獨立」議員一兩票，便會獲得該組別的多數票，打敗該組內的親京、保皇派；即使另一組（功能組別）給後者佔了多數，也難以通過後者提出的議案。這也是對親京的臨立會成員為親京保皇派度身定製的立法會表決機制的一個打擊。

這次補選結果反映出大多數港人追求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願望，和對一人一票直選立法會全部議席及行政長官的訴求。這同時也證明了現行的立法會和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是違反多數港人追求民主的意願的；立法會的名單投票制及其不准退選的規定、立法會的分組計票機制等等，都是有害無益的。在補選結束後全港必需重新展開對政制和以上各種問題的討論，迫使當局徹底改正回歸3年多以來在這些問題上的不民主的錯誤。這就是從此次補選中得到的最重要啟示。

但港府的做法卻與上述的正確道路相反，不但不提出進行這些討論，反而突然公佈了有關《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的立法建議，由800人的選舉委員會選出第2屆行政長官。這樣仍然由小圈子來選出，又一次剝奪了全港市民的應有普選權利；而即使是這樣子不民主的推選，政府高官一直都不肯答覆是否選委會兼有推選特首的功能，直至今年7月產生的選委會和今年由選委會推選6名立法會議員時，仍是避言選委會有無「雙重功能」。這使人懷疑政府是在選擇對董建華當選連任的有利時機時才作出宣佈。而在上述宣佈後，許多挺董的大富豪和政界要人都爭先恐後地聲言支持董建華連任，看來是北京高層已作出欽點的決定，人們便加以響應，而不顧香港大多數市民的反對意願，從而在變相地委派出的800名選委的小圈子中，董建華將可穩定地得到多數而連任，又一次寫下了香港史上不民主的另一頁！

2000年12月17日

官商加強壓搾 市民苦上加苦

微波

現時，香港經濟剛從衰退中回升，絕大多數港人還未從生活重擔中喘息過來、分享到經濟恢復的好處，工資勞動者幾年來被減少或凍結了的工資還未得到增加，卻首先面臨著各種加價加費的壓搾。在十多項關係民生的公用事業機構提出加價的同時，特區政府也不甘後人，向立法會建議提高80多項政府收費，不久還有約70項加費要提出。

政府的加費理由是：這些加費不會直接影響民生及商業活動。這就是承認，它至少會間接產生這種影響。事實上，「羊毛出在羊身上」，增加了的收費幾乎都會被轉嫁到市民及消費者肩上。政府自己也要加費，勢必鼓勵和助長加風；既然它自己不能以身作則，自然難以不批准各大公用事業機構的加價申請（雖然它們多年來幾乎每年都有龐大的溢利）。政府現時擁有非常龐大的財政儲備，而所建議增加的總收入是670萬元，並不構成非加費不可的理由。

在12月1日開始實行的強制性公積金條例規定，月入4千元或以上的僱員都必須供款5%。許多僱主把自己所須負責的5%供款，也用各種方法轉嫁給僱員負擔。例如：僱主強迫員工改為自僱，減薪資5%，少報僱員工資入息，等等。這樣，有關的僱員便要加倍地負起重擔。不同意的人，有許多都會被停工、失業，有些工廠商號則因經營困難而索性關閉、停業。這樣多給工資勞動者帶來的壞影響，是特區政府不肯設立全民性退休保障制度、拒絕推行中央公積金、推卸了自己應負的共同供款和管理的責任而實行現時的強積金辦法的結果。

緊接著強積金供款的，是衛生福利局又推出醫護改革諮詢文件，「建議」40歲以上市民開始供款1%至2%，以解決上漲的醫療開支，把政府對此原本應負的責任又推在市民身上。

以上的一連串事例，清楚表明特區政府的措施正在不斷地搜括港人的民脂民膏，盡一切方法去壓搾港人，使中下階層不斷加重負擔，尤其是低下層更被壓得透不過氣來。

另一方面，政府在「資源增值」的號召下，又迫令屬下各部門緊縮開支，替政府節省撥款。例如，回

歸之後，政府對8間大專院校的撥款，繼3年來已減少10%之後，明年起的3個年度內，將再削減6%至7%。即近24億元；其結果將使大學質素難以提高。而且，從01年起大幅削減各大學的醫科、法律學科、社工學科等的收生學額，物理治療和職業治療的學位課程更會在4年內削減近一半。另一方面，大學學費則會從現時的每人42,000多元，在未來10年再度大幅提高，其「理由」是要「收回成本」，這種「理由」有如對公共醫療服務一樣，彷彿政府每年從賣地和稅收中得到的逾千億元收入，不需要用作教育、醫療等的支出似的！這完全是高官貪得無厭、只顧表現個人「領導」才能而極不負責的言行。

多年來，特區政府的外匯儲備高達4千億元以上，時常居於世界的前列，但當局卻仍然盡量向低下層市民搜括，同時對富人則大助其更加致富，以致貧富日益懸殊，使每月工資收入低於4,500港元的勞動人口，在最近幾年增加了45%。香港社會保障學會根據統計處所得資料顯示，99年香港最低收入的20萬戶家庭月入平均只有3千元；而過去10年，本港實際經濟增長達4成，但貧窮人口卻增加4倍，近100萬人，他們的收入越來越創新低，越來越多地跌至貧窮線以下，加入到全球總人口1/5（12億人）的窮人行列中。一項名為「2000環球全面薪酬研究」的國際性調查發現，香港行政總裁人員的年薪動輒高達500萬元，有些「打工皇帝」更超過1千萬元以至1億元，是亞洲地區之冠；而香港一般製造業工人退休後的收入，只及其退休前的3成，排列全球26個國家及地區同類收入的第25位。

這種結果，完全是官商勾結、聯合治港的特區政府政策措施所造成的。全港中下層市民必須團結起來，一齊捍衛自己的權益，反對港府這些倒行逆施，迫使它的政策無法得逞。同時，勞動人民還要努力爭取加薪，改善待遇。像最近國泰機師與資方的不斷談判，已爭取到初步的成果，便是新的例子，表明勞動人民自己的權益待遇，是可以經過有力的行動爭取到的！

2000年12月15日

(轉載) 強積金可以保障你嗎？

陳瑩

特區政府在今年12月開始推行強積金制度，強積金說穿了是政府強迫市民儲蓄，換言之仍是我們自己供養自己，政府除了撥款50億去成立強積金管理局外，是不費一分一毫。

政府推卸退休保障責任

每個人都希望能安渡晚年。過去政府是要市民自生自滅，長者退休時一是靠自己的積蓄，一是靠子女供養。對於低收入的打工仔女，日常生活已經捉襟見肘，何來餘錢可儲？晚年便只有申請綜援一途，不單只能獲得區區之數，更要背上「社會包袱」的負面銘印。以致不少長者為求尊嚴，寧願做到老，捱到老。

不少人已指出，政府多年來漠視設立全民性退休保障的要求，卻在毫無諮詢的情況下通過設立強積金，是為了替自己減輕越來越沉重的老年綜援的包袱。強積金可以讓政府來一個金蟬脫殼，只需要訂立遊戲規則、監察機構（積金局）和相關法例，並一筆過撥出成立費用，便可以與市民的退休保障脫離關係。以後，錢由市民去供，日常運作由市民交由保險公司、銀行等保管人公司去做。管理費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會在市民供款額中支付。連積金局的行政費在數年後亦會由市民的供款中扣除，政府是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政府為金融機構出謀獻策

成立強積金最大的得益人是基金公司、保險公司及銀行等金融機構。市民的供款將由保管人委派投資經理代我們去投資。估計強積金的每年供款總額約為一百億元，這是特區政府「獻」給金融機構的額外生意。有業界人士也指出，基金在香港並不流行，只有4%的香港市民有購買基金。政府無疑是幫金融機構開了一條財路。

即使過去從不涉足股票買賣的打工仔女，也會因為強積金而沾手金融。市民雖然沒有「自由」決定是否參與強積金，卻有「自由」去選擇將供款投資於那一個成份基金。成份基金有由最進取性百分之百購買環球及本地股票，以至最保守的保本基金等多種選擇。前者風險大，一旦金融風暴出現可能會損失慘重。後者卻分分鐘由於通脹而實際貶值。而且，一旦當全港或全球的股市瘋狂起來，過去沒有買股票的市民尚且受不住引誘去孤注一擲，例如近期TOM.COM的事件。將來肯定有更多人拿自己的供款去冒險。對於不懂金融投資的市民，政府無疑是「迫」他們送羊入虎口。

強積金客觀上是將廣大市民綁上驚濤巨浪的全球金融市場的戰車上。打工仔女的金錢，變得與股票、息差上落拉上關係。特區政府推使全港市民金融化，就好像過去高地價政策迫使市民將畢生積蓄押在房屋一樣，一旦樓市回落，有樓市民不單蒙受損失，還得要與地產財團站在同一陣線，要求

政府挽救樓市（實際卻是要樓價回升，加重自己的擔子）。不難想像，有朝一日，當賣買股票不再是部份市民的遊戲，而是牽動每一個打工仔女的心，一旦再遇金融風暴，市民會無奈要求政府出手救市（股市）。

政府拒絕設立基本退休金額

政府拒絕用隨付隨支（即以今輩人供養上輩人的方式，僱員的供款付給現時合資格的退休人士）的退休保險計劃，而強迫市民拿供款去投資，實際上是要市民去承擔責任。一旦退休時只有區區之數，那也是自己沒有「投資眼光」，與人無尤。政府不會設立最低的退休金額，一世積蓄，可以因為一場金融風暴而不見了一大截。

即使我們安份守己，不去冒險投資，但低收入的打工仔女卻仍然不能安渡晚年。早已有不少人指出，低收入人士根本不能靠強積金養老。一個月入一萬元的打工仔女，如果供款25年，假設實質平均回報率為2%，65歲退休後若有14年壽命，每月只有相等於目前金額\$1,700，比現今老齡綜援還少。一萬元收入也只是全港的工資中位數，在今天，打工仔女人工不斷下降，大廈保安員只有6千多元，清潔工更只有四千多元甚至更少，他們不單現今要從微薄的生活費中拿錢去供款，這些供款也不可能讓人安享晚年。

打工仔女沒有保障

如果上述只是將來可能發生的事，那麼，近在眼前的卻是僱主為了逃避替僱員供款的責任，而採取減薪或裁員的惡果。由於香港打工仔女缺乏職業的保障，沒有最低工資制，又沒有集體談判權，換言之沒有集體議價能力，僱主可以向員工任意減薪，僱主的供款變相是員工自己支付。尤有甚者，僱主更可利用法律漏洞，加速外判制度，或變相使員工變成自僱者，這些已不是預測，而是已經發生了的事。

特區政府給我們的退休計劃，是一個千瘡百孔的強積金。更遑論這個強積金是完全沒有照顧到一些對社會付出勞動力的市民，例如主婦，已退休或行將退休人士。政府一再拒絕推行全民性退休保障，不單是為了不想花錢，即使有學者提出一個全民性退休計劃，並聲稱不會多花目前政府已出之數，政府仍是不為所動。究其原因，正正是特區政府一意奉行小政府管治原則，除了保障不能自顧者之外，其他一切都「關人」，市民「貴客自理」，政府在不破壞「自由市場」運作的口實下，打工仔女「自由」地受剝削，「自由」地去受金融大鱷撕食，並且「自由」地連基本過一個有尊嚴的晚年也不可能。

（原刊2000年6月4日出版的《四五之聲》）

簡評中共制定「十五」計劃的建議

張開

中共中央在今年10月11日通過並公佈了《關於制定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作為制定該計劃的指導思想、方針和措施的準則。

《建議》首先宣稱，今天已達到的主要成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中日益明顯地發揮基礎性作用；」「全方位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已經實現了現代化建設的前兩步戰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

要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它重申中共「十五大」提出的遠景目標。「十五」期間（2001至2005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是為到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奠定堅實基礎。這就是說，10年間的國內生產總值要增加一倍，亦即從預計今年末可達到的87,000多億元增加至174,000多億元。

為了達到這樣高速度的經濟增長，它提出「十五」計劃要把結構調整作為主線，要充分體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要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繼續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而現時「經濟結構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產業結構不合理，地區發展不協調，城鎮化水平低，這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突出矛盾。」

《建議》幾乎是把過去黨政文件中列出的應做的方針、政策、措施羅列起來，對方方面面都要應有盡有的加上諸如努力增強、促進、發展、發揚、完善、健全、重視、改進……等字眼，其總目標就是繼續推行現時的路線、方針、政策、措施，把已經初步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調整好，推進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轉變」，成為全面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倘真達到這些目標，就是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全面完成。從這個意義說，這樣的「十五」計劃將是替中國進一步復辟資本主義起重大的促成作用。不管中共在「市場經濟」

前面冠上「社會主義」的美好形容詞，這種市場經濟實際上仍是資本主義性質，更加背離社會主義道路的。

《建議》具體地重申：國有企業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要積極探索國有資本管理的有效形式，鼓勵國有大中型企業通過規範上市、中外合資和相互參股等形式，實行股份制。過去，政府曾規定，在中外合資的股份制企業中，凡關係國家安全、經濟命脈和國計民生的重要企業，必須由我方控股；但現時卻不再提「國計民生」的限制了。過去，國有企業是受到國家各種優待和補貼扶助的，現時卻遭大量減少，以便政府「要為各類企業（包括私有、外資等企業——引者）創造平等競爭的環境」（《建議》語）。諸如此類的改變，將使國有企業越來越難與非公有制企業競爭，越來越處於劣勢而減輕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逐漸喪失其「主體」地位。特別是在明年入世之後，這種趨勢將會加速。結果，將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起決定性的支配作用，是中國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表現，因而是大開歷史倒車的。

朱鎔基在對這個《建議》的「說明」中，宣稱「國有企業改革和脫困三年目標基本實現」，這只是一個階段性的目標，深化國企改革是一項長期任務，還有許多艱巨工作要做，最主要的工作是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推進股份制改造。這些話意味大中型國企還未改造成資本主義的性質。國家多年來每年都投入逾萬億元去增加國企的固定資產，據稱國企的資產總值已達8萬億元以上，倘從這項數字看，是高出私有制企業許多倍的。但這似乎不是資產淨值，如果減去國企的實際虧蝕和負債，其淨值有多少，筆者現還未有這項資料。

美麗虛言背後的實際

至於宣稱國企已經基本上扭虧脫困，那是很可疑的。由於中共中央以國企負責人能否扭虧脫困作為升職或撤職等的準則之一，勢必助長大量負責人弄虛作

假，謊報成績，以免受罰，反而可得獎金及好評。例如，據99年12月24日《蘋果日報》報道：中國財政部抽查100家國企上年度的會計報表後發現，造假賬問題嚴重。其中89家企業虛報利潤27多億元，81家多列資本37多億元，83家虛列所有者權益26多億元。這些國企的報表且已經通過82家審計機構審核。今年1月18日的《星島日報》報道：99年有3千家國企實現扭虧目標，同時又有約2千家國企出現虧損。該報在3月8日也報道：國家經貿委主任盛華仁在3月7日的兩會新聞發佈會上承認，國企虧損是「扭轉了一批，又新增了一批」，「在市場條件下，企業今年盈了，明年虧了，難以避免。」這些都表明「基本實現」扭虧脫困目標的說法是不可靠的。

《建議》又斷言現已獲致「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的成就。所謂「總體」，就是「事物的全部」、整體的意思；「小康水平」就是指家庭經濟已達到「比較寬裕可以安然度日」的水平（均據《辭海》的闡釋）。今天，全中國人民的生活果真已過著這樣的好日子了嗎？事實上，市場經濟的發展，已帶來日益擴大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對於城鎮下崗失業者、農村的困難戶（據大陸學者估計，他們合共有1億人左右）、以及被迫要到城鎮找工的農村流動人口，都談不上已生活在上述定義的小康水平上，反而大都幾乎是處於或接近於貧窮線上。尤其是為數眾多的農民，據一些研究「三農」（農村、農業、農民）問題的大陸學者一再指出，中國的農業已變成一個沒有盈餘的產業，而農民則面臨著因遭橫徵暴斂而負擔過重，以及收入偏低等問題。這裡舉出一個產糧大縣（湖北省監利縣）的例子便可見一斑：該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在今年2月10日含淚上書國務院領導，開頭總結指出：「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跟著他列舉事實數據加以證明。其後，國務院作出批示，由「農業部派員暗訪棋盤鄉、汪橋鎮，寫出長達17頁的調查報告。報告認為李昌平實事求是地反映了當前農村、農業和農民存在的問題。」湖北省委書記和省長前往「調研」後也「認為：監利縣棋盤鄉等一些鄉鎮存在的問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以上是大陸一份報章較詳細地披露出該信和報道的。朱鎔基的《說明》中也承認：「近年來，農民收入增長減緩，中西部一些地區特別是糧食主產區甚

至出現負增長。」

而實際上，造成該信所列出的問題的主要根源，是現存的官僚制度和中共的錯誤政策措施，它們不僅只存在於監利縣，而且會遍及全國各鄉村的。這樣的現實，有力地揭破了上引《建議》所吹噓的「小康水平」牛皮。這也表明農村社會的矛盾是嚴重地存在的。

社會矛盾和問題仍在發展

《建議》對今天經濟結構存在的問題，和經濟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只說了前面所引的3點，共23個字。朱鎔基的《說明》對此有比較多的承認（儘管仍是輕描淡寫、不肯完全如實地全部承認的）：

「應當充分認識到，經濟和社會生活中還存在許多不可忽視的矛盾和問題。主要是：產業結構不合理，地區經濟發展不協調；科學技術還比較落後，企業的整體素質和競爭能力不高；一些重要資源相對短缺，就業壓力加大和部份地區生態環境惡化；農民和城鎮部份居民收入增長緩慢，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體制因素仍很突出，各種所有制企業公平競爭、共同發展的環境尚不完善；貪污腐化、奢侈浪費現象還比較嚴重，一些地方社會治安狀況較差。」

不管《建議》滿紙充斥著美麗的句語，要求做到這樣、達到那樣，以期改進中共的缺點錯誤；但這些要求，幾乎已成為黨八股、官樣文章，難以為地方官員幹部落實執行，難以幫助中共克服它的缺點、錯誤所造成的各種矛盾、困難和問題，上引朱鎔基所列舉的矛盾和問題，只是其中的許多種。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越是發展，則在原有的官僚層與工農大眾之間的主要矛盾之外，更恢復了中國舊社會存在過的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重大矛盾，而使各種社會矛盾鬥爭更加複雜化、白熱化。因此，中國經濟即使能夠迅速發展，如果主要是私有制經濟力量的迅速發展、壯大，那也將意味是上述的階級矛盾鬥爭的迅速發展，最後要由工人階級發揮出力量才能解決。

2000年11月30日



工人被侵權 維權鬥爭多

張開

中國推行市場經濟，驅使所有類型的企業，特別是私營的企業，全力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為此想盡辦法加強對工人的壓榨，從各方面侵害工人的應有權益。這種侵權的情況越來越普遍化，有許多更是非常嚴重，造成工人向各有關部門上訪和投訴的人次日增，各地報刊（特別是《工人日報》、《南方工報》等）都不時有報道。本文根據它們的報道，綜合出如下的述評。

全面性的侵權惡行

對勞工權益的侵害，主要表現在：

一、用工制度不規範。《勞動法》規定，用工單位與職工應訂立書面的勞動合同，列明其期限、工作內容、勞動保護和條件、報酬、合同終止的條件等條款。但當前許多企業，一方面大量裁員下崗，另一方面又招用農民工、臨時工代替，與後者大都不簽訂勞動合同，他們一旦與企業發生糾紛，便無根據可查，以致其合法權益難以得到保障。還有許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私營等企業，多拒絕簽訂勞動合同，即使簽訂了，也片面地列著有利於企業一方的條款，使職工吃虧、受騙。在很多場合，即使簽有合同，企業一方也會隨意不履行，以至撕毀它。

二、剝奪無數職工的就業權利。過去的「鐵飯碗」被「改革」成「泥飯碗」，企業經營者握有絕對的用工權力。國營和集體的事業和企業單位，在國家推行的裁員減薪、「減員增效」的號召下，紛紛裁減「冗員」，使大量職工下崗、失業。國家把許多國有事業單位變成企業，不再作經濟投資支持，也迫使有關事業單位大量裁員。例如：黑龍江省地礦局屬下的地球物理勘察院便因此而迫令260名職工同時「集體辭職」，且只是一律給予每人二萬元一次性補償，便算終止勞動關係，買斷工齡和社會保險。他們長期為國家從事野外地質勘察工作，很多都患有多種職業病，而「院方」在95至98年，每年都盈利數十萬、上百萬元，今年的「效益」也不錯；在辭退了260名

職工後，又招聘了一批新人。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尚且如此，私營企業便更加跟風效法，有過之而無不及了。絕大部份的工人在下崗失業後，要再就業便非常困難，特別是遭到種種歧視（性別、年齡、身份、面貌等歧視）。國家雖訂有下崗後再就業的優惠政策，但都難於落實，口惠而實不至。而大部份企業在使用下崗職工時，也沒有為他們辦理養老、工傷、生育、失業等保險。

三、工資無保證。現時企業剋扣、拖欠工人工資的情況嚴重。99年11月1日的《工人日報》指出：「現在能按月發工資倒算是『新聞』了。無論是企業單位，還是事業單位，無論是國有還是私營，都普遍存在拖欠勞動者工資現象，拖欠數額令人驚心」。這不僅僅是由於那些企業經濟困難，而且是要與其他企業鬥拖欠，即使有錢發工資，也寧可把錢用到其他方面（這是《工人日報》作的調查證明的）。還有些企業把積壓難銷的產品（如服裝以至煤）發給工人作為工資。有些企業則以「打白條」支付工人應得的經濟補償金、社會保險金、養老保險金等等，使工人遭受損失。有些企業以「試用期」為名，廉價僱用工人，幾個月期滿時辭退，由另一批人補充，從而長期用低薪工人工作。更壞的是建築行業，層層轉包，工頭得款後逃去，建築民工無法追討被欠工資，這種情況十分普遍、嚴重。

四、隨意加班又無加班費。許多企業違反《勞動法》規定的加班最高時數，任意加以延長，剝奪了職工休息的權利，同時又不付加班費。例如：廣東中山市一間大型中外合資鞋廠，半年內每天都加班到午夜12點，連「五·一」節都沒休息；番禺合資大企業興泰鞋廠大半年來每天加班至少4小時，無雙休日。此外，還有些企業實行「包工制」，只包任務，不包時間，且故意把任務指標提得很高，要工人加班加點才能完成。

五、強收工人抵押金、入股金及「借用」款項。許多企業強迫每人繳交數千元的抵押金或入股金，否

則便不給工作和應有工資待遇，或者被令下崗。在全國，交抵押金問題非常嚴重。單在1999年，吉林省勞動部門在專項執法檢查中，便為20多萬名勞動者追討回非法抵押金5,500萬元。同一報道在繼續舉出其他地方的事例之後說：「這種現象已不是哪一個地區的問題。它在社會上帶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且相當嚴重。」它為何屢禁不止？該報道解釋：一是那些企業藉此籌措資金，無償佔用和變相斂財；二是作為弱勢群體的勞動者為了保住飯碗，缺乏直面抗爭的勇氣；三是缺乏相應的硬性法律保護，且執法過寬。

六、工業生產安全難獲保護，勞動條件和設施差劣。由於企業主只重追求最大利潤，輕視投入資金改善保護設施，而且高度加強勞動強度，加班加點使工人過度疲勞等等，造成工傷數字大增；同時職業病害嚴重，使工人健康大受損害（有關這方面的較詳細評析，請參考筆者在上一期《十月評論》的《市場經濟導致生產很不安全》一文）。儘管國家法例規定企業必須為職工參與工傷保險，但大多數企業並不願意參保及繳費。截至99年底，全國參保的職工人數，只佔全部企業職工數比例平均的37.6%，且連上海也未開展工傷保險。

七、職工人身安全和尊嚴遭受侵犯。大陸報章時有揭露：有些企業對工人非法搜身、侮辱喝罵、體罰毒打工人（甚至在廣州，一私企為了怕投訴而非法禁錮受傷工人達個多月），這類事故常有發生。

一間「五毒俱全」的私營企業事例

上述的侵權行為，在私營企業中更為嚴重，且幾乎是「五毒俱全」的。這裡試舉出一間私企為例：8月25日的《南方日報》報道，廣東順德市一間集體所有制的陶瓷公司，未經職代會開會討論，未依法安排好保障員工的權益，便於99年1月轉為私營企業，其後，私人老闆並沒有把主要心思放在發展生產、辦好經營上，而是竭力壓榨工人：拖欠及任意剋扣工人工資；拖延、欠交員工的社會保險費；只與員工簽訂全利於老闆的內部《合約書》，違反了國家有關的規定；非法收取員工的違約金每人1,000元；隨意濫罰、亂扣工資及解僱工人；取消員工依法應該享有的福利待遇……。這些苛刻措施使員工及其家屬的生活陷入極大困境，有病沒錢醫，有工不能做，有錢拿不

到，工人一日三餐只啃麵包；住的宿舍似「貧民窟」，日子難熬。工人們多次抗爭，屢向市政府投訴，但後者遲遲不見採取有效措施，最後工人揚言將會告到省裡和中央，市長才指示有關單位進行研究解決方法。而順德市還被官方定為即將率先基本上實現現代化的先進市呢！

這個事例清楚表明：原屬國有或集體所有的企業，在轉為私營後，往往給予私人企業主以可乘之機，任意剝削壓迫工人；這種「改革」，革掉了工人經過長期鬥爭爭取到的合理福利待遇等權益，工人是企業私有化的最大受害者。大量的報刊披露的資料說明，上述這間公司發生的各種壓榨工人情況，也不可免地發生在全國其他的私營化後的企業裡。

侵權加劇的原因

為什麼工人群眾的應有權益會受到如此多的侵犯、損害呢？這是由於：

一、企業經營者握有絕對的用工權力，勞動者處於被支配和被管理的地位，無權也無力抗拒對方的決定。由於工作職位減少，而失業後備軍又眾多，在可能被辭退的威脅下，在職者被迫要忍受不利的工作條件和待遇；而求職者也被迫要接受苛刻的條件，以求獲得工作；

二、政府的法律條例既不完備，保護企業一方的比保護勞動者的更週到；

三、許多官員幹部著重於發展自己管治地區的經濟，偏幫企業經營者，以致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對工人權益被侵犯損害，往往不加干預；

四、不少企業工會幹部則採取「知白守黑」的態度，使勞動者得不到工會的支援，從而更加陷於勢孤力弱狀態。

今年9月20日的《工人日報》一文總括其原因是：企業改制不規範，勞動法規執行難、工傷待遇難落實。以上所述各方面的因素，便造成企業主有恃無恐，不斷地對工人權益諸多侵害。

上述的不利因素，使得勞動爭議發生時，企業主也具有很大的優勢，而工人則相對地處於劣勢，難以得到法律的保障。

有壓迫搾取就有抗爭

正因如此，工人群眾普遍不滿於企業經營者的侵權行為，在忍無可忍之下，已不斷地起來反對、抗爭；以至於罷工，並爆發出越來越多的勞動爭議、上訪，控告企業主的案件與日俱增。例如：北京市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據統計，1999年全市共有5,234起，涉及職工11,183人，比上一年增加64.2%，其中集體勞動爭議案件242件，涉及職工6,191人，比上一年增加78.5%。僅北京的一個遠郊縣，從95年到99年，4年間勞動爭議案件增長了5.7倍。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與該市總工會的統計數據也表明：1998年以來，涉及勞動關係的問題每年上升幅度為35-42%，勞動爭議案每年增長30%。

今年上半年，首都北京的集體勞動爭議，更是急劇增加。據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仲裁處處長徐樹理今年9月初對《北京工人報》記者說，「北京市今年勞動爭議的形勢是十分嚴峻的。」因拖欠工資、生活費引發的集體爭議案件和涉及的職工，比上年同期分別上升了120.37%和118.1%；因欠繳社會保險引發的集體爭議案件和涉及職工，同比分別上升了252.9%和80.69%。而且，這些爭議更「呈複雜化」，「已成為影響首都改革、發展、穩定的重要因素。」「長期拖欠職工工資，造成部份職工生活困難。……目前還沒有較好的解決辦法，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最大隱患。」

從這些話中，可反映出勞動爭議所造成的影響是嚴重的，深使官員擔憂的。但當許多工人們先想通過勞動爭議爭回自己的應有權益、爭議得不到合理解決、令工人不滿、對官方裁決失望時，工人便被迫把行動升級，要用自己的力量去爭取滿意的解決，亦即包括採用怠工、罷工、街頭示威、堵塞交通抗議等行動。

由於中國當局的新聞封鎖，國內的報章傳媒絕少報道工人的上述鬥爭行動，極少消息傳播到海外。不過，經過一些難得的渠道，使「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和《中國勞工通訊》（英文版雙月刊）等，仍能獲得很少部份的資料，從這些十分有限的資料中，仍不難看到工人們的維權行動是與日俱增的。

據《中國勞工通訊》今年5、6月號詳細列出她所搜集到的各宗工人罷工、上街抗議等維權行動，在

1997年全年共有10宗。參與人數約14,300人，其中1宗人數未詳；1998年共有14宗，其中7宗已列出參與人數為4,000人，其餘7宗的人數未詳；1999年共有21宗，其中18宗的參與人數超過39,500人，另有3宗人數未詳；今年1至3月，共有5宗，其中3宗的參加者有11,500人以上，其餘2宗人數未詳。

該刊隨後兩期，繼續報道了不少的鬥爭行動。其中有：

從今年7月10日開始，成都3508軍工廠超過1,000工人和退休工人在廠門外靜坐抗議，要求該廠關閉時應與工人協議給予良好條件，在持續7日後結果如何現仍未探聽到。（轉引自美聯社電）

8月5-6日，四川省宜賓一間大型國有煤礦（富榮煤礦——音譯），超過1,000名工人和家屬阻塞主要街道，抗議不敷的生活津貼，要求給予法例規定所保證的津貼。當局出動清除了障礙，拘捕了6名組織示威的工人。全國總工會人員同意這次抗議是合法、合理的，但卻認為抗議的組織者應予譴責。

9月25日，雲南省一間國有鋼廠500名工人阻塞成都至昆明的鐵路幹線，以抗議傳說中的解僱工人。

由於中國工人現時仍沒有獨立的各級工會（中共只容許單一的官方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其屬下各級工會——存在，中國工人階級還不能很有組織地廣泛聯合起來，進行維護和爭取權益的鬥爭。但現時以全廠職工為單位的集體勞動爭議，已表現出他們的組織力、團結力量是比過去大大增強了，因而在鬥爭中可能迫使企業主和當局作出讓步，爭取到不少的成果，從而加強了他們的信心，儘管今天所面對的侵權、失業等困難在許多地方已比過去大增。不過，這許多的工人鬥爭，往往都被當局出動軍警鎮壓下去了。

另一方面，中國的「三農」（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也在日益嚴重化，農民權益被來自各方面的壓榨所侵犯，其難以容忍程度並不下於城鎮的工資勞動者所遭遇的，許多地方的農民的反抗鬥爭已時有所聞（關於這方面的問題，以後會另文加以論述）。城鄉工農的維權鬥爭將不會是長期孤立、分離，而會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最後達到強有力地反對、抗衡共同的敵人的。

2000年11月25日

中國貿易是「黃禍」？

華爾卡

有些評論家聲稱：西雅圖反世貿組織示威，預示了美國對外貿易將是今年總統競選的重大政治爭端。但是，甚至在西雅圖行動之前，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就已開展，反對美國國會給予中國優惠進入許多國家已經得到的美國市場了。勞聯——產聯準備竭力反對與中國貿易，正如它在92-93年強烈反對（北美貿易協議）的運動一樣。

國際卡車司機兄弟會主席荷夫發說：「我們要用電話、信件和訪問來淹沒國會的辦公室」。「我們要不惜一切做我們所能做的，而且要用來自西雅圖的勢頭，我們將會勝利。」（《紐約時報》2000年10月11日）

對工人來說，正如勞聯——產聯反對北美貿易協議的鬥爭那樣，不管它是否贏得國會的戰鬥，它仍要商討二個更大的問題，就是勞聯——產聯反對中國貿易的戰略是否合乎美國工人利益，而且也合乎中國工人利益。

勞聯——產聯說：首先它要保證中國有公平的勞工標準，中國工人有權利組織行業工會，集體地提出要求或條件，取得合理的生活標準。它否認它在利用它的反對作為掩蓋物來隱藏一個貿易保護主義者的宣傳，以維護某些國內工業的利益，希望保留一些工人的工作。

然而，工人的反對北美貿易協議部份的意思，是反對減少與加拿大的貿易障礙。然而，加拿大的勞工法如果不比美國勞工法優，至少也是相等的。

無論工會上層是什麼意圖，都不能否認他們的現行中國貿易政策的效果，實際上同他們早期的赤裸裸的保護主義者「買美國貨」政策是同樣的，這就等於以外國工人為犧牲，尋求維持美國工人的就業。儘管那似乎如許多美國工人所理解，但顯然那不是團結的、國際主義的態度。

那是因為這種政策並不讓工人跨國界聯合起來，而是讓資本家繼續欺騙工人，強迫他們去互相競賽，更容易地征服他們。明顯地越過國界欺騙工人，是在

國境內繼續欺騙工人的一種變相。十分明顯，工會寬恕欺騙，就是攻擊工聯主義自己的基礎。

當然，希望現在的工會領導採取一個為人類需要而生產的社會主義的政策，而不是為了利潤而生產的政策，實在是過高的要求。而且期望工會的官僚們從私有的利潤約束下為解放工人和經濟而去鬥爭，實在也過高了。這些束縛給生產力扣上了鎖銬；加上可怕的浪費、貧困和不安全，這種不民主的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之下，是必然的。

不幸地，工會的首腦們甚至不能去反對資本家，由於工作的現代化、精簡架構、效率提高等而把優薪工作裁減。事實上，許多優薪工作的喪失，是由於國內公司削減成本，而不是由於國際貿易。與其在動員西雅圖的示威和更早的受到公眾廣泛支持的1994年卡車司機罷工反對「聯邦快遞」的情緒，以及爭取減少工作週增加就業機會，不減少工資，官僚們實際上拿8小時工作日和幾百萬個職位——去交換只給少數人的超時報酬。

現在工會的上層領導正在從事一個政治的交易戰，點燃起狹隘的、工人種族歧視的感情，去反對中國工人，當然也反對黑人。但願事情並不如此惡劣，但即使如此，美國工人仍然需要尋找一個維護他們的利益的領導層和綱領，而不是選擇狗咬狗的資本主義。

（楊萍譯自《工人旗幟》2000年春季號）



致中國八大民主黨派的公開信（來論）

余懷兆

各民主黨派中央負責人：

你們好，我是懷著複雜的心情給你們寫這封信的。我對你們各自的政黨抱有強烈的興趣與好感，總想了解你們多一些。但我跑了好多書店和圖書館，能找到有關介紹民主黨派的書籍實在是鳳毛麟角。

若我因缺少資料而對你們各自的黨有些誤解、說錯了話時，還萬望你們海涵。中國的八大民主黨派都是20世紀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20多年間成立的，最早成立的是中國致公黨，成立時間是1925年10月10日，最遲成立的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時間是1949年1月1日，在這20幾年間，中國還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正處於外憂內患之中。從你們成立初期的政綱也可以看出，幾乎每個黨都把促進國家統一和追求民主政治放在首位。如民革：「本會以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建設獨立、民主、幸福新中國為最高理想。」並具體提出要「實行普選制度」、「司法絕對獨立，不受行政及軍事之干涉」和「軍權及軍隊屬於國家……國家並應以法律禁止軍隊中之黨團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行動綱領（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民盟：「國家設總統副總統各一人，由人民直接選舉，行使憲法上所賦予之職權」和「司法絕對獨立，不受行政及軍事之干涉。」（中國民主同盟綱領（1945年10月臨時全國代表團大會通過））。民建：「全國武力須屬於舉國一致之民主政府。司法獨立，……選舉與公民投票，必須為普遍的、直接的、無記名的，始能代表真正的民意」（民主建國會政綱（1945年12月16日成立大會通過））。九三學社：「一、促進民主政治之實現，爭取人民的基本自由。二、從政治的民主化，謀軍隊的國家化，反對屬於黨派或私人的武力，根絕內戰。」「六、學術思想之絕對自由，獎勵科學研究，拒絕黨化教育及思想統治。」（九三學社基本主張（1946年5月4日九三學社成立大會通過））。台盟：「設立民主聯合政府」、「實行普選制度」、「司法絕對獨立，不受行政、軍事之干涉」（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綱

領，1947年11月）。從上述各黨派的政綱不難看出，各黨都提出了實行普選制、軍隊建設國家化和司法獨立的政治理念。其餘的三個黨雖沒有很明確的提出這些政治理念，但對民主政治的追求一樣是非常強烈和執著的。這些40年代提出的綱領，即使用在今天的中國，也具有先進性。但這種進步的綱領並沒堅持多久就放棄了，這是多麼可惜啊！這是各民主黨派的不幸，更是中國的不幸。然而，最令人費解的是你們各黨在吸收黨員的條件的轉變。在民主黨派創建之初，吸收黨員的條件並沒有什麼特別的限制，幾乎只要擁護本黨的綱領、遵守本黨章程和不是賣國賊就符合入黨條件。這符合平民政黨的原則。但後來卻變了，除民革沒有太多的限制，其餘的黨都成了「文化貴族」的黨。民盟的入黨條件是，除了擁護黨綱領外還要求員「以中上層知識分子為主」（1988年10月12日中國民主同盟章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民進和農工民主黨也要求是「知識分子」；致公黨是「歸僑、僑眷和與海外有聯繫的代表性人士、專家學者」；民建是「從事經濟工作的人士、有關專家以及其他人士」。九三學社是「高中級知識分子」。上述的種種轉變，是民主黨派脫離了民眾，抑或民眾遠離了民主黨派？究其深層原因，恐怕是中共的專制制度所致，也是管理體制由體制外納入體制內的必然結果。各民主黨派在中共建政後召開的幾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總章或章程中都沒有提到普選制、軍隊國家化和司法獨立這些最重要的政治理念。政治主張模糊不清，很籠統，空洞無物，沒有獨立的思想。並且先後都成了中共統一戰線下的一個組成部分（或黨派）。這那裡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分明是老子與兒子的關係。目前的八大民主黨派變成了美化中共專制政權的政治點綴品和裝飾品。（奇怪的是，中共在指責青年黨和民社黨是國民黨的兩個政治點綴品時，總忘了自己有八個之多。）周恩來在1949年12月6日對出席民盟四中全會擴大會議人員的講話中毫不掩飾地說：「如果紛紛

合併，人民就不能理解，帝國主義也會說：你看！共產黨把各黨派都搞光了。所以今天不能取消黨派。」由此可見，共產黨之所以要保留民主黨派，實在是爲了掩飾自己的一黨專政。當然，爲了更好的控制民主黨派，中共亦會像老子照顧兒子般給些「位高權輕」的職位照顧一下各民主黨派的情緒，而各民主黨派也樂於接受——不要白不要嘛。或許，有時不要也得要（如黃炎培開始並不想當政務院副總理，但後來在周恩來的強求下還是當了）。這也許是所有沒有民眾基礎的政黨的無奈與悲哀。

總不至於令人完全遺憾的是，在89年「六四」事件中，民盟、民進、民建和九三學社負責人於5月17日致函趙紫陽，要求中央政黨主要領導人盡快與學生對話；5月18日農工民主黨、致公黨、台盟也發出緊急呼籲，希望中央主要領導速與學生對話。這都是令人振奮的勇敢行動，說明民主黨派在關鍵時刻還是能堅持真理，敢於對中國人民負責的。

不能否認，中國的八大民主黨派爲振興中華作了非常巨大的貢獻，產生了很多傑出人物，如巴金、沈從文、宋慶齡、華羅庚、朱學範、黃炎培、錢偉長、費孝通、蘇步青、胡厥文、許德珩等。但作爲一個政黨，這畢竟離民眾的期望還有很大的距離。目前中國正處在改革的十字路口，落後政治體制嚴重制約著經濟的發展，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民主政治是不可遏止的世界潮流，中國也一樣要跟上這股潮流才不至於落伍。至於怎樣跟，目前來講最重要的恐怕是打破中共一黨專政的政治格局。

中共一直標榜自己不是一黨專政，而是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實行「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中共雖然允許各民主黨派參政，並且有不少民主黨派人士當上了人大副委員長和政協副主席，甚至兩職同時兼任（如黃炎培、許德珩）。但在參政的過程中，你們究竟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呢？也許你們自己也覺得說出來有點不好意思吧。作爲一個政黨，如果沒有獨立的綱領，那麼肯定是沒有獨立地位的。在此我斗膽說一句，你們各黨的政綱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應把「本黨是中共統一戰線的一個組成部分（或黨派）」徹底刪除，絕不能提「在中共的領導下」之類的字句，重新把各黨成立之初的政綱找回來，把「實行普選制度」、「軍隊國家化」和「司法

獨立」這些政治理念寫進黨綱中。並且在吸收黨員時不能再「知識分子或專業人士」把廣大勞動人民拒之黨外。我認爲，只有首先實現這種轉變，中國的民主黨派才有可能獲得新生，成爲一個獨立的、負責任的、強大的政黨。才能對共產黨起到制衡作用；才能有各民主黨派存在的意義。否則我建議解散中國的民主黨派。上述的觀點或許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比我理解得更深刻透徹。但你們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爲什麼不踏出勇敢的一步，發動人民挑戰中共的一黨專政，爲人民爭取更多的權利呢？你們顧慮不能保住目前的地位和聲譽？抑或在文革中嚇破了膽？還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各位長輩，中國目前的狀況不容許我們再一拖再拖了，爲了國家的統一和人民的利益，每一個中國人都有責任去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作爲中國的八個民主黨派的負責人，你們更是負有重大的責任，你們應起領導的作用。中國如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是沒有出路的。民主與權利不是當權者給予而是靠人民自己去爭取的。嚴峻現實要求一切熱愛中國的人拋開個人榮譽，勇敢站出來挑戰中共的一黨專政，推動國家社會民主進程，促進祖國統一，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深深的相信，未來的勝利一定屬於中國人民！

致

崇高的敬意！

余懷兆敬書

2000年5月8日

（本信中的八大民主黨派是指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



1935年12月9日，北平數千名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國請願大遊行。

巴勒斯坦的反抗

蘭斯

最近，巴勒斯坦人的暴動，標誌著巴勒斯坦鬥爭歷史的重大轉折點。暴動使外交談判這個時期告一段落。這個時期開始於1990年海灣戰爭，和1991年馬德里會議。它也使工黨的猶太復國主義戰略，徹底失敗，這個戰略有可能建立一個廣泛聯盟的政府，和可能產生一個由前將軍巴拉克和沙隆領導的新民族政黨。

最值得注意的，大量的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民捲入這次暴動。在這之前，曾發生過以色列武裝屠殺巴勒斯坦公民；1956年，當49名農民離家去他們的農地時，觸犯了宵禁令而被槍殺；而1976年的土地日，在抗議官方政策侵佔他們的土地時，6名村民被殺害。

這一次新的情況是：巴勒斯坦雙方憤怒的升級（實際上，每個鄉村城鎮和郊區的猶太人居住區，都有抗議和示威遊行，和包括佔領區內被放逐的巴勒斯坦人在內的，明確地宣告出一個共同的目標。

儘管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有特殊的理由，抗議不斷的土地侵佔，有組織地使它制度化的不公平待遇，資源被拒絕承認；最明顯地引起抗議的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屠殺。就此而論，它代表一個巴勒斯坦重申首先規定的原則；對於猶太人來說，那就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奠基人狄奧德·喀爾什爾所說的：「我們是一個民族——一個統一的民族」。

巴勒斯坦人不僅抵抗以色列在大衛營會談中的不讓步，而且反對在這些會談背後和以色列最後作為一個種族歧視國家而存在背後的整個分離的基礎。

一連串的公開示威遊行，在巴勒斯坦本土、在流亡中的難民營和全世界（包括倫敦），都在要求實現歸還巴勒斯坦人權利之後兩個星期爆發。這些示威是由日益蒙受恥辱的、在1948年被驅逐的人民的兒子和孫子一代的年青巴勒斯坦人，由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獨立地組織起來的。

流血開始於利庫德領袖沙隆對哈林沙里夫的挑釁性訪問。

沙隆是一個著名的世俗猶太人，在猶太曆新年作一次並非私人的祈禱訪問。他的訪問，據估計是他帶著三千人的軍隊，在檢察總長決定不起訴利庫德領袖內坦尼亞胡腐敗之後進行的。

巴拉克願意提供給沙隆這樣強大的警衛隊，是出於沙隆對結束和平程序的粗暴威脅，對敘利亞、黎巴嫩進行戰爭和重佔巴勒斯坦城，並且在巴拉克和沙隆之間對民族聯合政府的討論，對於以色列活動分子建議增加的信任，那就是全部的挑釁，是經過兩個將軍深思熟慮的政策，不使內坦尼亞胡恢復原有的政治地位，從而結束外交進程。

不管巴拉克會提出多大威脅，但是，阿拉法特總統的權力能否結束這次反抗，那是值得懷疑的。

1987年，以色列和巴解組織都相信，巴勒斯坦反抗運動已經開始響應阿拉法特從突尼斯發佈的一道命令。對於大多數的觀察者來說，那是明顯的，這種自發性的暴動，儘管它是非正式地支持巴解組織，對於阿拉法特繼續無效果的外交手段，實際上是一種威脅。

就是這個原因，以色列和巴解組織的領導人準備商討一個協議，在這個協議中，巴解組織將在領導佔領區代表以色列設立警察來管治。正如《社會主義展望》曾連續地爭辯的，這樣的一種協議本身就是脆弱的。

資產階級的報紙錯誤地發表議論，認為這次暴動在同以色列的外交策略上加強了阿拉法特的手腕，事實上，這次暴動使他的戰略破產，而以色列的壓力反而加強了。

如果他最後接受以色列的建議，他將不能控制巴勒斯坦的群眾，如果不把它當作一個障礙物來消除的話，就於事無補。另一方面，如果他現在支持巴勒斯坦群眾這一邊，他將被以色列拋棄，對此，他再也不能達到目的，與此同時，也不能動員群眾，提出一個明確的戰略。

事情已經變得明確，巴拉克伸給巴勒斯坦人的友

誼之手，實際上是同樣的「鐵拳」。那是他的良師拉賓在巴人反抗運動較早時期保證過的。在後來的以色列選舉中，巴拉克吸收了90%以上的巴勒斯坦人的選票，足夠給他當上內閣總理的職位。巨大的壓力施加於獨立的阿拉伯候選人阿什米·比沙拉，他退選的目的，在不分散「左派」的選票，而讓右翼的內坦尼亞胡加入。

但是，就從他選舉的那個時刻起，巴拉克已經與他的阿拉伯支持者斷絕往來，拒絕與阿拉伯各政黨聯盟，而要在投內坦尼亞胡票的選舉者中尋求支持。在他的政府下面，解決行動的步伐已大大增加。這個時候，他對以色列公眾承諾的「安全的和平」已經破產，儘管他的聲望像以色列大多數喬裝的士兵，男扮女裝以便滲透到貝魯特去刺殺巴勒斯坦的領袖，現在，他已被視為政治上失敗了。

巴勒斯坦暴動和敘利亞戰爭威脅的重新開始，好像是用作成立新的民族團結政府的正當理由，給沙隆提供機會當上副總理，並且可能當上國防部長。

這樣做的真正原因，就是要維護這兩個屠殺阿拉伯人的將軍的業績。

他們企圖建立一個新的以色列民族黨，那也是可能的。他們之間意識形態的分歧是最小的；沙隆的政治活動開始於工黨，在他放棄個人意見去找到利庫德集團之前，這時候巴拉克已經解散了工黨，變成一個沒有意識形態的「團結的以色列」集團。

這樣的一個政府和黨，在巴勒斯坦的衝突中，自有澄清真實的政治爭端的效能。十年間，僅只左派中的邊緣力量用上「種族隔離」一詞來描繪以色列的實踐，在以色列國家，同在1967年佔領區，這個術語用得一樣多。

現在這個術語普遍流行於以色列左派之間，事實上不只在左派。9月28日，一份開明的以色列報章引述前安全部頭子阿米·阿雅朗所說的：沒有「真實的」巴勒斯坦國（具有完整主權和經濟資源的）將被建立起來。

以色列只能有兩個選擇：「成為沒有猶太人特徵的國家，或者成為種族隔離的國家。」同時，要求還給巴勒斯坦人的權利被視為偏激的和邊緣的。很清楚，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辦法就是否定它才能生存下去。

以色列米什拉希居民的日益政治化——出生在阿拉伯國家的猶太人，在猶太人的國家裡曾受過種族主義經濟剝削的痛苦，並且組成以色列工人階級的壓倒多數——顯示出建設一個以廣大階級為基礎的需要和發展空間，這個黨將進行反對種族隔離，並且為了全巴勒斯坦人民和那些被驅逐的人民的共同前途而鬥爭。

可是，現在展望有這樣的一個政黨似乎是遙遠的。巴勒斯坦左派垂頭喪氣，加上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領袖佐治·哈巴茲離開了他領導過三十年的組織，而失去希望。

以色列左派成了無舵的和陷於混亂的狀態，在那些人之間產生分裂，他們有些人認為巴拉克和工黨比沙隆或內坦尼亞胡和利庫德較為可取，有些人則認為他們之間沒有差別。

新的力量正在要求恢復權利和反對種族隔離的社團之間發展。現在左派的任務是找出一個辦法，把這兩種力量結合起來，為一個全巴勒斯坦民主國家而鬥爭的民主運動。

從整個形勢看來，二者擇一是顯而易見的了。在可怕的電影中殺害一個受了驚嚇的巴勒斯坦小孩，就清楚地說明了問題。

（楊萍摘譯自《社會主義展望》2000年10月號）



巴勒斯坦人民爭取獨立之戰

瓦爾肖斯基

在過去數年，西岸和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靜觀其變，讓他們的民族領袖與佔領者談判，以尋求一套結束百年來殖民壓迫的全盤協議。現在，巴勒斯坦人得出結論：以色列國仍未打算作出讓步，所以巴勒斯坦人只能夠通過鬥爭來爭取獨立和自由。由美國一手包辦的談判，證明只是一場騙局而已。

「巴解」堅持收復失土

自從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1990年代達成奧斯陸秘密協議以來，「巴解」領袖對於他們希望換取過來的最終地位，從未有過隱瞞：以色列最後完全撤出1967年佔領區；解散以色列在佔領區上建立的猶太殖民區；巴勒斯坦難民有權重返家園；最後，是巴勒斯坦在整個西岸和加沙地帶，包括東耶路撒冷之內，建立獨立的主權國。

而在以色列領袖方面，他們卻是認為——或是被引導認為，巴勒斯坦問題全部是可以討價還價的，即使關乎到巴勒斯坦最終的地位問題，也一樣能夠像過去數年的狀況一樣，以色列是能夠把他們自己的觀念，強加到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身上。以色列還甚至認為，阿拉法特本人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警察，在對待巴勒斯坦人民的公眾輿論時，是可以像對付羊群一樣，把人民弄得貼貼服服。因為，在以色列看來，阿拉伯人民就是一群羊，毫無主見，只有盲從。

巴勒斯坦代表團應該是沒有同意過，會把他們所要求的整體架構予以削減，以圖削足就履。而無論如何，巴拉克在談判桌上，竟然提出了連他的上任內坦尼亞胡也不敢提出的要求，所以便把談判一下子拉倒：他膽敢提議，要對巴勒斯坦人的聖地擁有主權。而不管巴拉克這個提法是出於無恥地無知，或是出於故意挑釁，反正就是使談判完蛋了，而且，這一次挑釁的是非，還不僅有著民族因素，而且還增添了宗教因素。巴拉克在大衛營裡所開啓的，就是在中東——一倘非全世界的話——來一趟十字軍長征。歷史將記下這一筆。而且，歷史也將記下巴拉克這個不負責任的

領袖的罪行：這個人挑釁起一場為解放耶路撒冷而發生的聖戰。

以色列早埋殺機

面對著巴勒斯坦人民的示威，以色列軍隊所作出的反應，絕不是「過份反應」，也不是受到一部份巴勒斯坦示威者和警察之使用了武器而吃驚。以色列軍隊動用了各式各樣的武器來對付示威者，包括用上坦克車和直升機從上空發射子彈。凡此種種，是早有預謀的，已經作了很久的準備。所以，現在所發生的一切，都是按照以色列軍隊的軍事行動計劃而行事的。

超過一年以來，以色列軍方已經接獲指令，要預早作出準備，以便在「巴解」單方面宣佈巴勒斯坦國成立時，能夠迅速作出回應。根據以色列報章的一些內幕消息報道所顯示，以色列軍方所設計的各種行動計劃，目的是要使巴勒斯坦人為立國行動付出昂貴的代價。其中一項軍事計劃更清楚的表明，「必須要有流血」。而事實上，巴勒斯坦人民現在每日每時在流血。以色列軍廣泛地應用紅外線瞄準器射擊槍的原因是很清楚的：毫無疑問，軍隊是接到命令，必須格殺勿論。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上百人，而受傷者無數，他們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價，可是他們仍然表現出不屈不撓的決心。

巴勒斯坦人是不會屈服的。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戰士，已經準備了戰鬥到底；他們向以色列佔領區的目標物作出鬥爭，而戰鬥的形式，可以是群眾抗爭的形式，也可以是游擊行動的形式。而巴勒斯坦人戰鬥的對象，無疑也會針對著以色列，而這便將會導至有以色列平民的死傷。因為，在當下，巴勒斯坦人民的復仇情緒是一概的指向著以色列的佔領、以色列的軍隊，及以色列的殖民區。

還原以色列侵略者的面孔

在過去的數星期，對於巴勒斯坦人來說，最大所得的，是把事情說得清清楚楚，並且提醒以色列和國

際間的公共輿論：以色列佔領的問題仍然是實在的整體架構，而其餘所有問題，包括所謂的「和平進程」，只不過是這個整體架構裡的元素。在這一點上，以色列及其國際社群的大多數，一向是把兩者等同為一的，就彷彿自從以色列——巴勒斯坦自1993年9月在華盛頓簽署了原則聲明之後，以色列的佔領便消失於無形，隨之而來的，就只有這麼的一個「和平進程」。這個所謂「和平進程」令普天下人心安理得，獨是巴勒斯坦人例外。巴勒斯坦人很快便明白，在西岸和加沙地帶部份地區，儘管是發生了不可輕看的變化，但以色列仍然是一如既往的，佔領著西岸和加沙地帶，仍然維持著當地的壓迫機器，仍然在鞏固著猶太殖民區，仍然在盜竊巴勒斯坦人的水源和土地。

巴勒斯坦人民現在的起義，站在前線的，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警隊和阿拉法特屬下的政黨；他們所使用的武器，是自治區內殘餘的，由自治政府控制著的少量武器。

在七年前，「巴解」主席作出了一項極端冒險的、惹人非議的選擇：他決定用停火來換取由美帝國主義作調停人的以——巴面對面談判，他並且因應以色列和美國的要求，作出極端的妥協，採取措施用人民之名來鎮壓那些拒絕讓他作出妥協的人。他的一些最親密的合作者，經常逾越談判的界線，與敵對的一方聯手合作。

不過，阿拉法特和尤其是成千上萬個支持他的戰士，都不是以色列的傀儡。他們最初之所以接受由以色列單方面開出的苛刻條件，只不過是為了在過渡期結束的時候，換得以色列徹底結束對西岸和加沙地帶的佔領，以及在解放了的地區上，以耶路撒冷為首都，建立巴勒斯坦主權國。至於阿拉法特所運用的方法是否良好，歷史自有分解。而就在當前，當以色列向巴勒斯坦人索取他們的最終目標，以色列便發現它回復到原來的起點，反而面對著巴勒斯坦人齊心一致的民族運動，為爭取自由獨立而奮身一戰。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戰爭的第二環

以色列的領袖縱然想過製造流血和作戰，但他們很快便發現，軍事衝突所造成的問題，要比他們所設想的多很多。他們發現，阿拉伯人是團結的。阿拉伯

人的團結，更由於耶路撒冷和立於其內的回教聖廟這些重要的宗教象徵受到危難而更為緊密。阿拉伯人的團結打開了兩條新戰線。

第二條戰線，就在耶路撒冷爆發衝突後的數天展開。這就是住於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公民，他們就在以色列的心臟地區加里尼和華地阿拉區，爆發了真正自發的民眾起義。在維時個多星期裡，過去20年來在打著使「加里尼猶太化」的政策下興建起來的猶太人村莊，受到成千上萬名巴勒斯坦人示威者一次又一次的包圍。就在距離台拉維夫不過50公里的這個地區，多條道路被迫封閉，以防範巴勒斯坦人示威者的石頭和土製汽油彈。而在數以十計的阿拉伯人聚居的村莊，示威者每日和以色列警方發生衝突。就在這個多星期裡，生活在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民眾，齊聲一致的表達出他們對發生在佔領區的大屠殺的憤怒，也表達了他們對過去50年來，他們對這個強加在他們頭上的猶太國家裡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和侮辱的憤怒。

警隊的暴行和一些政治領袖恐嚇要動用軍事統治時代（1960年代之前）對待阿拉伯人的手法，就在以色列全國亮起綠燈，爆發了對阿拉伯人的屠殺迫害。數以百計的以色列青少年聯群結隊，手持棍棒或軍火，進襲數處阿拉伯人聚集的地點，毆傷數以百計的巴勒斯坦人。肇事者又向回教寺和居住在猶太人區的阿拉伯人所住的樓宇縱火。至於以色列警察方面，不僅沒有制止生事者，並且還向自衛還擊的阿拉伯人開槍。在拿撒勒城，由猶太青年鬧事而造成兩死80傷的後果，才使以色列總理明白到事態的嚴重性，因此才對肇事者作出譴責。就在這整場衝突裡，我們看到「波斯尼亞式」的衝突形態：在一個雜居的社群裡爆發的社區間的衝突，其中有一方是受到警察和政府所支持的。

以色列面臨抉擇

以色列竭斯底里的反應和嗜血的行動打開了一個不易痊癒的傷口，這個傷口勢將迫使這個猶太國家要作出一個結構性的選擇：以色列是要堅守作為一個猶太國呢，或是繼續裝模作樣的假裝民主。

毫無疑問的是，生活在以色列境內的以色列阿拉伯公民，是不打算回復到以往的狀況的了，他們會要求實實在在的公民身份。而且，這個要求的堅決程

度，是不容巴拉克用他特派的工作組使出財政預算和工作分配的計策來緩和的。

要是衝突仍然是規限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的關係之內，美國政府是會容許巴拉克為所欲為，隨他的希望行事。可是，屠殺巴勒斯坦青少年示威者的場面，一旦在電視畫面上公諸於世，便在阿拉伯國家及全世界的回教社群內，激發起廣泛的聲援運動。從2000年10月1日開始，由美國一手建造的新秩序的穩定性，便大成疑問。在黎巴嫩，赫茲波拉克的軍事行動有可能蔓延開去，而這些軍事行動假如升級，則一場全面戰爭是會有可能發生的。

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和平標誌著「新中東」秩序的穩定。從黎巴嫩的貝魯特到摩洛哥的拉巴特發生

的群眾示威，以及在帝國主義中心內的回教徒的動員，在在都是警告訊號，向埃及總統和約旦王發出，也是向世界新秩序的真正主子發出。所以，對於美帝國主義來說，便迫切的需要令衝突停止，製造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拉回談判桌上的假象。

不過，沒有跡象顯示，阿拉法特是能夠結束目下發生的起義。巴勒斯坦人不是一群馴服的羔羊，他們不是以色列政府的種族主義所幻想的，可以任由牧羊人驅策。而即使阿拉法特能夠做到那樣，也是不能夠把歷史扭轉，回復到猶太人新年以前的樣子了。歷史已翻過不可逆轉的一頁。

（史丹摘譯自《國際觀點》2000年11月號）

拆解以色列建造的耶路撒冷神話

瓦爾肖斯基

新的分治制度

據國際報章和以色列本土的報章所言，造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無法在大衛營的談判中達成和平協議的主要障礙，就是耶路撒冷問題。在以色列本國，絕大部份評論家都力圖令讀者相信，以色列總理巴拉克已經準備好拱手交出自1967年6月佔領的土地中的9成，準備好同意作出妥協，讓巴勒斯坦難民有回返家園的權力，而且也準備承認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主權國。而據評論家聲稱，達成最終協議的唯一障礙，是如何在以色列所聲稱的擁有對「耶路撒冷」整個地區（即所謂「大耶路撒冷」）的主權，及巴勒斯坦人要求須對包括了西岸被佔領土地的那個「耶路撒冷」的地區行使主權的訴求，無法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妥協。

在新聞媒介所造就的這種印象下，以色列和平運動中人，大多都非常樂觀，他們深信，以——巴不久便會在耶路撒冷的問題上達成協議。他們並且因而遷怒於阿拉法特，認為以色列既然作出了這麼重大的讓步，巴勒斯坦人也應該作出妥協，放棄要求對東耶路撒冷的主權。

我須承認，我並無我那些和平陣營中的友人們那麼樂觀，而且我對所謂在大衛營達成的成就深表懷疑。我最大的保留，首先在於所謂「93%」的西岸的所指？是否指解散在這93%地區上建立的以色列殖民區呢？倘真是這樣，那麼為什麼要在這樣的時刻裡，建立貫通西岸的通道？以色列殖民區及那些數以千里計的通道，在將來的法定地位是什麼？它們是否會繼續納於以色列的主權內，由以色列控制？或是它們會成為法外領土，然而在事實上是納入以色列的版圖？而要是這樣，則所謂一個巴勒斯坦主權國的意義何在？

一個被分割成碎片的西岸，只是近乎一個班圖斯坦的制度〔前南非境內被包圍的純黑人地區，享有有限程度的自治〕，從海岸直到河岸，被連綿不斷的以色列領土包圍。

但，且讓我們相信，現在遺留下來的唯一一個障礙、所謂以色列——阿拉伯爭持的中心問題，就是

「耶路撒冷問題」吧。然而這個問題本身，正是發揮著製造神話、轉移視線的作用。耶路撒冷是怎樣從一個受著以色列控制的城市，迅速轉化成一個把西岸分割成南北兩部份的地區呢？正是這種分割，成為了以色列得以持續不斷的把西岸佔領，同時又妨礙到一個可行的巴勒斯坦國的形成。

殖民兼併的新瓶舊酒

以色列目下作出的「妥協」的主要內容，是容許「市政自治」。在過去6年來，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眾專家和非官方代表在和平談判前夕舉行的大多數會議，這個所謂「市政自治」，皆被所有人反對，因為這個方案完全沒有正視問題的核心所在：政治控制權和國家主權問題。所以，把這個方案重提出來，明顯就是對巴勒斯坦人的冒犯。

再者，所謂「市政自治」也完全不是一種妥協，而僅是以色列最想得到的解決方法：既能對東耶路撒冷享有政治控制和主權，然而又毋須以色列付出一毛錢以為巴勒斯坦人建設當地的醫療、教育和基本建設——還有比這更便宜的打算嗎？在過去6年來，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地帶已經作出實驗，對於自治而同時又毋須負責這種對以色列的好處，已經心知肚明。這就是巴拉克向阿拉法特所作的「讓步」。

製造耶路撒冷神話

以色列用歷史和宗教這兩大理由，拒絕對耶路撒冷做出妥協。在這一點上，巴勒斯坦人是完全可以拿出同樣的論句。但且讓我們不談這個。以色列所提出的理由，完全是用心不良的借口：被以色列吞併，然後納入「耶路撒冷」的那個部份，完全無關乎聖經上所說的那個耶路撒冷。現在以色列這個「統一的耶路撒冷」，完全是個人為的產物；以色列借用「耶路撒冷」這個名稱來製造神話，目的是使猶太人對該地區控制得以說得過去。

猶太人和以色列（這兩者不是一碼子事）對耶路撒冷舊城及其周邊一帶的聖地，不錯是有著索取權——而這些索取權是談判處理的課題——可不過，那些史跡只佔耶路撒冷城的市區地段的3%。至於「耶路撒冷」其餘的97%的土地，既不是只有猶太人居住，而且也全無歷史重要性。由以色列在1948-67年

實行統治、作為其首都的佔地38平方公里的「西」耶路撒冷，只是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發展起來；而且，到1948年時，巴勒斯坦人擁有該地40%的村莊、財產和商業樓宇。西耶路撒冷之所以成為只有猶太人居住的地方，除了在Beit Safafa一處之外，其餘全是由軍事佔領所造成的人為產物，而並非由猶太人「自自然然」地通過聚居而把該地的「重要性」表述出來。至於曾經在約旦治下的「東」耶路撒冷，卻是只有6.5平方公里的面積（包括了耶路撒冷舊城及周邊的史跡）；而這個部份其餘的63.5平方公里——也即是被以色列在1967年吞併為「東耶路撒冷」的90%的土地——實際上是巴勒斯坦人原來位於西岸的28個村莊。這些村莊的所在地，在一夜之間忽然變成了「隱形的」、「史跡上的」和「神聖的猶太人城市」。

以色列現有的「東」耶路撒冷，比起1967年之前由約旦所統治的耶路撒冷，在面積上大10倍，但它卻沒有多少巴勒斯坦人的人口，儘管巴勒斯坦人其實是該片土地上的城鎮的運作要員。在1967年時，以色列當時的國防部長達揚向當今的極右派領袖澤耶維作出指示，重新劃訂市際界線，其中的指導原則，便是「劃入盡多的土地，盡少的巴勒斯坦人」。而澤耶維其所屬的極右黨派，也是主張把巴勒斯坦人「轉移」到其他國家去。

在1967年時就猶太人——阿拉伯人的人口劃訂的人為的比例，約是3比1之數；這個比例，自此便正式地成為了城市建設的基礎，無論從發展房屋建設、財政預算、道路及基礎建設、社會服務，以至耶路撒冷的未來發展，都是按照這個基礎來制訂（雖然在耶路撒冷市內，阿拉伯人的比例，已經超過了30%）。在設計和治理一個城市時，竟然是以由一種人口佔支配地位控制另一個人口為出發，並且還正式地採納這種歧視政策，這本身已經是很糟糕的了；可是，還要把這樣的一個城市稱為「統一的」城市，則乾脆就是行詐。

以色列通過用劃分區域地帶、發牌制度和拆毀「非法」房屋等限制巴勒斯坦人房屋、限制他們使用自己的土地的政策，遂成為了以色列人為地支配耶路撒冷的機制。在1967年，被釘上「東耶路撒冷」給標籤的這片70平方公里的土地，附加進了面積38平方公里的「西耶路撒冷」。

進行了這個「統一」之後，以色列幾乎是立即著手展開「猶太化」。「統一」後的「耶路撒冷」，其中有35%巴勒斯坦人的土地立即被政府沒收，用來專門為猶太人建造大型房舍。而另外，有54%的巴勒斯坦人的土地，給宣佈為「綠野」，嚴禁巴勒斯坦在其上興建房屋。換言之，時至今天，東耶路撒冷只有11%的土地（以城鎮計，只有7%）可供佔了全市3分1人口的巴勒斯坦人使用。

以色列的政策是很清楚的：把巴勒斯坦人規限在禁止自由出入的貧民窟內（以迫使有意追求較好生活的巴勒斯坦人離開以色列國境，到他處謀求發展）；確保在城之東，在巴勒斯坦人聚居之地的內部，到處分佈建立猶太殖民區，以確保以色列的統治優勢；因而，使巴勒斯坦人在城內不能發生什麼有意思的政治活動和影響力。在今天的「東」耶路撒冷，猶太人的數目遠超過阿拉伯人。使巴勒斯坦人邊緣化，及使西岸巴勒斯坦人的領土支離破碎的做法，繼續雷厲風行。

在耶路撒冷內外，通過運用歷史和宗教形象來製造的神話和一盤混賬，令「耶路撒冷」這個題目使人暈頭轉向、混亂和扭曲。這個所謂「統一的耶路撒冷」，是用來向整個西岸中心地帶擴張統治的楔子。我們除非掀去隱藏在歷史和宗教後的煙幕，否則便無法理解巴拉克所謂作出妥協的實情。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麼巴拉克輕而易舉的就願意把以色列最強項

的史跡耶路撒冷舊城拿出來，作為談判的妥協對象，但對於位在耶路撒冷和「大耶路撒冷」之間的一大片空地，卻是堅持不讓。他寧可讓出猶太廟的聖地所在地，卻拒絕交出一個工業區，顯見巴拉克的考慮並非出於什麼宗教神聖性，而是出於戰略性。以色列左派也會被這種以宗教為借口的煙幕欺騙，尤為令人不安。而這麼一來，他們更加深以色列製造的神話了。

用人民權利作抗衡

用人權和國際法的話語是能向以色列政府用「歷史權利」為口實挑戰的唯一方法。而這能導至兩項——並且只有兩項——的解決方法。第一，是根據國際法（嚴限用武力非法侵佔土地）和聯合國第181決議案，要求以色列撤出東耶路撒冷，並最後全面撤出西岸佔領區。這樣一來，東耶路撒冷便可以成為新成立的巴勒斯坦國的首都（並且，或許還包括西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園和獲得賠償的權利）。另一種出路，是以色列軍遵守聯合國第181決議案，全面撤出整個大耶路撒冷；這樣，便會導至建立一個在國際控制下的分離體，即聯合國原有的分割計劃。至於任何其他出路，將會是缺乏認受性，因而不會長久，並且會為新一輪的戰爭鋪平道路，招來比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更大型的民族勢力和宗教勢力。

（史丹摘譯自《境內來的新聞》2000年9月號）

黎巴嫩局勢新發展

哈達德、霍尼格—柏納斯

〔在耶路撒冷出版的《來自內部的消息》的霍尼格——柏納斯訪問了在巴黎居住的雅伯，談黎巴嫩近期的政局變化。雅伯參與編輯《阿拉伯馬克思主義評論》（AL-Mitraqa）多年，並經常為《國際觀點》撰稿〕

問：赫茲波拉克運動的勝利，為打敗以色列佔領的綜合

戰略（軍事和政治的）提供了一個廣闊的藍圖。你能就它在其他地方照辦煮碗的可能性作出評估嗎？

答：若是要在其他地方照辦煮碗，我們需要把你們所言的「廣闊的藍圖」所包括的各種元素分門別類來看。你們提到軍事的方面，那就讓我們先說這方面：我認為，黎巴嫩地勢方面的特性，對於阿拉伯世界應

該是顯然不過的；這猶如在華盛頓，對於那些把1991年波斯灣戰爭看作美國進一步介入中東的「廣闊的藍圖」來看待的人，伊拉克地勢的特性是顯然不過的。

在這方面，我是指伊拉克的沙漠地勢使空襲的優越性得盡其利（1991年為期6周的對伊拉克軍隊的地氈式空襲，與「北約」在1999年轟炸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的慘淡結果，兩者形成鮮明的對照，就是一個證明），然而在面對著南黎巴嫩山脈連綿、人口眾多的地勢就得在把「廣闊的藍圖」推廣之前，先行三思了。

不過，縱然有這麼一說，但必需首先強調，南黎巴嫩這一次勝利，並不是一次「軍事」的勝利。以色列軍在軍事方面並沒有被打敗：它沒有像美軍在越南戰爭般筋疲力竭。而即使在越戰，若說它是軍事失敗也是不得當的：以色列和美國這兩場戰爭，首要的是兩國政府在政治上都失敗了；侵略國的人民是愈來愈不願打這一場仗。

因此，主要是軍事行動在它所造成的政治衝擊裡找到價值，而不是在它所造成的軍事衝突裡找到價值。黎巴嫩抵抗運動反佔領的游擊活動，即使從規模上來說，是遠遠無法與越南的抵抗運動相提並論的。前者主要是對以色列人民產生衝突，就像在越戰期間，美國兵士的棺木運抵美國而對美國人民造成的衝突相若。兩個侵略國的人民，都是日益反對為這場在道德上無法成立的戰爭費力。

以人反對侵略黎巴嫩情緒日益高漲

以色列在1982年全面進侵黎巴嫩之初，已經遇到人民反對的經驗。以色列在1982年撤出貝魯特，在1985年撤出大部份黎巴嫩佔領區，主要就是由這項事實造成的：以色列人民不能支持一場即使從復國主義主流派的觀點來看，在道德上也是說不過去的佔領，正在每天使以色列的士兵面對死亡。所以問題是在於佔領所須付出的得失代價：以色列佔領哥蘭高地是得多過失，而在南黎巴嫩卻顯然是相反。

我們以此來推斷巴勒斯坦的佔領區吧：在20年間，從以色列的「保安」觀點來看，佔領是得多過失的。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軍事行動，無法抗衡那種認為擴闊約旦河的邊界線是更保安全的想法。但當民間

反抗運動Intifada的群眾運動出現之後，局面大為扭轉。它使以色列軍的士氣和以色列的名譽在她的支持國眼中很不光彩，以色列為此而需要付出的代價是無法承受的。在以色列軍隊裡，從下級士兵到上級軍官，都產生了高漲的壓力，贊成撤出口稠密的地區，改而在人口稀疏的西岸戰略地點作駐軍。

正是來自軍方的這種壓力，促使前以色列總理拉賓進行奧斯陸談判。他希望借助在過去多年裡一再讓步、一再投降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領導層方面的軟弱，榨取以色列用撤軍換取的最大的收益。而拉賓是得到了，而且多過他與阿拉法開始談判之初所渴望得到的！阿拉法的領導層沒有讓佔領區內的Intifada領導層來談判，而卻是由巴解組織來談判，他沒有乘著Intifada造成的氣勢來乘勝追擊，爭取用最少的讓步來獲得以色列撤出口稠密的佔領區，反而是作出連一些復國主義政論家也稱之為可恥的投降，從而造成持續至今天的劣境。

赫茲波拉克的行事正是與阿拉法領導層不同，前者是絕不妥協的一再施加壓力，迫使以色列無條件地撤出從1978年以來佔領的黎國土地（這是1967年戰爭的殘留物）。這的確是個無與倫比的勝利！是值得巴勒斯坦人沉思的功績，並且從中獲得啟發。

問：赫茲波拉克的勝利在多大程度上給帝國主義在中東地區的議程刮了一個耳光？我們從中可以有什麼期待？

答：黎巴嫩的勝利，的確是美國議程的失敗。美國就像其盟友以色列一樣，本來是把撤軍問題納入為敘利亞和平協議問題的一部份，作為其整個項目之一來使以色列取得種種條件、讓步和保證。而且美國素來把以色列作為「最出色」的美軍代理為榜樣。但現在以色列卻要撤軍了，而且是以兵敗如山倒之勢來撤出，情況一若美國1975年在越南的兵倒之勢，而且，巧合的是，也是在美國撤出越南的25週年發生哩！這是越南抵抗運動的名句：「排除萬難，爭取勝利」的歷史重演。這將會把那些曾經一度反抗帝國主義支配，而現在充斥著失敗主義的風氣扭轉；這是指日可待的了。

不過，就美國對中東的整個議程方面來說，以色列議程的主要變化（而這肯定將會融入到美國下任政府的議程之內），是與敘利亞訂定和平協議一事，將

會推到遙遙無期。復國主義建制肯定不會爲了和敘利亞建交而熱衷於交出哥蘭地區，而且雙方的關係無論如何都不會「正常」。況且敘利亞獨裁者哈法爾·艾·亞薩德已經瀕臨死亡邊緣，在敘利亞的政治前景極不明朗的局面下，他們更不會熱衷了。

問：為什麼只是由赫茲波拉克獨攬勝利之名？其他如巴勒斯坦人、黎巴嫩左派不是也投身到抵抗運動裡嗎？倘若不是，哪又是什麼原因？

答：赫茲波拉克派之所以看來像是唯一一個勝利之父（有這樣的說法：勝利通常不只一父，而失敗卻只有一個孤兒），乃因爲它盡其所能的把抵抗運動的聲望獨佔。繼1982年以色列進侵後，在抵抗佔領者的鬥爭裡，有兩個派別互相競爭，勉強共存：一支是由黎巴嫩共產黨控制的「黎巴嫩國民抵抗」，另一支是由赫茲波拉克派控制的「伊斯蘭抵抗」。

黎巴嫩抵抗運動內望

至於在南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早已被以色列侵略者殲滅一清，殘留在難民營的人實在不是對手了。再者，一些黎巴嫩力量諸如阿邁勒領導下的什葉派地方自治主義者，是著力的嚴防巴勒斯坦人的力量擴散出難民營之外。阿邁勒派仍然健在——他們也有份收復以色列及其代理所放棄的土地，但已經不是抵抗運動的主力；他們在很久以前已失勢於赫茲波拉克派，現在已成爲一個純然保守和門徒制的政黨。

赫茲波拉克爲建立對抵抗運動的壟斷採取了各種做法，包括殺害共產黨人，尤其是其中一些重要的什葉派幹部。而共產黨的回應卻是極恭順之能事，反而呼籲伊斯蘭抵抗中的兄弟要有「兄弟般」的舉止。由於沒有用果斷的行動來表明謀殺行爲會造成的惡果，這種呼籲，結果當然是無人入聽了。這種行爲漸漸的便使赫茲波拉克處在上風，使黎巴嫩左派中最富戰鬥性的什葉派被吸引過去。

我們應該記得，在1975年黎巴嫩內戰之初，那時赫茲波拉克還不存在，而共產黨是南黎巴嫩的什葉教人口中最主要、最富戰鬥性的力量。過了1982年，共產黨首先被阿邁勒派佔了上風，接著就是赫茲波拉克。後兩個組織，都是在共產黨的同一個選區裡競逐，也即是在南黎巴嫩最富戰鬥性的什葉派人口中

競逐，所以最畏縮不前的組織便注定要落敗。而要是這個組織甚至不敢拿出本身最激進的綱領來示人，那便更要落敗不可。

在這一點上，赫茲波拉克是佔盡優勢的，由於他們具有一種半神秘的烈士觀，所以在行動中十分勇敢。此外，他們也很聰明地懂得利用來自伊朗的大量金錢，在貧民區裡組織各種社會服務。至於蘇聯倒台對左派的不利風氣，也肯定的被赫茲波拉克盡情利用。

原教旨主義得到助長

問：赫茲波拉克的勝利對黎巴嫩裡的各種政治力量有什麼含義？對巴勒斯坦難民和整個地區，又有什麼含義？

答：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這將會助長赫茲波拉克在黎巴嫩和伊斯蘭原教旨派在整個地區的吸引力。在黎巴嫩裡，由於該國人民有各種宗教信仰，從而給赫茲波拉克的影響力形成了客觀的困難。

由於赫茲波拉克信奉的伊斯蘭普世觀，所以使他們成爲巴勒斯坦人所追求的事業的支持者，所以赫茲波拉克對巴勒斯坦難民不會是個威脅。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在黎國裡實際會成爲了巴勒斯坦政治力量（例如阿拉法的忠實信徒或左派異議者）的競爭對手，他們大概最能助長巴勒斯坦人中的伊斯蘭原教旨派的傾向。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的勝利也是阿拉法的厄運。在西岸和加薩地區，由赫茲波拉克的勝利多份將只會使哈馬斯派在巴勒斯坦人間大幅冒升。一般來說，這次勝利對整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是彌足珍貴，使它能抗衡近期在伊朗發生的事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那些以爲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已經被埋葬的人，將遇到當頭棒喝。只要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體現最底層人民大眾的熱望方面沒有遇到真正的對手，只要「全球化」的社會效應一天尚存，原教旨主義者便會仍然活躍，哪怕自然是有上有落。

（史丹譯自《國際觀點》2000年6月號）

兩千年來反猶太人的謊言

蔚然輯譯

最近幾年來，在歐洲，特別是在俄國和東歐，出現一股公開的反猶太主義的勢力。

為什麼在歷史上會出現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不同的形式來迫害猶太人的事呢？除了有種種歷史的「直接」因素，一個主要的、持久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兩千多年來的基督教文化。

基督教的《新約全書》就是歷史上反猶太主義的主要文獻之一。卡爾·考茨基的《論基督教基礎》一書的論述指出，《新約全書》的作者們一開始便蓄意有計劃的醜化猶太人，把他們當成是殺害基督的兇手，以激發對猶太人的仇恨。作者們捏造許多虛構的自相矛盾的有關基督之死的故事。考茨基在書中說到，發生在兩千年前的事件，即羅馬帝國佔領了猶太人的家園，引起了猶太人的強烈反抗。猶太人的上層分子謀求和平妥協，而下層人民則堅決鬥爭到底，由此分裂為撒都該人、法利賽人和吉拉德人（狂熱派）等宗派。在公元70年，羅馬入侵者竟把耶路撒冷夷為平地，把全部猶太人驅散到帝國的各地方去。

早期基督教徒是猶太教徒的一個宗派，他們懷有宗派感情憎恨另一部份教徒。隨著時間的推移，由保羅領導的佔領導地位的基督教小宗派不願承認自己是猶太教徒，但不久，他們又要求改行猶太人的割禮。直至四福音書，即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寫成之時，他們還聲稱基督徒同猶太人的對抗是十分痛心的事。

但，在此後的300年間，基督教發展壯大起來，變成一股強大的勢力。到四世紀初，竟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由是基督教便同國家權力結合在一起了。自此之後，《新約全書》的故事，它的思想、它的風格色彩，便成為千百年來藝術和文學的主題。

多少世代以來的兒童，都受到作為神諭的《新約全書》惡意編造的故事的毒害。直至今日，在基督教的教義問答中，有這樣一個提問：「是誰判耶蘇基督死罪？」兒童從五歲到六歲便把這一提問銘記在心。答案是什麼呢？那就是：。「是羅馬統治者按照猶太

人的願望幹的」。最近，天主教教會宣稱「取消」猶太人導致基督被害的說法。這對兩千年來為此受到迫害的千千萬萬猶太人來說，是「太遲了」。

在中世紀，有許多文獻史籍都遭到毀滅、遺失了，據說有一本名為《天國元老備忘錄》的書，被它的信奉者保存下來，是一本為未來的猶太人留下來的猶太人要統治全世界計劃的紀錄。事實上，這是本世紀初沙皇俄國政治警察、基督教徒的極端分子奧赫倫娜（Okhrana）偽造的書。這本書在本世紀曾產生巨大的影響，它重塑了傳統的基督教徒對猶太人的仇恨，可稱得上是《種族滅絕委託書》。

這些虛構的書可怕地掩蓋了文明發展的真實歷史。

斯大林主義統治者要利用基督教徒反對猶太人的運動，鼓勵這個運動。他們竟把基督教徒反對猶太主義編入他們的《備忘錄》中。許多左派中人，為他們正直的高貴的同情心所迷惑，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同以色列猶太人國家的衝突中，竟不加區別地接受斯大林主義加工過的古老的基督教徒反猶太人的謊言。

卡爾·考茨基對反猶太主義的論述，直刺《新約全書》這個兩千年來歐洲文明的心臟。對今天在「反猶太復國主義」的假面具下，一直受到「反猶太主義」毒素影響的眾多左派份子，仍是一股必需的解毒劑。

馬克思主義從來是以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考察宗教衝突的問題的。恩格斯在《論反猶太主義》中指示，「反猶太主義無非是中世紀的、垂死的社會階層反對由資本家和僱傭工人組成的現代社會的一股反動逆流，……」「反猶太主義者」根本不了解猶太人，猶太人中有「成千上萬的無產者」。我們能一律地反對猶太人無產者嗎？恩格斯還風趣的說，我們在很多地方還要感謝猶太人呢！比如，海涅是猶太人，哥白尼是猶太人，馬克思更是「純粹的」猶太人呢！（托洛茨基也是猶太人。）

2000, 3, 24

什麼是經濟全球化？

加特

過去二十年內，世界貿易、海外投資、各公司間的國際合併等大量增加。這就是談論全球化新經濟的幕後一切。

這是否就能說明世界經濟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呢？這一問題並不僅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一個學術性問題。如果根本性變化已經發生了，在反對剝削和壓迫鬥爭中，那我們就不得不重新思考我們對經濟的分析以及我們的政治綱領了。

然而，我們仍然堅信，所謂「全球化」是在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時代範疇內發生的。馬克思主義歷來強調，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超越民族國家的界限。早在1847年，馬克思便寫道：「產品要求不斷擴展市場的這種需要，驅使資產階級要在整個地球表面相互角逐。他們到處營造窩點，到處定居下來，到處建立聯繫。」

列寧所補充的就是，要認識到最大的資本家在海外所追求的不再僅是為了市場，而是為了有利可圖的投資場所。他們在國內已經碰到了高度發達的工業和不斷加強的勞工運動——但在非洲、印度、中東等地，歐洲資本家還可撈取巨額利潤。

「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驅動力，便是因宗主國中最大資本家公司的成就和壯大而製造出來的重重困難。帝國主義新時期的特點就是資本家力圖克服這些困難問題所形成的後果。

列寧將其歸納為：壟斷化，依賴國際貿易，資本輸出，金融財政的寄生性以及帝國主義列強間的對抗競爭。

壟斷化

最近十年，令人印象深刻地證實了列寧關於壟斷趨向的論據。合併和接管浪潮一波接一波，而且規模不斷地擴大。1995年以來，單在歐洲，公司合併的價值從1千億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1萬5千億美元。同樣的進程也可在亞洲找到，1998年，亞洲處於金融危機期，而公司合併的價值竟比1990年高出三倍以

上。就全球範圍而言，這種合併的價值數字，從1990年的4千億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2萬5千億美元——毫無疑義，從那時以來數字還會繼續增大。

由於上述進程的結果，主要壟斷公司的支配權也在增大。國際結算銀行的報告指出，在九個先進的（亦即帝國主義的）經濟實體中的每一個，在1990年與1997年之間，最大五家銀行的市場佔有額在增長。這種進展情況在汽車業中看得最明顯。最近十年開始時，10多個康察恩（公司）控制了世界市場的70%，而今天只需5個大公司便可控制同樣的百分比。

然而，在所有這些情況中，值得注意的是，大量公司合併在國際上不斷地發生。1998年，約四分之一的合併，是在不同民族國家的公司間進行的。今天，大的壟斷公司有意識地制訂出一種戰略政策，即收購規模較小的公司，以便立足於外國市場。例如：荷蘭銀行接管了美國銀行家信託公司，戴姆勒·奔馳公司（Daimler Benz）收購了克萊斯勒公司（Chrysler）。

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4.4萬家跨國公司通過其20萬家的子公司主宰著世界，但這些數字還遠不能反映其全貌，最具活力、最具領先技術的產業亦為他們所操縱。同樣地，他們不僅控制著絕大多數的科研及開發項目，而且大量的世界貿易也掌握在他們手中，在每一跨國公司內部所成交的貿易就佔全部貿易的三分之一，並且另外三分之一世界貿易是在他們之間進行的。

迄今為止所不變的是，這些跨國公司始終以本國為基地，平均三分之二的產品及勞動力留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裡。我們也不要忘記這並非全球性的統一發展，因為佔85%跨國公司都以帝國主義宗主國為基地的。

貿易及資本輸出

作為經濟全球化的結果，世界貿易及資本輸出的

重要性已有大幅度地增長，或者更確切地說，資本生產和資本流通的國際化已大有增長。

世界貿易的增長遠遠大於生產。1950年以來，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已增長了5倍，而世界貿易比之GDP來增大16倍，如今世界貿易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前所未有的。值得強調的是，因為某些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全球化」是局限於貨幣資本投機的範圍，所以這一點並不影響貿易和生產。

統計數據表明，1870年世界商品出口總數為全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5%，到了1913年，即帝國主義時代的初期，也只不過增長到9%，到1950年曾一度降為7%，但如今居然為13%。

資本輸出的國際化傾向，就更顯而易見了。在1970到1985年期間，資本輸出與商品貿易基本持平。但在1985年到1995年期間，貿易輸出僅為3倍，而資本輸出就達到6倍。自1980年以來，外國直接投資的增長，比之國內投資增長快了3倍，而世界範圍內，外國直接投資（FDI）相當於10%的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是1980年的2倍，而且高於以往的最高點，即1913年的9%。

寄生性的滋長

在他們本國市場缺乏生產投資的機會，促使壟斷者不僅去尋求海外投資，而且還要進行投機性的投資。股市的大幅度上漲，更具複雜的金融手段多樣化，例如期貨、規定期內的自由選擇權、各種派生手段以及貨幣投機等等，無不來源於此。僅一天之內，貨幣交易達15,000億美金。相比之下，商品出口約為250億美金。

顯然，這是在貨幣資本範圍內，「全球化」是最先進的，因為不斷增長的資本剩餘，投入生產後無利可圖，若同新技術結合起來的話，只要鼠標一點，幾秒鐘內就可把數十億美元送到全球各地去了。

帝國主義統治

正如列寧所指出，資本主義的擴展必然伴隨著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統治，亦即現今所說的「第三世界」的統治。最近一個階段，人們採取了強制性「解放」的形式。所謂強制性解放的意思，就是取消了所有得到帝國主義支持的公司的保護，舉例來說，國際

貨幣基金會的貸款，是以免除海關稅率，及國家對貿易和生產有關規定為條件的。

這樣，也就允許多國公司在經濟上獲得了更大的控制。例如，20%巴西銀行業，以及40%委內瑞拉和阿根廷銀行業，現已受控於帝國主義。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外資投在「發展中國家」，從4%增到11%，投在亞洲平均為9%，而投在拉丁美洲的外資則超過了11%。

危機與衝突

如果說「全球化」意味著民族國家已失去重要性，或者說世界經濟已進入以世界公司為基礎的一體化階段，這是嚴重的錯誤。然而，要是我們把「全球化」解釋為：生產力以空前未有的規模超過了民族國家界限，並容許帝國主義列強，在形成世界經濟過程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那麼以全球化來表達今天的發展，那就是正確的表達了。

正像「壟斷資本主義」不應解釋為僅有一個極具實力的資本集團一樣，全球化也並非指僅僅創立一體化的穩定經濟。與此相反，我們事實上看到的是不僅強大的帝國主義的控制，也看到了明顯的傾向，即在帝國主義列強之間建立起區域性集團。

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帶來自身矛盾。不論這是投機性金融流通量的不穩定，會加速亞洲經濟危機，或者在美國與歐盟之間加強了對農業附加物的操縱，但潛在的國際衝突仍然潛伏著。「自由貿易」對虛弱無力的經濟部門的衝擊，會刺激保護性措施、或加速防禦性聯盟的形成。

與此同時，經濟全球化，使民主國家內反資本主義鬥爭的不可能更加突出起來，而且更加突出創造真正的全球經濟體系。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既不能改變列寧所分析的基本原則，也不能改變由此而來的國際革命的進程。對於絕大多數世界工人和被壓迫者來說，最明顯不過的需要，便是組成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世界性的黨。

（黃申譯自《社會主義展望》2000年7-8月號）

反全球化青年運動在興起

塔利

〔反對資本主義藉「全球化」之名而擴大剝削的鬥爭此起彼伏。在2000年9月，除了在捷克布拉格有反「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大示威，在地球另一端的澳洲，也有反對另一個國際資本主義機構的群眾示威〕

「世界經濟論壇」（WEF）的亞太分部，在2000年9月11-13日在澳洲墨爾本舉行會議，在這3天裡，強達15,000人的群眾示威在會場外面進行了堵路行動，取得重大成功。

為期3天的堵路行動成功地不時把會議打斷，與會代表不得其門而入。這次抗議行動是由一個名叫「S11陣線」發起，「S11陣線」是由各種左派力量組成的鬆散聯盟，包括有社會主義者、無政府派、工會人士、環保人士、土著團體、教會團體及反對第三世界債務的活動分子。陣線所打出的行動口號有：「從西雅圖到墨爾本，抗爭大企業貪婪」、「為全球公義和生態環境挺身而出」。

除了3天堵路行動，抗議活動還發起一個集大成的「勝利遊行」，在墨爾本的商業中心區遊行。這個遊行的最大特色是有一幅特大型的旗幟，寫上了全體參與堵路行動的個人和團體所致送的聲援訊息，突顯出抗議行動的團結性。這幅旗幟將會由示威者攜往布拉格，參與9月26日在布拉格舉行的反對「國基會」會議的抗議活動。

這次抗議行動顯示出，從去年西雅圖的大示威開始，全球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興起正在蓬勃展開。而墨爾本行動中最令人振奮的方面，是在整場鬥爭裡，參與3日3夜不停的堵路行動的示威者，都相當的年青，參與者中有許多中學生，顯示了青少年已經接上棒，為老一輩的活動分子帶來清新的希望。而雖然在3天行動裡，政府出動了2,000名警察，而且傳播媒介一再謊話連篇，捏造攻擊示威者的種種口實，但示威者仍然堅持在警察暴力之下，堅持非暴力的紀律。示威者手挽手，或坐或站的在會議會場通路攔截與會者，當遇上警察襲擊，示威者仍是拒不還手。

澳洲總理在示威期間，向工會的領導層施以極大壓力，要求工會杯葛行動。不過，在3天裡，有成千

上萬名建築工人和五金工人，不斷組織遊行活動，到堵路現場打氣。成功的堵路行動，令許多與會代表不得其門而入，無法開會。而由於示威者成功的堅持非暴力，致使警察在整場行動裡，只能拘捕共12名示威者。

全球大規模貧困化的陰謀

「世界經濟論壇」的主管聲稱，這個組織並無實質權力。但事實上，這是世界最財雄勢大的人物的俱樂部，代表了全世界最有權力的個人和集團，成員包括有全球1千個最大跨國集團的總裁，銀行、世貿組織、國基會、亞洲發展銀行的代表等。

這個組織在1971年創立，最初名為「歐洲管理論壇」，在1987年時，易名為現有的名稱，以「反映日益增長的全球性展望」，其成員以經濟部門分組，如紡織、紙漿、礦業等，參與的大企業有硯殼石油、波音公司和Nike等。至於它的活動，例如該會的刊物所承認，包括有策動創立「世貿組織」，將之取代「關稅及貿易總協定」。而它當前的工作之一，是策動舉行「世貿組織」2000年談判，以爭取設立「服務業總協定」，以達到「逐步取得更高程度的自由化」。

誠如「S11陣線」所指出，「世界經濟論壇」的議程，是要推行「全球大規模貧困化，令貧富不平不斷擴大，向工人的工資、工作條件、職業健康安全和工作間的安全水準攻擊，向生態環境和人權施暴」。

在世界各地，反對全球化的運動已在波瀾壯闊地展開，有愈來愈多工人、學生、農民、環保人士等加入抗議行動。這個運動是廣闊的、多元的、民主的、反資本主義的，它具有國際主義的精神，它將證明，資產階級理論家所聲稱的論斷：自由市場式的資本主義是「歷史的終結」，這個斷語是大錯特錯的。

投進鬥爭的新生代，不會停留在這個膚淺庸俗的見解，他們將會為爭取一個更好的世界而鬥爭！

（史丹輯寫自《國際觀點》2000年9月-10月號）

捷克反「國基會」峰會前夕

《工人權力報》訪問

〔國際貨幣基金會在2000年9月於捷克首府布拉格舉行會議。到了9月，也標誌著捷克實行資本主義復辟10年。本文訪問「捷克社會主義工人組織」，談關於資本主義復辟對工人所造成的衝擊，以及有關在布拉格動員反對「國基會」會議的狀況。這個訪問是在「國基會」會議召開前進行〕

問：反「國基會」的抗議，對捷克的工人和青少年為什麼是很重要？

答：繼斯大林主義倒台後的10年裡，在捷克進行了無情的資本主義復辟，給生活水準、實質工資和工作條件帶來大倒退，令大多數工人蒙受損害，並且帶來了50萬名失業者。

這個「演變」的過程，是由「國基會」作的監督。而在事實上，這種演變，是把前斯大林官僚的一個層份和有組織的犯罪者變為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把工人大眾變為比斯大林主義時代更為貧困的一個階級。

「國基會」和「世界銀行」在布拉格舉行的高峰會議，遂使到革命社會主義者有了機會，把帝國主義對這個國家的支配的課題提出來，把國家大規模削減社會開支是與國家和世界帝國主義融為一體有互為關係的這一點加以暴露。大規模削減開支打擊了工人階級。藉著舉行高峰會議這個時機，也將有機會提出國際支援捷克工人這個思想。

要是這次抗議行動是成功的話，將會有助於改進捷克共和國的階級鬥爭的條件，及有助於打碎改良主義領袖對捷克工人的控制。

問：在組織「布拉格與西雅圖看齊」的鬥爭活動裡，試圖組織一個由激進青年和有組織的工人組成的聯合陣線，這當中出現什麼問題？

答：有兩方面的問題。工人組織的領導層和激進青年的領導層。捷克主要的工會聯合（CMKOS）實際是由

「捷克社會民主黨」所領導，這個黨是政府的一分子，而政府則是「國基會」會議的東道主。所以，很顯然的，「社民黨」是盡其所能的制止工人參加抗議行動。

另一方面，捷克共產黨是會參與抗議行動的，所以在這一點上還是有著機會。不過，捷共是通過其控制下的工會聯合（OSCMS）而參加的。OSCMS的規模，比起CMKOS是細小許多，不過捷共在工人階級裡享有廣泛的支持，尤其是來自最富戰鬥性的工人的支持。

在以布拉格為基地而進行組織抗議行動的INPEG（「自主反對經濟全球化」網絡），是由無政府主義者和生態運動者所領導，但他們是不和捷共合作的。教人驚奇的是，作為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姊妹組織的捷克「社會主義團結」和另外一個無政府工團主義團體「團結」，卻不反對INPEG的政策。「社會主義團結」實際上甚至保衛INPEG的政策，認為捷克共產黨控制下的工會OSCMS，實際上是斯大林派的餘黨，所以不值得和它們合作。他們的態度，是寧可爭取與獨立的工會聯合組織ASO的合作。

我們的立場是：我們會是第一個站出來贊成爭取與ASO合作，但我們同時也認為，一個成功的反「國基會」的抗議運動，需要有一個群眾性的運動才能達至，而這便要求左翼組織要有共同的行動。「社會主義團結」既然支持INPEG的政策，不容許捷共團體參加進去，便使左翼不能走在一起了。

OSCMS實際上是一個細小的工會聯合組織，但卻是在日益壯大。而由於「社會主義團結」的排斥行為，更使OSCMS正式地採取了支持反「國基會」的抗議運動的立場。

問：捷克青年人的狀況是有多惡劣呢？年輕人是否把「國基會」和「世界銀行」視為敵人——還是他們認為舊有的共產主義政權需要負責？

答：青少年的狀況，尤其是來自工人階級和中下階級的青少年的狀況，是愈來愈惡劣的了。學校的經費是愈來愈少，這使教育費成了許多家庭難以負擔的開支，把子弟送往受教育也有困難。而在年輕人中，失業情況是嚴重的，尤其在波希米亞北部和莫拉維亞北部的地區，年輕人根本就無法找到工作。還有，政府的掃毒運動也令年輕人深受壓迫——這個運動是旨在把年輕人打為罪犯，讓警察可以對他們為所欲為。

大部份年輕人皆沒有明確的政治見解，但他們普遍都傾向於反叛。近期流行在街頭舉行舞會的風氣，就是這種情緒的反映。他們群集一起尋歡作樂，然後是在街上橫行，令城市活動中斷；在前南斯拉夫的戰爭（北約轟炸南斯拉夫）期間，他們與所憎恨的警察衝突，向適得其所的目標如麥當勞漢堡飽和美國大使館進行攻擊。

青少年是否把「國基會」看作為主要敵人，這很難說得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他們許多人對於所謂「共產主義政體」的官方宣傳已經感到厭煩……愈來愈多人看到這裡全然沒一點兒的「共產主義的」東西。

問：在來臨中的在布拉格出現的國際動員裡，你們希望能夠有什麼收穫？

答：在捷克共和國，我們需要有一個群眾性的革命工人黨；我們把我們全部的鬥爭和戰術，都聯繫在這個目標之上。

我們希望，為期一周的抗議行動，將能夠給工人以啓迪，激勵他們為爭取自己的利益而鬥爭；同時，在捷克這個高度帶有民族主義文化的社會裡，把國際主義的精神帶入捷克的工人運動。我們更希望，在布拉格的成功動員，能夠有助於捷克左派在政治上成熟，從而在行動中團結，並且使到互相支援和同志式的討論成為政治文化的常規——目前，在我們的政治文化裡，這些皆屬於例外。

而看來，有關團結統一的課題，將會變得矚目顯著。捷克共產黨的青年團KSM已經向極左派和眾左翼團體提議，共同組成一個「反帝國主義陣線」。此外，「社會主義團結」也談到，在「自下而上的社會主義」的活動裡，是有著統一的需要。不過，他們同時也特別強調，他們的訊息是向著其他無政府主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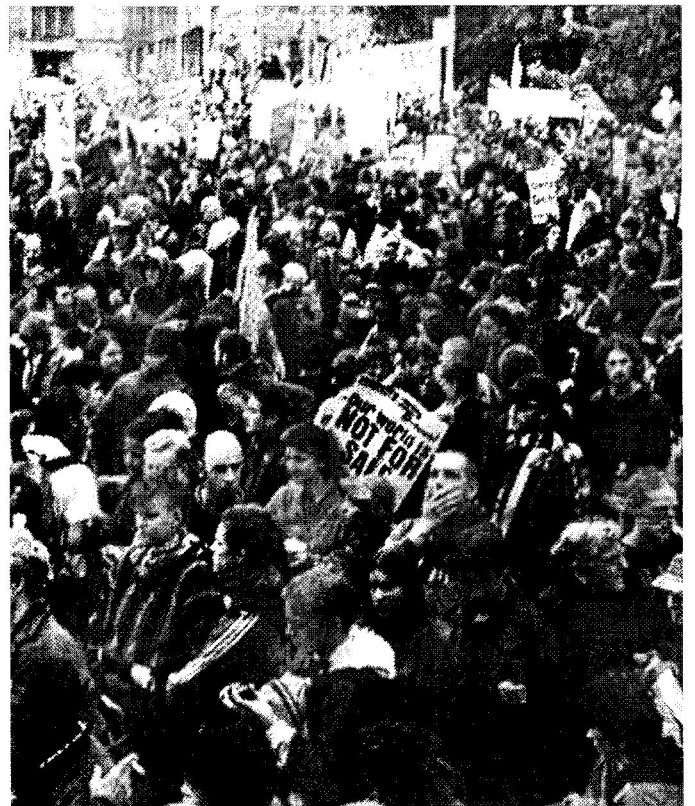
發出的；對於「正統的托洛茨基主義者」，還是拒諸門外。

在來臨中的紅色9月，是能夠把左派的氣氛改變的，而「社會主義工人組織」將不會站在一旁。我們將通過行動中的統一，通過綱領性的討論和在鬥爭中的共同經驗，為我們的目標而戰鬥。

我們熱切企待來到布拉格的成千上萬個的活躍分子，而且我們不會像捷克的「官式」工人運動般對來者給以冷待；我們會張臂歡迎他們。

我們也反過來的會期待他們繼續給予支持。「社會主義工人黨」發動反「國基會」高峰會議的行動已經將近1年；而在9月26日高峰會議前期，當局對我們及其他團體也發動了逮捕、罰款、警察暴力和騷擾等攻勢。而很顯然的，在行將震動世界的抗議的高潮裡，這些暴力和騷擾會更加升級。

（史丹譯自《工人權力報》2000年9月號）



世貿組織會嚴重損害你的健康

李斯特

1999年12月西雅圖高峰會議會場外的衝突，爭相成為報章頭條新聞之後，世界貿易組織已經變成掌控多國公司、擴大權力的代名詞。

但是，很少有人認識到世貿組織的範圍，也是在試圖關注健康和教育方面，協調成員國之間要確定的政策。

世貿組織的目的是消除自由市場中頑固勢力的任何限制，加強「發展中」經濟的依賴性和附屬性，從而為壟斷資本打開這個世界成為一個自由貿易區。

這個戰略在西雅圖受到第三世界政府的反對，和參加者強烈指出貧困、失業和環境污染的後果。

但是，在舞台後面，對於新的全球市場在健康和社會服務的範圍的爭論，已超過一年了，而且還在世貿組織的通道上繼續著。

一份由世貿組織秘書處於1998年9月發出的《背景資料說明》陳述一些重要的爭論。關於健康管理任何的費用，全球性撒切爾主義的領導看法有兩種不同的成份：

在經濟發達的國家，除美國之外，保健的費用是巨大的，政府的花費，或者通過強迫性的保險計劃籌措資金。對於新自由的原教旨主義國家，這表示這項費用增加稅收或者一般成本是不受歡迎的，並且限制了競爭。

與此同時，他們試圖限制或者減少這個「負擔」，世貿組織也要求打開潛在的新市場——並促進私有成份的作用。這就意味著考查政府支配費用的分配，資助公立醫院和服務的作用，到達什麼程度，使它更加困難面對國際資本的競爭，和在巨大的世界規模的保健工業中建立它的利害關係。

保健事業當然是一種巨大的全球性工業，但也是最不平等的。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上層的29個國家，光是一年，花在保健方面的總數就有二萬億美元。這是全世界保健消費的90%。其餘世界大多數人口（在他們當中，許多拉丁美洲、非洲、印度次大陸、亞洲其餘的大量居民）分到餘下

的10%。

在一些最不發達的國家，每人每年，只有5美元那麼少，而美國則有3,500美元。

在這些國家中，短期或中期都很少有獲得重大利益的希望，去滿足保健的需要——顯而易見的，除了醫藥的壟斷得益之外，那些公司指望世貿組織的規章來幫助保護他們的不受限制的價格，並且防止第三世界國家生產更便宜的醫藥。

無論如何，世貿組織熱切地期待一批國家——包括智利、巴西、捷克共和國、匈牙利和波蘭——「正在保健方面給予較大的自治權，並且，或者正在使它們商業化，用同一的喊價來控制成本的壓力。」我們被告知，這些「可以有希望提供商業利益。」

同時，在第三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同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和其他全球性組織一起，集中在一點上，硬塞他們武斷的市場主導的「改革」藥方，來壓低國家的費用和保證私營成份的未來。

世貿組織的文件強烈要求成員國討論如何最好地保證「在國家的保健制度方面，不斷地進行改革，是要互相援助，和不論什麼時候都要切合市場機制。」

標準的市場模式的解釋，正由國際代理機構，無恥地硬塞給第三世界國家，包括把部份或者全部醫院私有化，以促進「競賽」。私有化醫院提供服務，以負擔的現金限額和效率指標（包括減少停留在醫院的時間）來降低國家支付的經費，以及關閉醫院和合理化改革。

政府也正在被強烈要求大規模地轉變政府的資源，從醫院到基層保健，按照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WHO）提議的最有成本效益和最低成本的處理。

但是，在世銀和世衛的組織之間，對於保健或者藥物的新費用負擔，仍然存在不同的意見，尤其是在最貧窮的國家。與此同時，世衛組織認識到，對於最貧窮和最脆弱的國家進入服務機構，收費是一種障礙。而且，關於市場模式改革的價值，已經公開地懷疑了。世界銀行則是兩者的鼓吹者。

回顧1987年世界銀行，包括了對發展中國家增加成本的補償，作為它的議事日程的一部份。現在它的辯護士過份地贊同費用負擔應採取平均主義的辦法。他們主張所謂「費用分攤」或者「共同支付」的制度是更為公平的。因為他們「承擔那些（富有的國家）使機構發揮最好作用……對那些最少能夠支付的國家開闢資助的途徑！」

一個主要的關鍵，留醫已經緊密地與財政體制連在一起來保證：病人沒有付清費用就不能出院。「一個病人的賬目在准許入院時就應該立即公佈……這就意味著病人在留醫前就要預先努力籌措儲存一筆現金，並且在離院前結賬。」

也許從銀行的立場更加有利的是，徵收使用者的費用，為政府給服務機構提供資金這個事實。「在私人的和公共的提供者之間進行更大的競爭，」並且奠定健康保險計劃的基礎，這種做法能夠進一步削減政府的經費。

世界銀行的小冊子解釋這個問題：

「沒有在政府的設備，尤其是醫院，首先克服徵收使用者費用的障礙，國家不能匆匆作出自己籌集健康保險資金的計劃。理由很簡單，當人民有選擇免費或低值得到保健服務的自由，他們是不情願得到很多的鼓勵去支持保險費用，接受意外的保健風險的。」

的確，如果一些機構可以得到免費，「在這種情況下，私營成份怎麼能夠擴大和競爭呢？」完成以市場為基礎的戰略模式的理想結合，就是對醫院和其他醫治付高費用的結合——使人民籌錢參加「能擔負得起」的保險計劃。

以市場模式重新塑造第三世界的服務機構，大部份的決定，甚至缺乏資金也無異議：「農村的保險是更為困難，幾乎是不可能的。農業收入靠莊稼提供現金是顯而易見的來源，從這個來源獲得資金作為健康保險。」

在這些計劃和計算的決算表中，保險服務被列於不足道的次要位置。

世界銀行對最貧窮國家要求關於服務作出充份的表明竟不屑一顧，而背離她們。當費用強加給她們時，就離開最窮的國家，毫不關注。相反地，它的經濟學家卻爭辯說，由於改善了服務質量，部份抵銷了使用率的下降。

舉一個執行這些政策的例子看：在印度改革稅收

及國際貨幣基金結構調整計劃產生的結果，是令人吃驚的。

印度政府的保健費用曾經達到國內生產總值大約1%，低於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水平之5%，在1994-95年的數額按人口計算每人只有2美元。

但是在減少分配之中，政府緊密連繫人口控制大量地提高優先權，以最大的物資份額分配給農村地區。

相對的是醫院服務配給的情況，按照人口每人計算，城市區域比農村地區擁有10倍多的病床。

政府放棄對服務機構的物資供應，最大限度地留給農村的私營部份：私營部份的保健費用，以國內生產總值的份額計，比政府的費用多4倍。

代替用通過稅收提高保健服務資金的需要，印度政府求助於世界銀行及其他的國際借貸，和徵收使用者的費用。

同時私營醫療成份可以得到政府的幫助建立診所、醫院和診斷服務機構，70%的新的合格的醫生享有公費訓練、立即在迅速發展起來的私營成份的醫療機構繼續工作；許多這些醫務人員接著離開祖國到海外去實習。

這種大量的不規律的私營醫療成份的發展給它帶來許多畸形和問題，與私營的美國衛生系統相衝突。私立醫院進行不必要的手術，過多的檢驗和超規定的處方。他們也進行遠高於政府醫院平均數六倍的剖腹分娩手術。

私立醫院試圖保持它們的病床滿座，但也拒收沒有現金預先支付的病人。

可以預告：病人的費用，在最貧困的家庭，生育的負擔是最巨大的。而上層階級大約耗費他們收入的4%在衛生保健方面。較低的中產階級花費8-10%，而調查顯示：最低收入的人在保健方面，要花費14%。

市場制度不是為他們工作的；也不是為亞洲、非洲或者拉美其他地方的窮人和受壓迫的人提供易於得到的衛生保健。

對於用者自付的爭論，遠遠沒有解決，對提供資金不足的保健服務增加壓力。衛生工作者和那些重視綜合保健服務的人，必需支持那反對世貿組織和它的創始者的鬥爭。

（楊萍摘譯自《社會主義展望》2000年5月號）

工人階級把米洛索維奇推翻

普拉夫錫克

在1980年代末，當米洛索維奇登上權位之際，當時仍然完好的南斯拉夫正歷受經濟危機和大型罷工的震動。其時，有一支為數2萬人的罷工者遊行到達貝爾格萊德聯邦議會前示威，堅持不散，直至米洛索維奇出來向他們講話。米洛索維奇最先戰戰兢兢地聽取工人申訴的苦況，然後，他開始發言，談到塞爾維亞必須團結統一，否則受分裂後的塞爾維亞人必定會飽嚙敵人加諸的苦頭。米洛索維奇最後結束講話，呼籲工人為了全塞爾維亞的利益而重返工作崗位。罷工者們聽從了他的呼籲，散隊離去。一個評論員這樣形容當時的場面：「工人們是作為工人來到抗議現場，但他們是作為塞爾維亞人而離開。」民族主義牌給打出來了；邁上戰爭的道路隨即開啓。

在2000年10月5日達到高潮的塞爾維亞革命，是在貝爾格萊德同一幢聯邦議會大樓定音，證明了歷史作出的報復是甜美的；而且，推翻米洛索維奇的主力 and 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是以大型群眾性罷工和鬥爭中的街壘為表現的工人階級，這便使報復的果實更甜美了。在這一次，工人再沒有妄聽民族主義的神話而放棄自己的任務。

革命局勢誕生

聯邦選舉委員會在9月27日，罔顧各種確鑿的證據，竟然宣佈民主反對派候選人科索圖力卡，在第一輪總統大選中的獲票率，不足百分之50，因此有需要舉行第二輪投票。在次日，民主黨和反對派的競選經理人宣佈，在10月2日舉行總罷工，以迫使米洛索維奇政權接受投票的結果。

最先投進街頭的是中學生。學生組織在各處地點大張高舉拳頭的旗幟，並且打出「他完蛋了！」的口號。在尼斯市，有5,000名中學生佔領了市中心。在隨後的一個星期裡，是米洛索維奇政權與滿載起義情緒的反對派和塞爾維亞工人階級之間兩相角力比試的時期。就在這段時期裡的9月29日，成為角力比試的中心時刻。在傍晚6時30分，僱有7,500名工人，產

煤量佔全塞爾維亞逾50%的科盧巴拉礦場展開了罷工。這個地區一向對米洛索維奇忠心耿耿，因此，單是這次事件，就比反對派在過去10年的所有抗議行動更為有力的把政權挫傷。繼這一天開始，政權是陷入四面楚歌了。

在次日，礦場的經理和聯邦政府的能源部長與罷工委員會展開談判，要求工人取消罷工。但罷工的消息早已經到處擴散。在「北約」轟炸行動中被「北約」連連炮擊的、位於布帕斯沃市的煉油廠，工人展開了維時1小時的警告性罷工，並宣佈將在10月2日展開全線罷工。在塞沃伊諾市的銅礦工場，工人放下了工作，而工會召開會議，以決定是否在10月2日發動總罷工。在烏錫斯市，地方上的新聞媒介向國家和私營公司排山倒海的送出消息，宣佈它們也在紛紛展開總罷工。

10月1日，米洛索維奇政權受到了又一次的沉重打擊：在與科盧巴拉毗鄰的科斯托拉克煤坑，4,500名礦工舉行了支援罷工。所以，到了10月2日，人們都已經很清楚了：科盧巴拉礦場罷工的成敗，對來臨中的革命的成功與否，是有舉足輕重的效果。正如一名科盧巴拉礦工所形容：「這是格旦斯克第二。」（譯註：波蘭團結工會誕生的罷工發源地）

科索圖力卡在10月2日到科盧巴拉礦區訪問。就在當晚，出現了南斯拉夫軍隊將領巴夫科維奇戲劇性的來到科盧巴拉礦區的場面。巴夫科維奇將軍以容許從科索沃戰場中無嚴重負傷回返塞爾維亞的軍人復員歸家見著，被許多塞爾維亞人視為英雄。巴夫科維奇將軍的到來，用意是打出民族主義牌以爭取工人結束罷工。而在工人的眼裡，這一次看到的是政權的走投無路。就如科盧巴拉礦區罷工委員會的一名工人評論：「我們料想不到，米洛索維奇這麼早便打出皇牌。」

巴夫科維奇將軍與工人舉行談判至凌晨3時。工人不畏將軍提出的把工人徵召入伍的威脅，使巴夫科維奇無功而還。繼此後，政權的立場趨向強硬。

10月3日，政權宣佈，將會「依法嚴防各種顛覆行動」。貝爾格萊德檢察院旋即發出拘捕狀，要拘捕科盧巴拉11名罷工領袖。而由於法院一名法官拒絕為這張拘捕狀簽署生效，法官立即被解僱開除，由替任人簽發生效。只不過，局勢的發展已經不容米洛索維奇隻手遮天。在塞爾維亞東部的一個大型銅礦場，3,000名工人響應加入總罷工；工人在銅礦場所在的馬伊丹比克市架置起路障來。翌日，首都貝爾格萊德的公共交通工人加入罷工，警察把運輸工會的領袖拘捕。然後，是郵政工人宣佈，將在10月4日舉行警告性罷工。民主黨首領乘勢宣佈，在10月5日於貝爾格萊德舉行全國大示威日，並要求米洛索維奇在當日下午3時前辭職。

政權旋即作出反撲。在10月4日，警察開出裝甲車闖入科盧巴拉礦場，佔領了部份礦區。不過，這個行動只是喚起了首都人民的憤怒和團結之情。來自首都和鄰近市鎮的示威者趕到科盧巴拉礦場，衝破警察的防線，加入了罷工者的行列，一併結束了警察鎮壓罷工的行動。

事已至此，政權是束手無策了。10月5日，憲章法院宣佈，首輪總統大選的點票結果無效作廢。這個宣佈，令全國更加群情洶湧。從塞爾維亞各地來的車隊源源不絕，來到首都參與全國大示威。其中最大的一支車隊，是由卡卡克市市長率領的隊伍。這支由為數有200輛貨車、40輛巴士及其他大型車輛組合而成的車隊，佔了20里長的路面，衝破了警察在通往首都的道路要津的防線，浩浩蕩蕩的臨達首都中心。這支車隊並且成了衝擊聯邦議會大樓的主力。警察的防線在民眾的革命怒火當前逐一潰散，同時也結束了米洛索維奇13年來造成死亡和毀滅無數的政權。

「北約」的一筆爛賬

這連串的事件和進程，展示了塞爾維亞這一場革命的性質，是由工人階級真正地從下而上發生的起義，為了保衛自由和民主而層層升級進至成為革命。這次革命既不是由帝國主義作預謀，也不是一次親資本主義的冒進。革命得以成功的風範，是與「北約」去年大轟炸大相逕庭，形成鮮明的對照。革命在11天裡所做到的，「北約」用了78天的連續轟炸也辦不到。革命不僅把米洛索維奇推翻，並且也把從科索沃

意氣風發地歸來的南斯拉夫軍隊也給癱瘓下來。

「北約」的轟炸殺害了890南斯拉夫人，其中有503個是普通市民，餘者才是警察和軍人。要是我們把塞爾維亞特別軍事部隊在「北約」轟炸期間在科索沃殺害的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的人數也包括在內，則由「北約」所造成的死亡人數，達到3,500人。而在塞爾維亞這場革命，只有3人喪生。

「北約」的轟炸激發起為數1百萬的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受到種族清洗的報復，而在隨後，又有20萬科索沃的塞爾維亞人和羅曼人受到長期的種族清洗。相形之下，革命並沒有清除任何種族。

「北約」的轟炸給南斯拉夫的基本建設，造成了至少500億美元的經濟破壞，而革命雖然令南斯拉夫癱瘓，但卻沒有令哪怕是一間汽車廠、一道橋樑、一間醫院或一所學校受破壞。

「北約」用於轟炸的過億金錢，原本可以用在醫療服務、最低工資和退休金上，令我們可以有得體的社會服務。而革命沒有動用我們的一毛錢。

革命駁倒帝國主義者的歪論

革命並且也對帝國主義者及其擁戴戰爭的自由派種族主義者施以致命的一擊。那些自由派種族主義者說，必須從外向巴爾幹地區強加自由民主才是可行。就在1999年4月29日，「北約」向南斯拉夫進行轟炸前夕，英國《衛報》刊載了美國哈佛大學一名學者高哈根的一篇文章。這名高哈根說，塞爾維亞這個民族的「道德淪喪之甚，在短期之內，看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不靠外力援助而自拔出來」，「塞爾維亞的大多數人民通過支持或容忍米洛索維奇的消滅主義的政治，已使他們在法理上和道德上無能力去處理他們自己的事務。」因此，高哈根作出結論說：「在塞爾維亞產生一個徹底的民主演變的過程的先決條件，就是「北約」佔領。」

這種言論，被後來事態的發展截然斷然地推翻了，不過主戰的自由派人士卻不是那麼容易噤聲下來。所以，在後來，《衛報》自己的作者，便說「北約」對南斯拉夫的轟炸，實際上是革命的導因。

然而事實的真相是：米洛索維奇是受到巴爾幹地區上其他部份的政治發展而給嚴重地削弱的。克羅地亞總統圖依曼在1999年12月去世。2000年1月，圖依

曼所屬的執政黨在民意調查中挫敗，結束了自1990年克羅地亞開始了自由選舉之後的壟斷地位，由此而讓一個中間左派的聯盟興起。在2月，對圖依曼批評最激烈的反對派梅西克打敗了執政黨的候選人而當選總統。梅西克甫就任便開除了7名反對他的民族主義將領，及把被指責對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犯有戰爭罪行的克羅地亞人逮捕。而到了4月初，波斯尼亞的民族主義執政黨總統在地方選舉上，落敗給左傾的社會民主黨人。這個選舉結果迅速對塞爾維亞造成影響。早在塞爾維亞10月革命爆發前的4月中旬，在南斯拉夫出現了歷來最大型的反米洛索維奇的大示威。

在過去的10年間，米洛索維奇和圖依曼這對民族主義孿生子，就依靠著互相指稱對方是民族的重大威脅而得以唇齒相依。於是，一方的倒下及並隨而至的競選落敗，便也標誌著另一方的完蛋。隨著來自克羅地亞的民族主義威脅的消滅，塞爾維亞人便乘勢而起，為變革而投下一票。

工人階級應把革命推進

在刻下，在高層正展開對米洛索維奇政權中最重要官員的清洗。科斯圖力卡利用了他對聯邦層面所能控制的部份，竭力驅逐舊政權的擁戴者。另一方面，舊政權分子則利用他們在塞爾維亞共和國層面的控制力而企圖在政治上採取攻勢。軍隊也是仍然屬於舊政權的；巴夫科維奇仍然率領著大軍。

科斯圖力卡明顯是不想再依賴於把他推上權力的工人，就像民主黨黨魁吉扎克所言：「我們是可以來一場革命的，但這無補於事。革命會造成不安定。」在如許局面之下，與舊政權作出草率的妥協，對他們會是變得可取了。不過，在最近的將來，科斯圖力卡要處理的是來自下面的群眾壓力。在塞爾維亞各地，工人已經自己作主，把他們憎惡的公司負責人和與舊政府牽連的國家官吏驅逐。在斯梅迪尼沃市，一所地方銅鐵廠的1.1萬名工人要求廠的經理辭職，否則將進行罷工。在尼斯市，工人衝入國營的紡織廠，要求把經理撤職。而在首都貝爾格萊德，工人對全塞爾維亞最大的國營出入口公司的主腦作出攻擊，使後者被迫辭職。新政權對這些行動並不高興，政府派出代表，到處勸諭工人復工。

我們社會主義者必須支持工人反對老闆的所有行

動，但我們也應對工人說，選出新管理人員是不夠的，還應該把舊管理層的運作接收過來。科斯圖力卡主張自由市場的經濟政策，他若取得成功，便會削弱工人的權利，外國投資者將會進來實行私營化。所以，工人倘若利用現時的政治局勢，朝著民主的方向而把權力伸展到工作間，將會有著抵禦自由市場和私營化的有力陣地。同樣的，兵士應要求選舉長官，而塞爾維亞電台電視的記者及工人應要求選舉新的負責人。而大學的學生和工人應要求有權選舉新校長。

席捲巴爾幹地區的變化，反映了人民愈來愈看到，在過去10年所產生的小國，所帶來的是貧困而非繁榮，帶來的是對或此或彼的外國勢力的依賴，而不是國家的獨立。波斯尼亞和科索沃便是備受「北約」新殖民統治的鮮明例子。

從19世紀以降，巴爾幹的社會主義者都指出，被民族主義者互相競逐政治和經濟權力而把巴爾幹地區分立為小國的局面，只會讓帝國主義有機可乘，從中介入。扭轉民族衝突、不讓帝國主義有機可乘的唯一方法，就是以工人民主為基礎，在全巴爾幹建立聯邦國家。

塞爾維亞革命的勝利，證明了我們作為社會主義者的信念：唯有工人階級才能把現代國家的根基動搖，對民主和進步變革有利。而這一場革命是否會激進地朝著一個對整個巴爾幹地區有意義的民主方向發展，則是部份地視乎社會主義者能否在這場革命裡把鬥爭推向前方邁進。

（史丹譯自《社會主義評論》2000年11月號）



把塞爾維亞革命推進到底

日爾曼

塞爾維亞革命有著歷來的民主革命的所有標記，它有著把古老歐洲所有專政制度全線掃蕩的1848年大革命的迴響，它與1980年震動菲律賓的人民權力和印尼在過去兩年的人民權力相似。還有一種不斷出現的說法是，把東歐共產主義政權推翻的1989年底從下興起的群眾抗議浪潮所未完成的功業，這次由塞爾維亞革命來完成。

塞爾維亞革命都像上述所說的所有革命事態，它是由普通人民所爆發的群眾力量。在其中，佔有關鍵地位的是兩批人：塞爾維亞工人，尤其是科盧巴拉的礦工，及群眾性的學生運動（OFPOR！）。他們通過大無畏的行動，一再不畏強權，激發起波瀾廣闊的運動。工人和學生是在政權的一再高壓、廣泛的查禁言論及選舉舞弊的虎口下造成革命。

不過，有些人卻要把這一場革命描黑為擁護資本主義。但絕不是這樣的。塞爾維亞人有不勝枚舉的理由憎惡西方及西方所代表的制度：這個國家就在去年裡被「北約」聯軍猛烈轟炸長達3個月。所以，米洛索維奇在競選裡打出的牌，就是聲稱他把塞爾維亞守衛免受西方的進侵，而他的支持者亦聲稱，攻擊米洛索維奇將會被西方所利用，從而就是攻擊全體塞爾維亞人。

所有反對米洛索維奇的反對派領袖，無一不在某個時候支持過西方，或是採取親西方的政策。正是由於他們這種態度，使他們在群眾的眼中全無信用。被推上權力的科斯圖力卡的成功包含了兩點：他在人們眼中，是眾多反對派政客中最有原則性、最不搞投機；他發動運動，反對「北約」及西方插手科索沃，反對把米洛索維奇帶上海牙國際法庭受起訴，並反過來要求起訴美國及其盟友。倘非有這些立場，他是不會當選的。正如在革命後，街頭上的一個店員所說：「使米洛索維奇滾蛋的是塞爾維亞人而不是『北約』，應該是由塞爾維亞人民來懲罰他。」另一位女士說：「你們『北約』絕對沒有懲罰米洛索維奇，他躲到地底去了，他的子女也在安全的地方躲起來了。

受到懲罰的倒是我們。」

革命荊棘滿途

在「北約」轟炸塞爾維亞期間，許多人在反對轟炸的同時，爲了不讓西方有機可乘，所以感到有需要支持米洛索維奇。最近的事態表明了這些人是錯誤的，事實上可以有另一種出路。

革命在早期的階段便取得了勝利，不過，倘若要從革命裡得到真正的成果，便需要把革命繼續下去，而這點對社會的底層人士，尤爲真實。革命迄今所達到的成就是重大的，但來臨中的問題和危險也同樣的重大。警察和軍隊仍然完整無損，而且不願交出權力。他們看到抗議的力量是那麼巨大，他們的介入將要引發內戰，而這並不值得。他們隨時準備拋棄米洛索維奇，但會盡一切所能來保存原有的地位；使新政府按軍方的利益而行事。科斯圖力卡看來是不能，也不願承受太多來自軍方的壓力。科斯圖力卡在政治上保守的，例如他對科索沃的立場便與舊政權無有二致。而且，在事態朝向革命發展，及在革命期間，有跡象顯示，科斯圖力卡是畏縮的，他害怕在不獲軍隊保證之下而行動，並且需要軍隊保證不會起而反對人民。他對塞爾維亞的政策，是要使它更大程度地與歐洲融爲一體——這對飽受戰爭煎熬及經濟孤立的塞爾維亞是有著虛假的吸引力，只不過，這種被西方納入懷抱的政策在實際上只會帶來經濟緊縮、削減職位和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

所以，在街頭上那個把米洛索維奇推翻的運動，是代表著與西方列強所宣稱支持的那種利益直接地對立的。科斯圖力卡是這個街頭運動的首腦，但他的政策最終會背叛這個運動。他和西方都不願意街頭的運動會有進一步的發展，因爲他們都害怕，那些採取直接行動以爭取自由民主的人，也將會爲保衛本身的經濟利益而戰。在一個矛盾重重的社會裡，人們爲了爭取更好的生活而革命，但他們現在或許便會發現，有一個「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結構調整計劃強塞給他

們。

此外，戰爭也留下了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就在巴爾幹地區的中部，波斯尼亞實際上是一個由西方管理的殖民地；在科索沃，西方的管治主持了由阿爾巴尼亞人對塞爾維亞人及羅曼人進行的種族清洗。有鑑於「科索沃解放軍」相信，倘若米洛索維奇繼續在位，科索沃便有很大的機會贏得獨立。所以，「科索沃解放軍」對於科斯圖力卡的登位，是不無忿恨的。「科解」現在繼續對塞爾維亞警察戰鬥，以圖通過動蕩來取得獨立的機會。黑山的民族主義者，也要求獨立，但西方似乎是愈來愈不願意讓黑山取得獨立的。在地區上爆發更多戰事的危險仍然存在。米洛索維奇儘管退位，但導至戰爭的各種因素尚存——尤其是西方介入的因素。

把民主革命變為社會革命

革命可以怎樣前進呢？工人學生要繼續採取攻勢，以確保他們的要求得到實現。把舊政權支撐起來的舊有老闆、行政管理人員、軍隊將領和政客，應該經由學生和工人的普遍決定而撤除——工人學生已經走上這條道路了。自由新聞媒介的內容及工作條件，需要由工人控制管理。工人必須提出把權力擴充、改善工作條件的要求，並且運用直接行動來爭取這些要求。必須從下而上的對警察和軍隊作出控制。必須通過平等的聯邦而不是武力，使不同民族統一。唯有這種方法，革命才是真正的開始面對塞爾維亞社會的基本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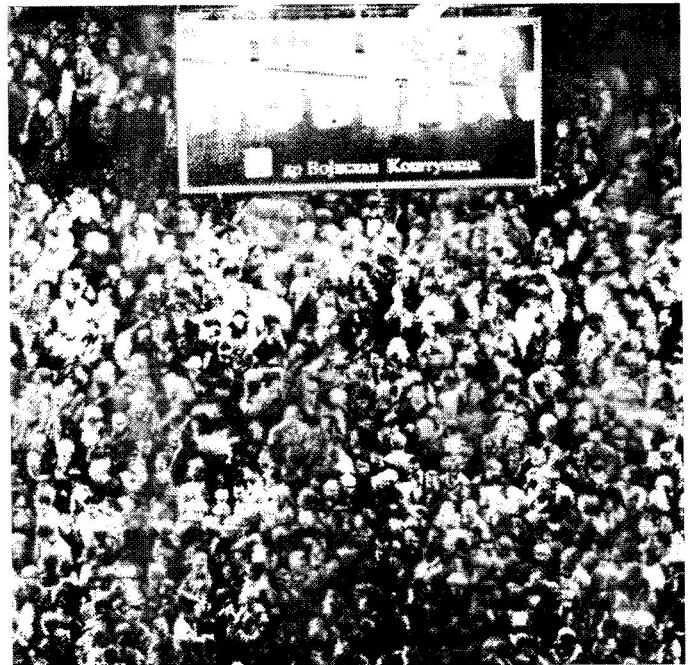
在戰爭期間，塞爾維亞人被醜化為種族清洗的惡魔，而現在，一些人又把他們讚美成民主的英雄。這兩種圖象都不準確。塞爾維亞人就像其他民族一樣的被政治所分化，而首先更主要是受到階級所分化。每一場革命的開始，都首先是廣泛的團結，因為大多數人都超越階級，團結一道，先把可憎的獨裁者趕走，及爭取最基本的民主要求。而當經濟課題和階級課題走到前列，每一場革命皆是按著階級的路線而分化。工人要取得成功，他們便不僅需要力量，而且也需要一個獨立的政治組織，可以為工人本身的利益而鬥爭，把民主革命扭轉成為一場社會革命。

在公元2000年發生的塞爾維亞革命，比起1989年發生在東歐的革命已經是更好的了。兩者的關鍵性

的區別，在於工人階級在塞爾維亞革命裡發揮了中心的作用。民眾反帝國主義及不信任西方的情緒仍然強烈。人民能夠看到東歐推行市場的效應。而即使在塞爾維亞內部，市場效應也是同樣的到處可見，發生了許多的影響，以至這一場革命，是在西方本土日漸增加的反資本主義的背景下發生的：在美國西雅圖和捷克布拉格反「世貿組織」及「國際貨幣基金會」等全球化組織的運動的教訓，在塞爾維亞的學生組織OFPOR！是不會視而不見的。在西方出現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在帝國主義的心臟地區造成了日漸增加的動蕩。

所以，塞爾維亞的十月革命很可能是一個漫長的變化過程的開始，而不是變化的結束。我們可以通過許多方法來表示我們的團結——更不用說，我們可以通過與我們的統治階級作鬥爭，以使造就了革命的那邊廂的人知道，在西方這邊，也有著許多的同路人。

（史丹摘譯自《社會主義評論》2000年11月號）



公元2000年美國大選

團結社

〔美國社會主義組織「團結社」支持兩位獨立候選人，競選公元2000年11月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本文刊出時，選舉結果將已爲世人所悉。然本文對民主黨和共和黨候選人的本質所作的分析，絕不過時。此外，對兩名獨立候選人大衛·麥雷諾斯和拉爾夫·納德的介紹，可助讀者知悉美國民間運動的狀況〕

美國社會黨推出的總統候選人大衛·麥雷諾斯，是美國和平運動中一名備受尊重的老將。麥雷諾斯行之不懈的反對軍國主義、爭取同性戀者權利、擁戴民主社會主義的原則，他的參選，將爲社會主義的另類出路在這次大選裡發出最清晰的聲音。另一方面，由美國綠黨推出的拉爾夫·納德的競選運動，則是作爲獨立於雄霸美國的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治新氣象，具有向前邁出一大步的潛力。納德沒有自稱爲社會主義者，而他也不是社會主義者；不過，綠黨之保護生態、提倡民主的世界視野，最終是會對資本主義的機構成威脅，而且有助於鑄煉工人階級的另類出路。

納德在2000年發動了一個朝氣勃勃的運動，這個運動在兩個方面甚爲富有希望：第一，他的競選訊息，對由企業集團通過對民主程序、新聞媒介和所有經濟機構的控制而對民主的扼殺，及企業集團在「全球化」的偽裝下向全世界擴張權力的狀況，集中火力發出了強有力的批評。這些批評，是與在西雅圖、華盛頓示威反對「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的成千上萬把憤怒的聲音和應的。他的說話是向著眼看到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日益惡劣的上千萬個工人而作出的。這些批判，把成千上萬個關注不平等日增、環境不斷受毀、全球暖化、基因改造食品和喪失生態多元性所造成的影響的個人團結起來。所有這些個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政治見解：由企業集團所控制的政治程序，是不能提供實質的解決方案。

納德運動的第二個方面，是發展「勞工支持納德」的運動。這個運動是由在1996年產生的「勞工黨」的著名領袖所支持和鼓吹的。「勞工黨」本身沒有推出自己的總統候選人，但該黨設立了一個「勞工

支持納德」的委員會，爲納德助選。這樣一來，便爲勞工活躍分子提供了途徑，可以向民主黨的勞工票源要津發出直接的挑戰。

「團結社」同時支持大衛·麥雷諾斯和拉爾夫·納德競選總統的活動，其見解是提出用社會主義來取代腐朽的資本主義，以及兩位候選人用人民民主的觀點，向著有擴展潛力的聽眾對兩個資產階級大黨作出的批評，同樣都能發揮正面的作用。與此同時，我們承認，納德的競選運動所具有的一些缺點，是會妨礙他的競選運動的潛力的發揮。

民主共和兩黨是一丘之貉

美國公元2000年的總統大選，展現了大企業界的政治學。喬治·W·布殊把自己說爲獨樹一格，不同於戈爾之來自華盛頓的權力圈子。但兩人在實際上都是政壇菁英的第二代、第三代人物，與政壇菁英的背景、資源、關係網和金錢來源同出一源。在選舉日之前的6個月，布殊已報告說籌得了8.4千萬美元競選費。戈爾稍爲遜色，但也有7.4千萬美元。而這些數目，當然未包括民主共和兩黨分別會募集的、不在競選限額規定之內的「軟金錢」。在1996年，這些「軟金錢」的總額，達到2億6千2百萬美元。而今年，據選舉觀察家估計，總數會高達5至7億美元。而不管怎樣，由企業出資的狀況，只是屬於症候，而不是疾病本身。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是資產階級政黨，它們是美國大企業、大公司的傳送器；通過這個傳送器，美國大企業得以從國家取得種種利益，得以把民眾編配成替其利益服役的各種部門，包括發動帝國主義戰爭，鼓吹各種民主幻象。這兩大資產階級政黨是只爲利潤、種族主義和戰爭的黨，所以我們反對這兩黨的候選人。所謂兩害取其輕的從中選一，只是向這種制度投下一票。第三大候選人畢簡南，則是反動的人民主義。

現在，有愈來愈多人看到，這個政府只是有興趣滿足大企業大公司的需要；而對於有利於普通工人大

眾的立法，卻是不屑一顧。克林頓政府任內通過的最重要的法案，是《北美自由貿易協議》、《1996年犯罪法》、取消社會福利和結束對通訊業的管制。所以，這個在上任時聲稱希望人民把他視為甘迺迪般記著的人，在落任的時候，人民只把他當作完成布殊的議程的人來記住。

美國經濟縱然「旺盛」，可是富人與其餘人口的鴻溝愈來愈大，而活在貧窮線下的兒童是愈來愈多。不過，戈爾和布殊俱不談這些，不談政府該如何扭轉這些趨勢。以他們的金錢背景來看，他們當然是不會談的。

爭取擴大民主空間

在沒有強大勞工政黨的美國，絕大部份高層的勞工領袖都積極的投進民主黨，因此，「團結」尋求一切用以打破兩大黨操縱的缺口，以朝向真正獨立的政治的方向邁進，哪怕這種種努力都是荊棘滿途。而即使獨立的候選人或會當選，他們也同樣有可能被兩黨制的金錢和權力所侵害。所以，很清楚的是，我們是不能預估哪一個缺口在最後必會取得成功。

倘若我們不開始建立一個代表工人利益的政黨，便永遠也不會有這樣的一個黨。此所以，我們支持「勞工黨」，並且參與建立它的會員基礎和活動基礎。也所以，我們在1992年和1996年先後支持綠黨角逐立法院和總統的候選人。而與此同時，我們對那些虛以「第三政黨」自命的黨派作出批評。

在1996年納德競選總統的運動中所犯的缺點，不用在2000年重蹈覆轍。納德拒絕任由大企業公司進犯民主和人類尊嚴的訊息，有需要與關乎人權和社會公義的訊息緊相扣連，這包括指出大企業把整整一個輩代的青少年打成罪犯、死刑的卑劣、大企業對生育選擇權和墮胎權利的不竭的侵犯、掛上人道面具的對外戰爭，等等。

納德競選運動的另一個危險，是用民族主義——保護主義來回應「全球化」，而不是用國際團結來對抗「全球化」。這個運動若是要提供一個清晰的另類出路，便不能與「美國勞聯——產聯」所提倡的「美國工作用美國人」之類的論調看齊。因為，把美國的工資和工作條件拉低的不是中國工人（或墨西哥、印度、海牙或非洲等國的工人），而卻是美國經濟界的

菁英——大企業的統治階級——與中國及其他等國的菁英；他們同夥一氣，把世界各地工人的工作條件和權利拉低。

納德的競選運動，強調藍領工人與反對大企業的全球資本主義的綠黨反對派組成聯盟。他提出一份內容廣泛的「藍——綠」議程，以把保衛勞工權利與保衛環境作為其競選活動的中心課題，而這也是去年在西雅圖反對「世貿組織」高峰會議的訊息。此外，他的競選活動也會支持「勞工黨」所關注的醫療改革等課題。

我們「團結社」中人對本國人民所享有的民主權利高度重視。不過，在資本主義下，民主權利之得到尊重，不是出於政客的意向，而是由人民隨時準備著起而抗爭而得來的。因此我們是非常強調需要建立群眾運動。

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相信，在資本主義制度之內，「恢復」民主的努力不管有多麼良好，資本主義制度都必然有著其固有的短處。民主的全盤發展，需要在權力結構方面有著基本的、革命性的改變，需要用工人的操縱經濟、按人類而非利潤的需要，作出民主計劃來取代資本主義。任何競選運動都不能達成這種改變；唯有一個強大的革命運動，才能帶來這種改變。不過，在今年，我們看到大概在過去20年裡所沒有的機會：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外，另類是大有機會可乘。這有助於把存在於美國社會內部的民主空間擴大。

為什麼？去年西雅圖抗議「世貿組織」高峰會議的事件，把統治階級的全球化政策下的兩黨制的性質，及統治階級對普通人民的蔑視清楚的表露無遺。西雅圖示威把對既有權力者的抗爭再次提出，踏上征途；它燃起普通人民的希望——普通人民是可以破壞權力販子的宏圖大計的。

麥雷諾斯和納德的競選運動，各以其方式反映著普通人民對企業菁英的反對，對新瓶舊酒的戈爾——布殊的反對，和對另一個競選人畢簡南反動的人民主義的反對。

（史丹摘譯自《國際觀點》2000年9月-10月號）

面向未來

第9次聖保羅論壇會議宣言（摘要）

21世紀已開始了，我們的時代進入了第三個千年。1990年7月，在巴西聖保羅召開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左翼政黨和組織論壇會議之後，也已過去了十年。十年來，人類經歷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危機的加劇，都已證實了大會提出的主旨。

今天，參加聖保羅論壇會議的核心力量相互交換了意見，討論了自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導致兩極世界的終止，及其對拉美與加勒比地區左翼政黨和左翼運動的鬥爭所帶來的影響。

左翼勢力的匯合

聖保羅論壇的成果是值得稱道的，因為這是拉美文史上第一次將左翼所有政黨和運動的力量匯合在一起。

所有這些左翼政黨和運動，本來各有各的不同鬥爭形式，現在都注意到，影響世界人民，特別影響到拉美和加勒比地區人民的重大問題，並不因冷戰的結束而消失，但只能隨著壓迫、統治、剝削和種族主義的終止才會根本消滅。

聖保羅論壇會的成員——各政黨各運動，以其形式繁多、鬥爭多樣化而走到一起來了，他們發動鬥爭去反對帝國主義。20世紀的最後20年，帝國主義所採取的是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形式。

自論壇創建以來的這10年時間，便足以證實我們的最初分析是正確的。正像1990年7月間，我們便斷然駁斥了一個觀點，這觀點認為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計劃，經過一段時期的調整後，便會把財富分配給大陸上的全體居民；我們同樣否定了一個幻想，根據這幻想，自由主義能對不可抗拒的經濟、科學和技術法則作出靈敏的反應。

最近十年的現實，特別證明了新自由主義模式是有其局限性的，它無能解決人類的各種問題。1999年12月西雅圖會議的失敗，典型性地反映了國際反新自由主義力量的強大。

現實中新自由主義原則，只代表某部份人的經

濟、政治利益，這部份人只樂於去犧牲甚或消滅人類的大多數、而只是窮兇極惡地追求那令人眼花繚亂的財富積累，特別是財富積累的份額是無法想像的。

世界經濟已進入大肆掠奪階段。用來描寫今日世界的關鍵詞有：集中、兩極分化和殖民統治。集中指的是財富、資產和生產的集中；兩極分化指的是政治、經濟、文化的分化，同時伴以貧苦、排斥並把世界推向兩極化。

這種兩極分化和分配不均，在世界範圍內的表現形式是：只佔極少數的人口，卻消費了極大部份的產品，而從社會服務行業中獲利最多。

世界財富集中在不到300家豪富者的手裡，其餘人類則被剝奪了經過世代所爭取到的工作權、健康、食品、居住條件、教育、基本權利、生存、生育和發展權。

美國侵略

在上述基礎上，還要增加兩種作用：美國單方面軍事侵略及其罪惡決定，即違反戰後國際法秩序，在聯合國和北約組織主持下，在南斯拉夫人民中進行種族絕滅之戰。

要把人類從自我毀滅的絕路中拯救出來的唯一方法，那就是把滿足人類需要確立為未來社會的基本優先權——而不是個人的獲利。解決世界問題所涉及到的，要通過鬥爭去根除基本的階級矛盾，而階級矛盾又緊密地與最多樣化的形式如壓迫、種族歧視、剝削等相聯繫，特別是以性別、年齡、少數民族、人種、文化、宗教等等為基礎的壓迫和剝削形式。

殖民主義遺跡

只要殖民主義的遺跡（例如對波多黎各及法屬圭亞那等等民族的鎮壓）沒有掃除乾淨，全世界各民族便難以希望加強他們的自由、獲得自決權以及主權的完整。

21世紀的左派應認真考慮各種經驗了，如制訂

建議、奪取空間和權力，建設可供選擇的模式，所有這些經驗都必須根據我們希望改造的社會現實的研究中得來。左派還必須考慮以下這種必要性，即預見到自然或經濟結構的深刻變化，利用這種結構變化來逆轉森林破壞進程，反對國際金融投機，財富重新分配，預算制訂的民主化和社會化，促進社會的參與，並加速政治和經濟的分散化。

左派還將面對改造國家的基本任務，使國家為新的、全面民主的發展和深化而服務：包括社會民主、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及性別民主。危地馬拉和平協定同樣可用這一發展形式來加以鑒定。其他富有重大

意義的政治進程已經發生了，或正在厄瓜多爾、委內瑞拉、巴拿馬、薩爾瓦多和哥倫比亞發生。

我們還必須注意到，美洲存在著土著民族，他們是對抗新自由主義和跨國組織的進攻的。

他們的反抗和總動員，強有力地突出了我們民族國家深刻改造的必要性，用以保證使生物多樣化和生態系統得以保持，得以保證民族多樣化及承認他們的身份、權利和自決權。

聖保羅論壇會議成立後十年，拉丁美洲左派重申了他們的民主和反抗的傳統。

（黃申節譯）

南韓汽車工人罷工帶來國際團結機會

楊萍譯

2000年4月6日，大宇（Daewoo）機動汽車數千工人舉行全國性罷工，抗議由債權銀行提出拍賣大宇汽車公司給通用汽車或福特（美聯社4月9日電）。

「害怕這樣的拍賣會造成暫時的解僱」，汽車工人從大宇的各地工廠團結地走出來。據報道：罷工者要求大宇國有化或者賣給本地的公司。南韓政府已經發出一個「強烈的警告」反對罷工工人。它說：「我們將嚴厲處理非法的罷工……如果大宇不能很快地處理，我們的汽車工業將落在國際競爭的後面……」

很清楚，南韓統治集團意欲保護他們國內汽車工業的投資，即使出售它的一部份給美國汽車，主要的擁護者都傾向和留意勞動生產力的政策。「政府官員和大宇汽車債權人已經指示外國一家公司，把汽車工人接收過來是合乎需要的，以便本地的工業能夠從外國投標人提供引進先進的商業經驗而得益。」（路透社4月4日報道）

南韓政府以前曾經使用蠻橫的力量（集體逮捕、暴亂的政策、催淚彈、直升機、推土機）反對汽車工人。顯然的，南韓汽車罷工者能夠利用某些國際團結和絕食，而團結在史蒂芬約基切主席為首的聯合汽車工人協會週圍則是更為有力的。福特和通用汽車工人

的同情罷工，反對接收大宇，不僅大大地提高對美國公司提議的接收價格，它也提高了國際團結的水平，比起通常的勞工倡議的國際會議的紙上決議和象徵性的行動來，是棒得多了。

這樣的國際工業行動是驚人的，它將始終如一地與勞聯——產聯新近的聲明一起提倡：「同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我們的兄弟姐妹們的國際團結，將產生公平的、民主的和能夠持續的成長。」此外，它將標誌著大部份美國勞工領導人拋棄狹隘的保護主義，而且它要求它的貿易政策的建議，實質上是計劃阻礙到處剝削工人。

這樣的信息是受歡迎的，尤其是來自聯合汽車工人的領導。過去他們曾經臭名昭著地反對進口外國製造的轎車。如果福特或者通用汽車公司得以支配大宇，它可能希望支配將來使美國汽車工人同南韓汽車工人對立起來互相反對；非常相似於今天的汽車商行成功地在聯合汽車和本地之間進行挑撥，使他們在職業競爭上互相反對。南韓罷工提供機會給美國工人和聯合汽車工人協會的領導來改變本國和海外汽車資本家的情勢。

讓亞洲成為無核區

——《達卡宣言》的主要內容

2000年2月18-20日，首屆地區性核裁軍會議在孟加拉國達卡召開，來自南亞、東南亞、東亞及北美等14個國家的150多位活動家及學者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是針對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98年5月進行的核試驗而召開的。會議由設在曼谷和孟買的「南半球中心」及設在達卡的「社團開發圖書中心」組織的。

會議發表了《達卡宣言》，其部份內容為「印度、巴基斯坦於1998年進行了核試驗，死抱住核威懾信條，並通過核試驗從事於研製核武器及核武器發射系統，他們已對其本土及區域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危害，也阻礙了全球核裁軍的進程。這是模仿霸權國核武器化的作法，霸權國的核武器已對全球安全構成了最嚴重的威脅。印度和巴基斯坦必須立即停止所有與核武器有關的活動，包括研製、生產、引入或部署核武器及彈道導彈。他們必須立即撤消這些項目並簽署

《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及其他約束措施，以此作為邁向核裁軍的具體步驟，並回到核裁軍議程上來」。

大會通過的「行動計劃」，詳細說明了凍結印度、巴基斯坦核項目的具體內容，會議號召長期擁有核武器的五大國（美、俄、中、法、英）應根據《核不擴散條約》及1996年「國際法庭」的裁定，履行核裁軍義務。「行動計劃」要求南亞活動家們來支持全球核裁軍，並以此為契機，為使南亞成為無核區而努力。

與會者表示願與「廢除2000年全球網絡」一道努力工作，「消除核武器」會議也採納了三種解決的辦法，並在達卡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兩使館處，舉行了可能是亞洲首次「二合一」示威遊行而結束。

（黃申摘譯）

有薪分娩假期權利受威脅

史丹摘譯

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利用有少數國家修改產假法例為借口，正在著手修改產假的權利。

在1952年，「國際勞工組織」通過第103條條款，保障在職婦女的產假權利。這條條款規定了下列原則：至少12週產假、享有醫療福利、絕對反對在產假期間被解僱。而在2000年6月，這條條款被修改。由僱主提倡的修改，對上述原則精神作出了質疑。

按既有條款，在職婦女「適用於產業女職工，非產業和農業僱用的女工，包括在家裡工作的婦女」。但現在建議的修改草稿，卻容許聯合國的成員國可以「完全或部份地排除適用的範圍，只限用於有限的工人或行業的類別」。

收縮適用行業和假期

換言之，一些國家可以把某些行業的工人完全排斥，不可享有分娩假期！

原條款規定，分娩假的期間至少需有2週……分娩後的規定產假不應少過兩週。而建議的修改，則是：「分娩假期應該包括一段規定期限，假期的長短和怎樣分配則由勞資雙方決定」。

在失業高企的國家，所謂受薪者的自由，不過是大話西遊。

建議中的修改，也會給僱主廣開解僱產假期間的工人的大門。本來，原有條款規定：「在有缺缺席期間（分娩假或補假期間），僱主發放解僱通知，乃屬

非法」。修改稿則建議：「禁止僱主在婦女懷孕期間將她解僱……除非解僱的理由是與女工的懷孕、分娩和餵哺母乳無關。」簡言之，只要找到其他口實，便可以將懷孕前的女工解僱。

在目前，各國的有薪分娩假期的長短各異，林林種種。在德國，有14週全薪分娩假；法國是16週分娩假，只付工資84%。其他國家如葡萄牙的分娩假只有12週。瑞士的女工和南方許多國家的女工仍然剝奪分娩假期。但建議修改的分娩假期條款，卻不僅沒有乘機改善狀況，更反而是要使這項權利走下坡。

對於婦女分娩假期問題，就像對待《多邊投資協

議》一樣，只有通過群眾的動員，才能防止社會的倒退。

在法國，「全國集體爭取婦女權利社」和「世界大遊行法國協調部」已經把這個問題拿上議程。它們發出了公開的呼籲，要求維持「國際勞工組織」103條款的精神，並且要求「最低限度有16週分娩假期，維持讓分娩假期適用到所有受薪者類別，包括適用到家庭工人、獨立工人，一無例外；要維持絕對不能解僱懷孕及產假期間的職工、維持現行較國際勞工組織有關條款更為優越的法例。」

（史丹摘譯自《國際觀點》2000年7-8月號）

圓值下跌的國度

恩克奈爾

〔日本從20世紀80年代成為奇跡的經濟已經消逝，變成今天資本主義的病夫。本文報道什麼弊病在發生〕

日本的傳媒權威創造了一個警句「失敗的十年」來描繪20世紀90年代，在80年代參與投機之後，日本的經濟在1991年下跌了。直到1998年，全國生產總值才吃力地每年增長1.3%。任何希望在新的一千年來臨之前跨越1.3%這個數字，已被如下的新聞打消了：這個世界第二位最大的經濟，已經在1999年晚期回滑到衰退中。當前的企業破產維持在一個月1,500家左右，而這個月前所未有地壞的官方失業數字，佔人口的4.9%，而32萬新的畢業生不能找到工作。

許多讀者會記起日本80年代的經濟奇跡。無數的話題匯成預言，就是日本就要超過美國和歐洲，成為世界的頭等大國。許多學術書籍主張日本的政治經濟，以它的大量有條理的財政部門，連鎖性的股權和穩定的官僚政治，是唯一可以取代那更易波動的「英美」對手的強國。日本的「終身制」和「年資制」的僱傭制，博得大部份自由主義左派和改良主義左派的讚美的青睞。

與此同時，它自然有其獨特的特徵，它的歷史上

最長的衰退，其結果留給日本的資本主義和其他國家一樣，被看作不穩定的和嚴酷的。日本的重建，拋棄了千百萬忠實的流動工人，他們曾於日本戰後受僱，攀登上繁榮的年代。中年的工人很有理由地希望另一個15年的僱傭，在政府的僱傭中心，提供工作，卻要承受「只有45歲以下」的分類。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到來，現在無家可歸和自殺的紀錄水平，宣稱比交通事故在1998和1999年中死亡的六萬人，多了三倍，他們中許多男人的年齡在五十餘歲。

日本盡快地撕破它的僱傭制度以使它能夠向海外輸出勞工。數千家製造業工廠已經轉移到中國和東南亞其他部份，投資在無限制的合夥經營，那裡提供廉價的勞動力，那些留在後面的人發現他們在接受一種事件的結果。馬克思150年前在英國已經證明——做更艱苦的工作得到更少的報酬。非正式的加班加點已急升起來，比起其他先進的經濟對手來，日本工人正在得到更少的休假。儘管他們名義上平均日薪17.5美元，事實上在1998年工人只拿到9.1元。今年較早時，日本最大的廣告公司Dentsu打輸了一場官司，一個新畢業的受僱人，在他自殺後其父母控告該公司索取賠償，直至這個男子死於24歲，已經有一年多每周工作80個小時。

令人絕望的措施

儘管日本被期望成為無可匹敵的政治經濟國家，統治階級卻依靠一些非常老式的凱恩斯治療法，以幫助它自己擺脫困境。自從90年代中期以來，政府已經削減利率差不多到達零，並且花費數以十億計的美元投在一系列巨大的一攬子公共工程上（1998年就有2,270億元），和挽救因投機於泡沫經濟而負擔壞賬的銀行。甚至《遠東經濟評論》認為，建築公司、銀行和小商人——重要的自由民主黨〔保守的執政黨〕的選民——已成為主要的受益人。累積的結果是使日本大的債務達到工業化國家般的最高水平。僅僅三年間，把一些銀行趕出市場，已使大銀行集團從21個合併為8個。

經濟衰退已經產生一種深刻的政治危機，反映在連續不斷的變閣（十年內換了七個首相），而且在執政黨內發生爭論，這令人驚奇。自由民主黨已經分裂了，它同各色各樣的較小黨派結成臨時的聯盟，仍然支配著政治舞台，這些團體贊成不同程度的溫和的改良，這種改良遺留下來的，自從1955年以來就保持完好地為他們服務。日本社會黨（JSP）在90年代中期經濟危機後，同自由民主黨結成臨時聯盟，後來改名為社會民主黨（SDP）。日本共產黨在1999年7月國會的普選中贏得14.6%。儘管它傳統地反對美國在日本的軍事設施，和口頭上得到國際工人階級的支持，日本共產黨本質上是一個民族主義的黨，它在90年代更進一步滑向右傾。

最清楚地能夠看到的，是99年8月對於在法律上指定「日之丸」（升起的太陽）作為國旗，和「君之代」為國歌的議案的辯論。「日之丸」就是這支日本法西斯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蹂躪東南亞時所持的旗幟，而「君之代」這首歌就是國歌，讚美天皇的德行，以天皇的名義行事就可成功。這個法案要求在學校和其他公共場所升起國旗和唱國歌，是最近的混亂中挫敗敵人的一種策略，但仍然是重要的行動，由日本的鷹派在美國的保護傘陰影下搬出來的，並在這個地區促使日本成為一個更有衝勁的政治和軍事的角色。儘管普遍地反對這個法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獨一無二的經歷，在日本共產黨墮落到它的反面之後，這個法案被通過了。對此，幾乎無人感到驚奇。

煽起來的民族主義

更加公開地恢復民族主義的形式，是最近在日本通過東京的臭名昭著的右翼市長石原對日本自衛隊的演講。他說，在一個地震的事變中免受非法的外國人侵害，自衛隊將被號召來保衛人民和財產。在他的演講中，石原用Sankokujin這個詞，一個在二次大戰後用來描繪朝鮮人和中國人的貶義詞，但是這個詞，今天只有頑固守舊的種族主義者才使用。朝鮮人在日本組成最大的僑民團體，給下面的事實所激怒：他們中的數千人（許多是強迫來日本當奴工的）在1923年最後一次大地震後被暴徒所殺害。但是當權的政客對於石原的批評卻緘口不談。

石原之流想要建立一個同日本的經濟力量同樣大的政治領導角色，卻同日本的失敗一起受到挫折。在冷戰年代末期，日本能夠在美國的經濟和軍事稱霸的同時發展起來。冷戰時代的結束，大致上同日本的經濟危機同時發生。新的架構要求日本維護它自己作為一個經濟和政治的巨大力量，儘管較少地得到鄰國的熱情反應。這種政治危機是明顯的。隨著改良主義者的左派政黨等的失敗，右派（石原僅僅是右派中最暢言無忌者）得到空間來繁衍。青年人廣泛地對殘酷的教育制度不滿，失業的增加和日本建立的政治陰暗世界，適合於吸收新成員。右派正在促使改變日本憲法第九條（即所謂和平條款），這是在戰後美國軍事佔領之下寫入的。日本已經有了世界第二位最大的軍事預算，要取消禁止保持一支常規的軍隊這一條，將會在這個地區具有巨大的政治和軍事影響。

當前日本的形勢，其中一種情況就是蕭條，它也給社會主義者提供一個成長的最好機會。經濟危機已經摧毀日本社會穩固的神話，並且迫使許多普通老百姓去懷疑他們先前所信賴的制度。絕少工人仍然幻想日本的公司會理會他們的生活，而許多人敵視公司的政策，憎恨政客和資本家的做法和動機，且對建制有更多的公開評論和批判，尤其是對警察當局和官僚。壓力團體和單獨行動的鬥爭數量在增長，改變教育制度的社會壓力在增加，性別歧視的職業訓練和貪污，就是一般老百姓回擊的對象。最近五一勞動節吸引了170萬工人去參加全日本1千多次的遊行示威，而且遊行示威這種回擊能夠帶到街道上。留下來的任務就是聯繫分散和無組織的抗議變成一個有組織的運動，這個運動能向日本資本主義的基礎挑戰。

（楊萍節譯自《社會主義評論》2000年6月號）

英工黨決定把醫療服務進一步私有化

里斯特

工黨政府就國民保健服務（NHS，以下簡稱民健）的前景進行磋商，大會剛剛落下帷幕，部長們就對醫療衛生工作者和工黨主要支持者的觀點表示祝賀。

首先，有意識地透露要增加私立醫院及民健的家庭病床使用率的信息。

私立醫院的醫生、護士及其相關專業人員都曾接受過民健的培訓，但僅僅爲了極少數人利益，便誘使他們在寬鬆環境的私立醫院工作這一事實看來，已超越冷酷無情的亞倫·密爾班的「現代」口號了。

任何時候，私立醫院都有大量的床位空置——因爲絕大多數人對私立醫院的醫療保險信心不足，認爲幾乎是沒有價值可言，目前私有醫療機構的服務人口覆蓋率僅爲八分之一。

儘管如此，密爾班的口號，如同許多其他內閣同僚所說一樣：「私立醫院好，公立醫院差」。他不是像大多數人所想做的，去恢復和發展民健，而是另尋答案。

從民健醫院有限的預算裡提取資金流入到寄生性的、以營利爲目的的私立醫院中去，其後果是很顯然的，將使更多的年富力強的民健第一線人員外流，造成其病房和至關重要的急救部門更嚴重的運作危機。

缺口擴大

因缺少訓練有素者，民健提供合格人員的缺口在擴大。民健信託基金會亦將面臨進一步的財政危機，反給私立機構創造了更多機會，形成惡性循環。

由於得到密爾班所偏袒的保守黨政策，即私有基金創始會（PFI）的財政資助，一大批新的私立醫院建立起來，民健的地位進一步惡化。

這不僅僅使民健的數以千萬計的資金流入私人醫院股東的腰包，也導致民健醫院的病床大量減少。

PFI私立醫院的大量出現所造成的影響，首先是減少了民健醫院提供的急症病人的床位儲備（急症病人是私立醫院沒有條件也不願意接受的），從而限制了預約病人的就診。

因而，要是「新勞工」條例得以執行的話，爲民健提供的佐敦·布朗額外資金將大部份直接進入私立醫院——限制了逐漸增長的預約病人的治療。

更糟的是，「新近全國病床調查」顯示，政府政策的第一主要組成部份似乎在於迫切需要擴張大量醫院的「調劑」病床，以應付迫在眉睫的病床短缺。

所謂「家庭關愛」戰略計劃（更準確地說，即「自己動手」的戰略，把病人留在家裡，把照料病人的事留在親人的手裡）是三種可能解決問題的辦法之一，有可能緩解高達4000張急診病床的短缺，這數字已在不甚完善的調查中得到證實。

但是，調查報告裡所提到的絕大多數「調劑」床位都是私人經營的家庭病床——幾乎都以營利爲目的。任何過高期望家庭病床可作爲加速醫院老病人的床位周轉將導致嚴重問題。

不僅政府有責任把更多民健資金分流進入私人機構的另一部門中去，而且這政策還要取決於私立家庭病床網所在區域有沒有擴展意願，這就使當地的醫院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幾年來的經驗證明，私立機構建立「家庭病床」並非針對醫療和社會服務的要求，而是應付市場的壓力。

由於全國各地的房產價格趨高，所能提供的家庭病床極其短缺，特別是倫敦，其家庭病床的供應率低於全英國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沒有跡象表明私人股東會改變他們的戰略——幫助密爾班提供更多民健預算份額去賄賂私人股東進行必要的投資。

民健人口調查結果尚未公佈，但是可以確信，幾乎很少有人（要是有的話）會負責地寄回問卷調查給衛生部，去詢問新工黨吸納佐敦·布朗的這筆姍姍來遲的資金來擴大私立醫院，而現在看起來似乎是這種情況，因爲被稱爲民健的「全國計劃」至7月份尚未揭曉。

民健不應把重要的服務項目讓位給私立醫院，而應尋求投資來擴展容納能量以確保再一次提供全方位的服務。

這計劃應包括建立民健家庭病床，爲年老體弱者提供持久性的服務，隨著以公有資金建立醫院的增加並足以大量的容納急診和預約病人，最終將使私有基金創始會消亡。

（黃申譯自《社會主義展望》）

爭奪利潤 破壞海洋

謝潑德

1998年6月美國總統克林頓在加利福尼亞州蒙特雷市舉行的、國家海洋會議上發表了講話。儘管克林頓作出姿態，談到了世界海洋陷於不斷增長的危機中，但他並沒有明確地指出危機的性質及嚴重的後果。

最近我又讀到由J·恩格蘭德（John Englander）寫的論文，題為《1996年海洋情況》，該文作者係「海洋期貨市場」董事長。

該文熱情地呼籲，並敦促我們要警惕海洋所處的困境，需要指出更合理的解決途徑，挽救海洋，挽救人類生存的環境。

恩格蘭德指出：海洋對於全人類來說，是自然資源必不可缺的要素，因為

- 海洋是食物的直接來源。
- 海洋可消耗二氧化碳並產生將近地球一半的氧氣。
- 海洋對氣候的影響具有重大作用。
- 海洋佔地球表面的百分之七十三，佔維持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 海洋是地球的生態系統。

恩格蘭德列舉了會引起對海洋生態系統嚴重破壞的四個因素：

- 捕魚過量
- 污染
- 自然環境的破壞
- 地球及氣候的影響力

我在1998年3月一期的《社會主義者行動》期刊上寫過有關世界漁業的衰退及可能帶來的破壞。

按照恩格蘭德的文章，聯合國糧食組織估計道：全世界17個主要捕魚區或達到或已超過自然極限，其中9個捕魚區正處於嚴重的衰退中。在美國，百分之四十貴重的魚獲量已經耗空；而百分之四十三魚獲量，因濫捕亂捕而已到了不能容忍的最大限度了。

我也曾經寫過工業化了的超級拖網捕魚隊（相當於一個足球場的面積），把幾千英尺長的尼龍魚網撒去水面上，把經過的所有海上生物一網打盡—每網可捕400噸魚獲。這些超級拖網捕魚隊每次去近海區逗

留數月，任意加工，冷凍他們的捕獲量，使他們優越性遠遠超過小規模的陸上基地魚船。

按照恩格蘭德的文章，每一年美國採用這種辦法，捕獲到1千萬噸的魚是屬於非捕獲對象或者是不需要捕的魚，這些魚都給扔掉了（扔掉的魚是商業性和娛樂性捕魚量的兩倍）。

一方面海洋魚類正面臨滅絕，而另一方面，自然環境（即魚類產卵區）正受到人類入侵和污染的破壞，恩格蘭德對此問題作出以下幾點的說明：

海洋污染問題，實質上是從主要的港灣開始的，由於化工產品、營養品、大部分農業排出的廢品而產生了海藻污染（在這種情況下，水中含有豐富營養物，結果藻類「窒息了」生態體系，而毀滅掉大部分海洋生命。）

舉例來說，密西西比河上已經腐爛掉的藻類，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薩斯州的海面上形成4000平方英里大的「死區」。在這「死區」裡，貝殼魚類全部死光，其他魚類則從墨西哥灣多養料的環境裡被迫離開了。

當油的漏泄成為媒體報道的頭條新聞時，實際上這只佔海上油污染的百分之五。極大部分海上油污染的根源是來自與汽車有關，汽車的廢氣廢物通過排水系統注入到海內。

在美國，凡擁有五百萬人口的市區、每年形成的油污染，大約為1千1百萬加侖，相當於阿拉斯加海岸外那艘著名的埃克森VALDEZ油輪上漏泄出來的數量。

污染的來源包括汽車、電力廠和工業。全世界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共計17億，但他們都沒有處理污水、污物的基礎設施。

空氣污染約佔進入海洋的有毒物質的三分之一。這在多數人聽起來，是個驚人的數字，但空氣污染是可以廣泛地疏散開的，而最主要的地球表面面積是屬於海洋。

魚類產量的減少是與自然環境的破壞、海岸的污染密切有關。百分之九十的海上捕魚量來自海岸地

區。

沼澤地和港灣是許多品種魚類的滋生地，但我們正在大規模地破壞它們。

在48個州的南部、原有2億2千萬英畝沼澤地，但在過去200年中已有百分之五十損失掉了。美國西部最大港灣—舊金山港灣有百分之六十的水域，因用於陸地開墾而消失了。

世界人口的半數生活在各海岸100公里之內。這些人口總是不斷地依靠海岸而生活，從而增加了對排污系統的壓力，甚至填塞了沼澤地。

這就使我想起那些攔路行劫的「強盜貴族」，他們自19世紀以來是以姦淫擄掠、破壞國家環境而成為暴發戶的。但在那個時代，我們可以執行地方性和全國性的法律來抑制他們的非法活動。

但今天的「強盜貴族」不受民族國家的國界和法律的約束。問題的基本點在於海洋國際化了。

全世界範圍內的爭奪利潤而展開的競爭正在破壞人類生存環境。特別是在蘇聯崩潰、亞洲出現經濟危機以來，在世界以及民族資本主義競爭這層意義來說，要想改變現有的進程、建設經濟基礎設施、並要轉變資本方向來保護環境，已是無利益，也是不可能的了。

世界歷史發展到現階段，資本主義已無力承擔保護環境。然而人類也不能容忍環境遭到破壞，應當在來得及的時候，我們便要開始完全改變對海洋的毀壞作法。R·卡爾遜（Rachel Carson）女士的書《我們周圍的海洋》，其中有一段話是這樣的：

「令人感到好笑的是：生命首先在其中產生的海洋，現在倒反而受到一種生命形式的活動威脅。海洋，儘管以可怕的形式發生變化，但仍能繼續存在，因為更確切地說來，這種威脅實際上是威脅到生命本身」。

恩格蘭德號召我們大家開始保衛海洋。他引用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的話作為結論：「切不可懷疑，世界上必有少數富有思想的、有責任感的公民能夠改變世界。這是歷史一再證明、從來就是如此的。」

如果我們繼續組織起來反對資本主義及其破壞性勢頭，我們定能改變世界。

（蕭明譯自《社會主義者行動》99年7月號）

《十月評論》代售下列書籍

歡迎郵購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電話：98463428

中國革命問題

彭述之選集第一卷	彭述之著	30元
彭述之選集第二卷	彭述之著	45元
彭述之選集第三卷	彭述之著	35元
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前因後果 ——評張國森的《我的回憶》	彭述之著	6元
毛澤東思想論稿	雙山著	30元
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	雙山著	15元
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雙山著	4元
印支問題	雙山著	3元
毛澤東以後的中國	伊文思著	3元
斯大林與中國革命	托洛茨基著	4元
中國革命底總結與前瞻	托洛茨基著	6元
托洛茨基檔案中致中國同志的信	托洛茨基著	10元
托洛茨基致中國托派的信	托洛茨基著	4元

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

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	曼德爾著	8元
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諸問題	曼德爾著	30元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導論	曼德爾著	8元
過渡時期的經濟	曼德爾著	8元
過渡時期的社會和經濟	曼德爾著	20元
關於過渡社會的理論	曼德爾著	10元
晚期資本主義	曼德爾著	45元
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	曼德爾著	24元

托洛茨基著作

托洛茨基文集	托洛茨基著	40元
斯大林評傳	托洛茨基著	30元
托洛茨基自傳	托洛茨基著	25元
被背叛的革命	托洛茨基著	40元
過渡綱領	托洛茨基著	9元
論蘇聯的國家性質	托洛茨基著	22元
蘇聯的歷史大冤獄	托洛茨基著	5元
文學與革命	托洛茨基著	25元
十月教訓	托洛茨基著	10元
他們的道德與我們的道德	托洛茨基著	5元
論學生與知識份子	托洛茨基著	3元
熱月反動	托洛茨基著	3元
新路向	托洛茨基著	5元
流亡日記三種	托洛茨基著	5元
戰爭與第四國際	托洛茨基著	5元

書評 評增山太助的《戰後左翼人士群像》

樋口篤三

本書（柘植書房新社出版，2,300日元）作者是戰後點燃革命運動火炬的「讀賣（新聞）鬥爭」的領導人，由他來對那些共同戰鬥過的人物寫評傳是很合適的。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歷史書物成千上萬，在日共的正統歷史中，就有《五十年黨史》、《六十年黨史》、《六十五年黨史》、《七十年黨史》等。在日共黨主流以外，有《德田球一》、《神山茂夫》等個人傳記，但卻沒有像《史記》那樣的列傳。這從一個方面反映了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界關於日本革命運動持有的「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日本帝國軍隊式性質。本書可以說是日本第一本革命列傳。

書評作者1947年加入日本共產黨，歷經兩次被開除仍堅持勞工運動，他對於「日本革命史＝日本共產黨史＝宮本顯志史觀」有深切的體會。除了「日本的列寧」（宮本）以及作為批判、迫害對象的「日本的毛澤東」（德田）、「日本的劉少奇」（志田重男）外，日共正統史觀裡的日本革命運動、勞工運動史上看不見「人」的影子。為了對日本革命的失敗進行歷史性的總結，首先必須不分功成名敗對代表性人物進行綜合評論。本書雖然對個別具體人物的評判不一定正確，但從整體上看，是非常有價值的。

本書列傳的一百人中，有29名日共「職業」黨員，兩名非日共職業革命家（平塚、凡岡秀子）、11名勞工運動組織者（包括日共黨員）、13名文學家、13名藝術家、10名學者、13名新聞界人士等。我雖然比作者年輕15歲，但也直接在書中30多人的領導下工作過，與書中數人也共同工作過。

除了山口武秀（農民運動）、鈴木市藏（國鐵工會與「2・1」總罷工）沒有列入外，結集在列傳中的人物代表了日本「革命黨」第一流的良心、正義感、人格與事業。其中包括日共的德田、野阪參三、志賀義雄（所謂「三巨頭」），金天海、神山茂夫、宮本、袴田里見、黑木重德、志田、椎野悅郎（所謂「重建七幹部」）、春日庄次郎（社會主義革命與構造改革論）、西澤隆二、安齋藏治（「毛澤東派」）

等；也有戰後工運巨頭細谷松太、高野實。書中特別提及在日朝鮮人日共幹部（上列）金天海、保阪浩明、車永秀，沖繩人德田、高安重正。至於文學藝術家太宰治、河原宏等，今天的日本人一般只讀其作品，不知道其政治立場。可以說，在戰前天皇制國家、軍國主義統治下奮鬥的日共的道德與良知，在戰後的民主革命鼓舞下一舉開花結果。可悲的是，如書中所列大多數人物一樣，成千上萬的革命者、活動家，都被日共踢散了。

在1947年的日共創立25週年紀念集會上，中野重治作詩《那些人們》歌頌那些沒有正式成為黨員卻為日共犧牲、奮鬥的人們，今天讀起來還令人感動。那是對日本革命、對日本共產黨充滿希望的時代。可惜，中野三年後作為「國際派」被開除；後來雖然在日共六中全會恢復名譽，卻於64年再與神山一同被「永久」開除，此後在日共黨史等文獻中再也見不到其名。「人民之敵」中野去世時，在宮本、藏原支配下的日共，沒有人敢表示悼念。

今天，研究中野的單行本就有247冊，這是任何日本文學、特別是無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學史上不可缺少的人物。諾貝爾獲獎者大江健三郎就公開表示：只要日共不改變對中野的態度，他就不會與《赤旗》交往。增山在書中高度評價中野：「我對於文學家中野重治曾經是日共黨員這一事實充滿自豪。我們之間當然有細微的差別，但日共黨員中野的存在，本身就為日共的馬克思主義增添了人性良心的光輝。」除了中野外，野間宏、佐多稻子、安部公房等等，都沒有出現在日共的宮本史觀中。日共的《六十五年黨史》只提及宮本百合子（宮本顯志夫人）的《播州平野》等作品。在宮本40餘年專制性地支配日共期間培植起來的龐大的宮本史觀，將來總會遭到徹底廢棄，但我本人卻是50年日共分裂時宮本的最熱烈支持者。

書中的長谷川浩（原日共政治局委員、工會部長）晚年表示：有上百萬人脫離了日共。日本研究馬克思、列寧、格拉姆西的泰斗石堂清倫也說有50萬人

脫離了日共。總之，這是非常龐大的數目，更令人寒心的是：這些人中，有95%以上的人都不願再提日共了。我自己認識的人當中，只有一位被開除的原日共東京都委員表示如果日共自己批判，願意回日共。實際上，此書的百人中，竟然有60人是脫黨或被開除者。

戰敗後的數年中，日本的民眾為每日的食糧奔波。我這樣48年成為黨專職（職業革命家）的人常常領不到工資、空腹工作。井上光晴的「反黨小說」《不能書寫的一章》就寫實地描述他在長崎縣作為黨專職工作人員的生活之苦。白川晴一（政治局委員）、渡邊四郎、內藤知周（曾是宮本派中心人物之一，當上中央委員後脫黨）等形容自己到70年代還是「赤貧如洗」，更不用說在日朝鮮人黨員們的生活貧困了。車永秀80年以後與我親交，告訴我他48年時在黨本部工作時午餐就是一個乾麵包、一杯白水，但宮本在大家面前獨自吃著白米加炒雞蛋。志賀與野阪也同宮本一樣，而志田、德球則與大家同食，很得人心。增山曾去宮本、志賀家作客，為其豪華住宅驚異。

比起經濟生活的貧困，政治生活的變幻更令人心寒。小松豐吉可能是命運最悲的黨中堅幹部吧！他是東京的三大日共據點工廠組織的領導者，特別在朝鮮戰爭中作為軍事委員會負責人鋒芒畢露。54年被志田委派與椎野、吉田同赴北京（後兩者知道命運不祥拒絕前往），在北京被袴田里見徹底肅整，對黨絕望之餘以酒消愁。歸國後無法工作，被開除後病死在路上，連家人也不認他。我當時所屬的川崎市東芝堀川町組織，在4,500名工人中有380名黨員，是「日本最大」的共產黨支部。當時的支部長K君才23歲，他後來與小松命運相同，死在橫濱的街路上，無人認領。黨中央的S君也是如此。我自己想來，雖然自己應該負一部份責任，但多數的責任是由於日共黨的政治方針從來沒有為「專職黨員」的生活著想。結果，那些把生命獻給黨的事業的人，或者死心塌地追隨宮本迫害同志，或者被開除出黨又沒法在社會中生存。在日共，宮本的「輝煌」路線下，堆積著過去的同志們的累累屍骨。

（譯者不由得對比托洛茨基臨終前在逃過一次謀殺後對KGB的揭露，指出正是那些犯過錯誤但已經緊

密依附黨的機器、沒有能力幹別的工作並習慣於特權位置的人，可以被 KGB 變成唯命是從的工具，擔當無惡不作的勾當。（註1））（未完，待續）

（趙京譯自日本新時代社《橋樑》周刊2000年10月23日、12月4日號。）

註1：李時譯《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斯大林謀害我的生命》，刊香港《十月評論》2000年第4期。



當時武裝鬥爭路線的大阪逮捕共產黨員

下列書籍歡迎郵購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第四國際簡史	法蘭克著	14元
古巴革命戰爭的回憶	格瓦拉著	20元
匈牙利悲劇	弗萊雅著	8元
1968年法國革命	南燦譯	18元
鄭超麟回憶錄	鄭超麟著	20元
雙山回憶錄	王凡西著	20元
我的回憶	陳碧蘭著	30元
記尹寬	鄭超麟著	40元
馬克思主義與第四國際	曼德爾著	3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一卷）	兆立譯	4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二卷）	兆立譯	4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三卷）	兆立譯	40元
先知三部曲（托洛茨基傳）3卷集	多伊徹著	100元
從蘇聯歸來	紀德著	12元
史事與回憶（3卷集）	鄭超麟著	200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一卷）	劉家良等著	30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二卷）	曼德爾等著	30元
香港的前途與社會主義運動	新苗	10元
論基本法與政制改革	新苗	10元
香港人的出路：爭取民主收回主權	新苗	10元
八九民運的回顧與前瞻	新苗	10元
從官僚社會主義到官僚資本主義	向青、劉宇凡著	70元
論中國官僚社會主義	向青著	40元
台灣人民怎樣選擇	新苗	20元
新婦女論	柯俞泰著	54元
苦口詩詞草	謝山著	30元

(來論) 《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1998年

前 戈

《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三卷是鄭超麟生前自選的文集，除《回憶錄》是1945年寫的之外，其餘文章、詩詞大多數是在1979年6月解除嚴密管制、恢復公民權之後寫的。

三卷本文選所收集的文章內容，可分為五大類：一、個人歷史，二、中國共產黨黨史，三、中國革命史料，四、中國托派史料，五、政論。這只是從文章的內容來劃分。誠然，同一篇著作中卻有二類或數類的內容。比如，《回憶錄》，既有個人的歷史經歷，又有共產黨史、中國革命史、中國托派史，是不可多得的著作。故此，《回憶錄》曾經於1982年出版，內部發行，後來又再版，最後再版公開發行。《回憶錄》還被翻譯為德文、英文、日文出版。在國內出版的《回憶錄》把《戀愛與革命》這一章刪去了，而今《文選》所收錄的《回憶錄》把這一章補上了。正如鄭超麟所說的，「戀愛與政治有關」，這一章並不是不重要的。

在中國共產黨黨史方面，鄭超麟提供了不少重要的資料，如：

上海第三次武裝暴動，中共黨史一向是說周恩來領導的，鄭超麟以他親身參加了這次暴動，所知道的領導這次暴動的是陳獨秀以及上海區委書記羅亦農。

1927年4月，陳獨秀到武漢後，中共中央的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在每次中共中央會議之前，他們三人事先商議作出決定，然後拿到會議上討論。所以那個時期中央的政策決定是瞿、譚、張三人起主要作用。那個時期被稱為「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實際上是瞿、譚、張三人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

1927年7月1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作出的「十一條」，中共黨史是說陳獨秀的「十一條」是「集右傾投降主義的大成」。鄭超麟指出，這「十一條」並非陳獨秀提出的，是瞿秋白在會上提出的建議，並由瞿秋白起草經大會通過的。

鄭超麟參加了「八七會議」，是會議的記錄人。他敘述了會議的情況，並指出會議沒有作記錄，後來

出現的「八七會議記錄」，是後來補上的。會上的發言也是後來才寫上去的。會上除了瞿秋白講話之外，毛澤東只說了幾句話，沒有其他人發言。

除此之外，還有不少對中共黨史作出糾正、澄清。由於鄭超麟在1924年從蘇聯回國就在中共中央工作，與中共中央個別人住在一起，中央會議有時他也旁聽，他所知道的人和事是不少的。他反對虛構與臆測。他對中共黨史的回憶材料，可信性很強。

以托派領導人身份寫出托派歷史的只有鄭超麟、王文元和彭述之、陳碧蘭。而彭述之的《回憶錄》只出版了第一卷（法文版），第二卷（中共黨史及中國革命史）、第三卷（有關托派史）只有錄音磁帶，還未出版。王文元敘述中國托派歷史是從1928年莫斯科中國學生組織反對派開始，1929年回國後，1930年參加托派活動，而鄭超麟補上王文元不足的地方，就是陳獨秀等人在中共黨內的反對派「無產者社」。鄭超麟回憶托派歷史不足的地方是他1931年被捕，在國民黨監獄中關押了六年，1937年8月釋放後又去了山村教書，直到1940年才回到上海參加托派中央工作。所以從1931年被捕後至1940年這段時間，他對托派的組織情況和活動是不知道或知道得不多，而對托派分裂後，鄭超麟王文元的少數派——國際主義工人黨的主張與活動，又敘述得很少，鄭超麟在少數派的刊物《國際主義者》、《新旗》、《建立》發表的大量文章，沒有一篇收入在《文選》內。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1967年10月24日（《第三次入獄梗概》寫的是1966年10月24日批鬥鄭超麟，這是記錯了的。1966年下半年和1967年上半年是監獄看管人員的批鬥，1967年下半年才進行獄中犯人批鬥）鄭超麟在托派小組裡第一個被批鬥。經過十多天的批鬥，最後鄭超麟被逼承認自己是反革命，對他的批鬥才結束。過了一段時間，接下來批鬥托派犯人的第二個、第三個。

鄭超麟承認自己是反革命是在批鬥的壓力之下被

逼承認的，思想上並沒解決問題。解除嚴密管制後，他馬上寫申訴給法院，要求為托派平反。法院對他說，如是他個人提出申訴要求平反法院可以受理，為托派平反法院不受理。

鄭超麟又寫信給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要求為托派平反，沒有回音。在他臨終時，把《致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信》要求為托派平反的信交給上海政協人員轉給中共中央，也是毫無結果。在他出獄後的十多年寫了不少論證中國托派不是反革命的文章，為蘇聯托派，托洛茨基等人平反的詩《丁字碑》（「丁」即「T」——TROTSKY托洛茨基），（註）他祈望在生前爭取到托派平反，死也瞑目了。可是他一切申訴請求平反毫無結果，他是含恨於九泉了。

鄭超麟在《托洛茨基「平反」了麼？》一文中，引用了1936年8月「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蘇聯中心案」蘇聯法院的判決書並未對托洛茨基、謝多夫判刑，只是「在蘇聯境內發現該父子行蹤時，應立即逮捕，交由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審判之」。既然，對托洛茨基、謝多夫沒有判刑，也就沒有對托洛茨基、謝多夫平反的問題。不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蘇聯中心案」沒有對托洛茨基、謝多夫判刑。但是，1938年3月「反蘇右傾托洛茨基集團案」，缺席判處了托洛茨基、謝多夫死刑。所以托洛茨基、謝多夫亦應該平反。後來，1988年托洛茨基、謝多夫得到平反了。

鄭超麟從蘇聯法院在「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蘇中心案」沒有對托洛茨基、謝多夫判刑，結合鄭超麟等托派未決犯，鄭超麟認為，就沒有平反的問題了。這是不對的。鄭超麟也記述了管理托派犯人的工作人員對鄭超麟說：「你們沒有判刑，不是沒有罪，是有罪的，他們判了無期徒刑，你們是頭頭，該判什麼刑？」。1979年6月，對托派人員解除嚴密管制，恢復公民權或給予公民權，恢復自由。政府工作人員一再申明：「釋放你們，不是你們沒有罪，你們是有罪的。」既然是有罪的，關押了二十六年半，鄭超麟等四人未判決犯，不是不用平反，而是應該平反。

鄭超麟非常關心有關托派平反的文章。原人民出版社社長曾彥修在《華夏縱橫》（1997年第2期）發表了《還歷史的真面目》。文章寫道，陳獨秀是抗日的，並非是漢奸。蘇聯托派案全是假案，中國的肅托案「湖西托派案」、「王公度托派案」、「王實味托

派案」，「全是假案」。

鄭超麟寫了《曾彥修所作〈還歷史以真面目〉一文書後》。認為曾彥修的「中國肅托案全是假案」是包括1952年12月的「肅托案」在內。這是曲解了曾彥修的「全是假案」。其實，曾彥修所說的「全是假案」，是指「湖西托派案」、「王實味托派案」、「王公度托派案」……等等，對解放後的托派，曾彥修說得很清楚，他完全同意唐寶林所說的解放後托派是反革命集團。

1952年12月的「肅托案」，曾彥修也就不認為是假案了，就不包括在「全是假案」之內。會造成這樣明顯的曲解，只能說是由於鄭超麟祈望托派平反心切所致。

鄭超麟對蘇聯社會性質、國家性質與托派的正統觀點完全不同。1949年末他就寫了《國家資本主義論》。說蘇聯是國家資本主義，在《文選》所收錄的多篇文章，也有作這樣的論述。他舉出了列寧在《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論及的國家資本主義。列寧列舉的蘇聯經濟成份有：1.宗法式的農民經濟，2.小商品生產者經濟，3.私人資本主義，4.國家資本主義，5.社會主義經濟。

列寧在這裡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是指出租給外商經營的企業經濟。列寧最初對出租給外商經營企業抱有很大希望，可是接受承租的外商寥寥無幾，國家資本主義形成不起來。當時農民經濟、小商品生產者經濟佔很大份量，可是社會主義經濟仍然佔主導地位。

拿列寧的國家資本主義作依據作為蘇聯是「國家資本主義」論斷，是站不住腳的。

鄭超麟從「國家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為「幹部主義」、「斯大林式的資本主義」。這樣的觀點集中在《論新資本主義》（第二卷），《一九九二年提綱》（第二卷）、及《馬克思主義在二十世紀》（第三卷）中。

鄭超麟的《幹部主義》，是在獄中學習反修文件「十評」時就形成的思想。很可能由於斯大林的「幹部決定一切」引發他的「幹部主義」。鄭超麟說蘇聯是幹部主義社會，官僚就是幹部，幹部屬於資產階級的一個階層。幹部佔據了政權，掌管了國家財產，佔有剩餘價值（即剝削勞動人民）；它不同於傳統的資

本主義，而是斯大林式的資本主義。由此而得出，蘇聯是資產階級國家，不是托派所說的墮落的工人國家；蘇聯是資本主義社會，而不是托派說的蘇聯還存在十月革命的成果公有制（即列寧所說社會主義經濟）。由此，如果外國軍事入侵蘇聯，就不是托派所主張的「無條件保衛蘇聯」了。

鄭超麟把資本主義國家企業經理不但有管理權還有行政權，是資產階級一個階層，以此來作為類同於蘇聯幹部——資產階級階層。這完全是牽強附會。資本主義國家企業的經理只有企業的管理權，並沒有對資產的決定權。股東的董事會才有權決定分紅計劃，企業與別個企業合併……等等有關資產的事情，而蘇聯官僚層，不但有管理權而且還有資產的處理權。

是的，蘇聯官僚層佔據了政權，掌握了國家財產，掌握國家財富（包括剩餘價值）的分配權。官僚把很小一部分國家財富佔為己有，通過高額薪俸、特別津貼、官僚特權享受設備完善的住宅、療養院、廉價商品的方式佔有。官僚佔有的剩餘價值還是很有限的，完全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剝削工人所佔有的全部剩餘價值（除了納稅之外）。官僚在職時所享有的特權，在去職後就一切都被取消了。住的公房還給國家，高額薪俸改為退休金或養老金。所以官僚層——幹部看作資產階級，蘇聯是資產階級國家，是資本主義社會，是不符合實際的。

鄭超麟在《馬克思主義在二十世紀》一文中，提出「二十世紀資本主義仍在發展，社會主義革命沒有成功」的問題。

鄭超麟首先從馬克思論述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的問題談起。他說馬克思所列出的擴大再生產算式，第一部類（生產生產資料）的有一部分產品超出第二部類（生產消費資料）所需而賣不出去，馬克思始終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盧森堡解決了這個問題，就是把第一部類賣不出去的那部分產品輸送到前資本主義地區。故此資本主義能繼續擴大再生產，資本主義能繼續發展。前資本主義地區把這部分產品消化了，就逐漸建立起資本主義生產。當前資本主義地區轉變為資本主義生產時，就不再需用第一部類多餘出來的產品了，資本主義就沒有發展的餘地了，就要為社會主義所代替。

這樣對馬克思列出的擴大再生產第一部類和第二

部類生產成分的比例算式的理解是錯誤的。馬克思列出生產成份的算式，只是為了研究資本主義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進行的情況。馬克思明確的說明這些算式的成分比例是假定的。既然是假定的數字構成的算式所得出的結果就是假定的結果，不是真實的結果，那就不應該拿它來解釋「二十世紀資本主義仍在發展」的問題。

資本主義必需擴大再生產，才能使資本主義能延續下去。但是擴大再生產會造成生產過剩，不論第一部類的產品以及第二部類的產品都賣不出去，那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一百四十多年期間就發生了大大小小的經濟危機多次。如果以國內市場無法容納產品的銷售來說，那是資本主義國家「全部生產力已經發揮出來了，」資本主義該死亡了。資本主義為了能延續下去，就必須擴大市場，主要的向國外爭奪市場。兩次世界大戰無非是為了爭奪世界市場、瓜分世界市場的鬥爭。不但把產品推銷到經濟落後的國家，而且把產品滲入到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為了佔領市場，就要生產價廉物美有競爭能力的產品，在這樣生產的要求之下，就必需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今天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就是在生產要求刺激之下急速發展的。所以世界市場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資本主義的生命線。

鄭超麟又引用恩格斯《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所說的「歷史清楚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因為1848年以後資本主義有了很大發展，足以證明資本主義經濟「在1848年還具有很大的發展能力。」鄭超麟以此來說明二十世紀資本主義能夠繼續發展，甚至還有繁榮昌盛，就是「資本主義還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的程度」，所以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革命沒有成功。

馬克思對法國1848年無產階級革命不成功的原因是和恩格斯的看法有不同的。馬克思認為是無產階級還不成熟，還沒有無產階級政黨來領導革命。

以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在1848年除了英國之外，在歐洲大陸無論法國、德國以及其他國家，資本主義在不同程度上成長起來了，還有繼續發展的可能。法國、德國還沒有發展到高度。但不應該以無產階級革命沒有取得勝利反過來證明是由於資本主義經濟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無產階級革命是需要具備有一定發展程度的資本主義經濟條

件才能實現的，但並不需要等到資本主義有了高度的發展，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尖銳化才能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俄國十月革命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俄國十月革命時資本主義還未發展到高度，而無產階級革命卻取得成功了。馬克思恩格斯一直認為英國資本主義經濟已經發展到階級矛盾、階級鬥爭尖銳化的程度，即無產階級革命的經濟條件已完全成熟了，但是英國不但在1848年，甚至到現在二十世紀末從來沒有發生過像法國1848年六月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俄國十月革命那樣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哪就當然不是因為英國的資本主義還未成熟到足以被剷除的程度了。

鄭超麟又引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即《資本論》）所說的話：「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以此來說明二十世紀資本主義仍在發展，而且繁榮昌盛，證明資本主義全部生產力還未完全發揮出來，社會主義就不能代替資本主義了。

在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為什麼還能繼續發展？是不是資本主義全部生產力還未完全發揮出來？

馬克思早已為我們解答了這個問題。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它一天也不能停止生產，它要不斷地更新，不斷地用新技術與新的生產方法來代替舊的生產技術和舊的生產方法。危機破壞了一部分生產力之後，又重新發展起來，繼續它那週期性的危機、復甦、繁榮、停滯、危機這樣的方式發展下去。如果社會主義革命沒有取得勝利，資本主義依然繼續它那週期性的發展下去。

所以，資本主義有了發展與擴大，不能反過來證明資本主義還未成熟到足以被剷除的程度。資本主義發生危機就是「資本主義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完全發揮出來」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達到尖銳化的程度；就表明資本主義已成熟到足以被剷除的程度。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後，資本主義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已成熟到被剷除的程度，甚至落後的俄國資本主義「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就爆發了社會主義革命，而且獲得成功。德國資本主義比俄國發達得多，但德國社會主義革命失敗。革命失敗的原因也就不能歸於資本主義還沒有成熟到被剷除的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仍在發展，而且還有過經濟繁榮，特別表現在廢墟上發展起來的經濟大國德國和日本。戰後資本主義得到大發展是由於戰爭破壞生產力，正如危機破壞生產力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遍及歐、亞、非洲，戰爭所造成的破壞是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無論廣度與深度都大得多。戰爭消耗了大量的物資，又破壞了大量的物資，戰後就需要大量物資來恢復被破壞的地區，那就要擴大生產，加速生產來填補戰爭所消耗了的物資，和恢復被破壞地區所需要的物資。於是資本主義又得到了繼續發展的條件，而且戰後有過資本主義繁榮的時期。

在二十世紀，除了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之外，所有資本主義先進國家都沒有爆發社會主義革命或社會主義革命不成功。客觀條件（經濟條件）成熟了，而主觀條件（無產階級條件）還未成熟。

馬克思總結法國1848年革命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無產階級還不成熟，尤其是沒有無產階級的政黨來領導無產階級鬥爭。

在二十世紀，無產階級政黨建立了，但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無產階級走改良主義道路而不是革命道路。及後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出現了，但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互相排斥，有的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甚至使用武力來消滅別的無產階級政黨，因此，無產階級四分五裂，加之以蘇聯在斯大林統治之下，倒行逆施，大大破壞社會主義聲譽，減弱了世界人民嚮往社會主義的信念。

社會主義的客觀條件早已成熟了，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革命能否成功，就要看主觀條件是否成熟。

我們要記住：一天社會主義革命沒有勝利，資本主義還是繼續它那週期性的危機、復甦、繁榮、停滯、危機這樣的方式發展下去。

1999年9月9日

註：托派第四國際書記處寫信給蘇聯，提出建立一座托洛茨基紀念碑，用金字刻上托洛茨基的名字。



「五四」運動爆發。

(來論)

歧途與正道

——讀書雜記之四(上)

林子

- 一、舊調重彈
- 二、我國學術界研究托洛茨基問題的成果
- 三、甚麼是不斷革命論？
- 四、斯大林如何批判不斷革命論？
- 五、俄國革命中的不斷革命論和階段論
- 六、中國大革命的不斷革命論和階段論
- 七、關於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
- 八、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舊調重彈

人們常把陳獨秀在大革命失敗後轉向托洛茨基，接受托洛茨基的觀點，並成為中國托派的領袖，說成是“誤入歧途”，這種說法有何根據呢？

把托洛茨基的理論和觀點說是歧途，這實際上是斯大林的老調。在各種各樣的出版物中，大凡把托洛茨基和托派的主張和觀點視為“歧途”的，大都是從斯大林在20年代攻擊托洛茨基所寫的著作或所作的演講中搬來的。如說托洛茨基“輕視農民”，“不要農民”，“不相信工農聯盟”，“混淆革命階段”，“超越民主革命”，“不相信無產階級的力量”，“反對一國社會主義”……等等，都是斯大林的說法。在長時間裡，許多人對於斯大林所說的這些話，並沒有懷疑它的客觀真實性。但對於每個存心要探究歷史真實的研究者和讀者來說，理應直接從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托派的文獻中去探討托洛茨基和托派的思想 and 觀點，而無需從第三者的批判和評論中去尋找依據；即使有這樣的必要，也應當查對所研究對象的著述，看看是否和他的思想真正符合，這才是嚴肅的歷史研究態度，才不至於人云亦云。

長期以來，絕大多數共產黨人對斯大林的一言一語，從來是深信不疑的；在大多數場合，這只簡單地是因為斯大林居於黨的領導地位，以黨的名義說話，也以列寧的繼承人資格說話；只要是斯大林說過的，就信以為真，不加任何考慮便全盤接收不誤，還以為

這樣做就是忠於無產階級的黨，忠於共產主義事業，是黨性的表現了；這樣久而久之，便逐漸地甚至完全地喪失了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而把斯大林的思想當成是黨的思想，也是自己的思想；把斯大林所說的話當成是黨要說的話，也是自己要說的話，以至形成為一種習慣，一種潛意識的東西，如同宗教信徒對待神聖不可侵犯的教主的一言一語一樣。

可是，自從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作了著名的《秘密報告》揭露了斯大林專制統治的暴行以來，四十年過去了，大量的事實證實了斯大林是個善於偽造歷史、編造謊言的行家老手。他不僅善於篡改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觀點，也善於隨心所欲斷章取義歪曲他所要排斥和打擊的對手的思想和觀點。因此，今天有頭腦善思考的人，應當以審慎的批判的態度來審查斯大林的言論，才不至於上當受騙。

眾所周知，發生在20年代的托洛茨基同斯大林之間的爭論，涉及的問題非常廣泛，包括當時俄國的國內政策和國際政策，諸如俄國的經濟建設、政權建設、黨的建設，以及英國大罷工、中國大革命……等等問題；而理論上的問題則歸結為斯大林主張的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爭論。在這些爭論中，斯大林先是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結成三人幫，後與布哈林又結為二人幫，為了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他們編造了“托洛茨基主義”的神話，給托洛茨基戴上“反列寧主義”的帽子；而對托洛茨基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觀點，則採取斷章取義、歪曲、篡改和偽造的手法，進行連篇累牘的攻擊，以敗壞托洛茨基在人民群眾中的聲譽，以達到排斥托洛茨基的目的。上面所舉的斯大林關於托洛茨基的種種說法，如“不要農民”等等，就是斯大林玩弄的卑鄙手法的最好例證。今天，人們還要搬弄斯大林的拙劣貨色，只能說明思想的貧乏和手段更為卑鄙而已。

二、我國學術界研究托洛茨基問題的成果

80年代初，我國學術界打破過去對斯大林頂禮膜拜的迷信，提出全面評價托洛茨基的問題。1981年10月14日，上海市歷史學會世界現代史組與上海市科學社會主義學會共運史組聯合舉行了一次學術討論會，到會的專家學者達30餘人。會後，《世界史研究動態》雜誌記者武克全以《如何評價托洛茨基的一生》為題，詳細介紹了會上我國歷史學界對托洛茨基問題的初步研究成果，發表在1982年第二號《世界史研究動態》上。武克全的文章介紹了討論會對20年代斯大林斥責托洛茨基“打著社會主義革命的幌子否認民主革命”，“否定農民的作用，混淆革命性質，超越革命的階段”，“打著世界革命的幌子，否定在蘇聯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等等的說法提出了疑問和異議，學者們根據自己對托洛茨基著作和文獻的研究，得出如下看法：

有的學者認為：“托洛茨基指出過，俄國面臨的任務是鏟除沙皇專制制度，解決土地問題，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俄國資產階級無力充當革命的領導，小資產階級和農民不能成為領導，唯一能領導的是無產階級。在帝國主義的條件下，只有國家的社會和政治關係成熟到無產階級作為人民群眾的領袖掌握了政權的時候，民族民主革命才能取得徹底勝利”。

“托洛茨基又認為，農民儘管在社會方面和革命方面佔有巨大的比重，但不能建立一個真正獨立的政黨，尤其不能把革命政權集中在這樣一個政黨手中”；

“如果不由工人階級掌握政權，俄國革命就不可能解決自己的民主問題，首先是土地問題”。根據對托洛茨基著作的研究和對照斯大林的論述，學者們指出：

“斯大林認為托洛茨基混淆革命性質，超越革命階段，似乎不盡符合他的原意”。學者們又認為，對於革命政權性質，“托洛茨基當時的分析似乎也是正確的”。而對於“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學者們也肯定了托洛茨基的分析：“正確地說明了社會主義經濟的世界聯繫，估計到世界資本主義對蘇聯干涉以及國內階級鬥爭的必然性”（以上引文均見1982年1月號《世界史研究動態》第24頁）。

由上述武克全介紹的上海市學術界討論會的情況來看，在對待托洛茨基的問題上，只要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依據他本人的著作和檔案資料來進行探討，就不難發現斯大林對托洛茨基進行攻擊的種種說法，都是沒有事實根據的謊言。

1981年10月的上海學術討論會無疑是我國學術界研究托洛茨基和托派問題的開端。十餘年來，雖然沒有看到有關這方面的專題研究報導（除陳獨秀問題之外），但可以肯定地說，隨著蘇聯、東歐各國以及亞洲的越南、蒙古、朝鮮、美洲的古巴和我國等的改革深入開展，這些國家所面臨的迫切問題，事實上正是20年代俄國在十月革命後所遇到的問題，諸如黨和國家政權建設中的民主問題等等。只是這些問題在今天則以更加尖銳的形式提出來吧了。所以研究20年代由當時的現實提出的問題而引發的托洛茨基與斯大林之間的爭論，無疑對解決今天改革面臨的問題將是一個極好的歷史借鑒。

三、甚麼是不斷革命論？

20年代有關不斷革命論和一國建設社會主義論的爭論是俄共（布）黨內和共產國際內一次重大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兩條不同戰略路線的爭論，它反映了以斯大林為首的當權派和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左派反對派的兩種不同的階級觀點和階級立場。要弄清楚雙方的觀點和立場需要對雙方的論述作客觀的研究。

首先談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我們當然不應當從斯大林對不斷革命的批判和評價中去了解不斷革命論，這是不言而喻的。我們只能從托洛茨基本人的著作和文獻中去了解。雖然今天我國翻譯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不多，已出版的也是少量內部發行，還不能公諸於眾，可說是個禁區或半禁區。但從已出版的著作和別人著述中引用的資料，也可以使我們對不斷革命論的觀點有個基本的了解。

托洛茨基最早論述不斷革命論的著作是1906年寫的《總結與展望》，1922年托洛茨基在《1905年》一書的《序言》中也概括地談到他的不斷革命論，而最詳盡地系統地闡述不斷革命論的則是在1928年至1929年寫成的《不斷革命論》一書，在這本書的第十章《甚麼是不斷革命論——其基本要點》裡，托洛茨基本人把不斷革命論歸納為如下的十二個要點：

（1）在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國家，特別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不斷革命論就是意味著：只有通過這些國家作為農民大眾領導者的無產階級的專政，才能完全和真正解決民族民主解放的任務。

（2）落後國家居民的大多數是農民，它在民主革命中處於很重要的地位。不與農民結盟，無產階級就

不能解決、也無法提出民主革命的任務。但，不與民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做不調和的鬥爭，無產階級同農民的聯盟就不可能實現。

(3)不管各國革命的最初階段情況如何，無產階級同農民的革命聯盟，只有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之下才能實現。這也就意味著，只有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才能解決民主革命任務。

(4)十月革命的經驗表明農民具有偉大的革命的作用。但，農民既不能發揮獨立作用，更不能起領導作用。他們或者跟隨工人，或者追隨資產階級。布爾什維克的舊公式“工農民主專政”只能被看成是領導農民的無產階級專政，才具有積極的革命意義。

(5)從階級內容來看，工農民主專政作為不同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制度，只有在農民能夠組織成為一個獨立的革命黨，能夠制訂自己的政綱，並在無產階級政黨的支持下取得政權，才有可能實現。但，正如全部近代史，特別是近25年俄國的經驗所證明了的，要創建獨立的農民革命黨，存在有不可逾越的障礙，這就是農民作為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缺乏獨立性，及其內部的深刻分化。因此，在一切決定性的場合，特別是在戰爭與革命的抉擇面前，小資產階級（農民）的上層總是與大資產階級一道走，下層則與無產階級攜手共進，其中間階層則在兩極間作出選擇。在克倫斯基與布爾什維克政權，在國民黨與無產階級專政之間，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中間道路，因此，也就不會有與無產階級專政有所區別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存在。

(6)只要把工農民主專政這個口號同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就會在政治上使無產階級在小資產階級大眾中解體，為民族資產階級掌握領導權，從而為民主革命的失敗創造出最有利的條件。斯大林、布哈林把這個口號寫入共產國際綱領，是對馬克思主義和布爾什維克的十月傳統的直接背叛。

(7)作為民主革命的領導者而掌握政權的無產階級專政將不可避免而且十分迅速地面臨解決與侵犯資產階級所有權密切相關的任務，民主革命便立即上升為社會主義革命，並形成為不斷革命。

(8)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並沒有完成革命，而只是使它開始。社會主義建設既以民族的，也以國際規模的階級鬥爭為基礎，在資本主義關係在世界舞台上佔壓倒優勢的條件下，階級鬥爭將使不論是在落後國家

還是已經經歷了民主主義和議會主義漫長歷史階段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具有不間斷性。

(9)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在民族範圍內完成。資產階級社會危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這個社會所創造的生產力已經同民族國家的疆界不相容了。社會主義革命將在民族的舞台上開始，擴展到國際舞台，並在世界舞台上結束。社會主義革命就這樣成為不斷革命。

(10)資本主義開拓了世界市場、世界分工和世界規模的生產力，這就為世界經濟向社會主義轉變準備條件。

各個國家將會以各自不同的速度走完自己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歷程。在一定的條件下，落後國家會比先進國家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但卻要比先進國家晚到達社會主義。

落後國家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政權及其社會主義命運最終不是取決於民族的生產力，而主要是依賴於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

(11)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是永遠同不斷革命論的理論相對立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只能導致大民族主義。世界性的分工、蘇維埃工業對外國技術的依賴，先進國家對亞洲原料的依賴，使得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從事獨立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

(12)斯大林、布哈林的理論不僅將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機械地割裂開來，也割裂了民族革命和國際革命。在前一場合，它會麻痺無產階級爭取政權的鬥爭，從而妨礙了落後國家革命的勝利。在後一場合，按照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就會把共產國際降低為僅僅是與軍事干涉作鬥爭的輔助性武器。（參看對馬忠行著《托洛茨基主義》中譯本第27-30頁）。

從上面轉述的托洛茨基本人歸納的不斷革命論的基本要點來看，任何一個認真思考的讀者對斯大林硬說托洛茨基“不要農民”、“輕視農民”，“不相信工農聯盟”，“混淆革命階段”，“超越民主革命”等等的說法，實在是難以認同。斯大林如此隨心所欲歪曲托洛茨基的觀點，為的只是更易於打擊和排斥他而已。在這點上，斯大林是成功了。但終究一葉不能障目，只要一對照托洛茨基的著作，就不難看穿斯大林的騙人的把戲。

四、斯大林如何批判不斷革命論

斯大林在批判托洛茨基時也引用托洛茨基的著作。如他在1924年10月寫的《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這本小冊子中引用托洛茨基1922年為他的《1905》一書所作的序言中的一段話：

“正是在1905年1月9日事變到10月罷工這個期間，本書作者對於俄國革命發展的性質形成了獲得「不斷革命論」名稱的那些觀點。這個奇妙的名稱表達了這樣一個意思：直接擺在俄國革命面前的雖然是資產階級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這個目的上面。除非使無產階級掌握政權，革命就不能解決它當前的資產階級任務。而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後，又不能以資產階級範圍來限制自己。恰恰相反，無產階級先鋒隊正是為了保證自己的權利，還在它統治的初期，就不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資產階級所有制；在這種情況之下，它不僅會同那些在無產階級鬥爭初期支持過它的資產階級集團發生敵對的衝突，而且會同那些協助過它取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群眾發生敵對的衝突。在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落後國家內，工人政府所處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國際範圍內，即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決”。（見《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317頁）。

托洛茨基這段話的意思是很清楚的，相信任何一個不抱成見的讀者都能正確理解。這段話有三層意思：

第一、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任務，只有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之下，才可能得到解決。

第二、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在侵犯封建所有制的同時，也必然會侵犯資產階級所有制，即開闢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第三、因此，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工人階級同農民之間會存在有“敵對的衝突”，即經濟利害的矛盾。這個矛盾只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能解決。（參看《瞿秋白研究》第五輯403頁鄭超麟著《瞿秋白與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一文）

在這裡，斯大林在引用上述托洛茨基的這段話之後，卻斷章取義地抓住第三個論點中所說的工人階級政權同農民會發生“敵對衝突”這一點來做文章，並拿來同被他砍頭去尾歪曲了的所謂“列寧觀點”來做比較，說列寧主張“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階層的聯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而托洛茨基則說工人階級會同農民發生“敵對衝突”。他又把托洛茨基所說的

“只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解決”工農之間的矛盾的話歪曲成：托洛茨基認為俄國的革命只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吸取必要的力量”，並說是同列寧的“革命首先要從俄國本國的工人和農民中間吸取力量”的主張是對立的。斯大林還毫無道理地謊話甚麼“在托洛茨基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是和廣大農民群眾發生敵對衝突而只有在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設法解決矛盾的政權”。斯大林這種望文生義穿鑿附會的手法簡直就是無中生有了。斯大林這種隨心所欲斷章取義歪曲論敵觀點的手法，確實蒙蔽了不少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使人不能正確理解托洛茨基的真正觀點。中國歷代的封建王朝製造過不少文字獄，靠的就是這種望文生義穿鑿附會憑空捏造的手法，但受害者大抵只是當事人，最多也只牽涉到他的家族。而斯大林的所作所為，受打擊的不僅是托洛茨基及其一派，而且由於他以偽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為掩護，欺騙了廣大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堵塞了廣大黨員和群眾認識真理和接近真理的通道，這就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斯大林最大的罪過。

五、俄國革命中的階段論與不斷革命論

斯大林將俄國革命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03年至1917年2月，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革命的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後備軍是農民”，“打擊的方向是保皇派自由資產階級”。第二階段是從1917年3月至1917年10月，目的是“推翻俄國的帝國主義，擺脫帝國主義戰爭”，“革命的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後備軍是貧苦農民”，“打擊的方向是孤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第三階段是從“十月革命後開始的”，“目的是在一國內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以便在世界各國推翻帝國主義”，“革命的力量是一國的無產階級專政，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後備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半無產階級群眾和小農群眾，殖民地和附屬國的解放運動”，“主要的打擊方向是孤立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孤立第二國際各國黨”（見《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133-134頁）。斯大林給每一個革命階段的起始時間，革命的目的、動力、打擊方向等等都安排好了，可謂周詳之至。但這明顯是事後的主觀安排，而不是俄國革命的客觀進程的反映。這種關於革命階段的劃分實屬主觀主義歷史機械論的

典範。它導源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還沒有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前便提出來的“革命階段論”。按照“革命階段論”的說法，俄國應首先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對於這一點，無論是布爾什維克還是孟什維克，主張都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布爾什維克認為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應由無產階級來領導，革命建立的政權應是工農民主專政。孟什維克則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由資產階級領導，革命建立的是資產階級專政的民主共和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爭得的只是反對派的地位。其實，這種關於俄國革命階段論從一開始就只存在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革命家們的思想之中，是主觀認識的產物，不是已經實現的客觀存在的東西。它能不能實現還有待於客觀的階級鬥爭的實踐來檢驗。

從俄國歷史發展的客觀進程來看，斯大林關於俄國革命階段的劃分是十分牽強附會的。就拿所說的從1903年至1917年2月的所謂第一階段，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來說，在這個歷史時期內，發生過1905年革命，但在革命失敗後直至1914年帝俄同英、法帝國主義締結協約積極進行第一次世界戰爭，沙皇的專制統治一直是比較穩定的。特別是在1907年6月，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二屆國家杜馬之後，出現了斯托雷平的反動時期，不僅布爾什維克，連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等都受到沙皇政府的嚴重打擊，雖然革命家們一直沒有停止過推翻沙皇統治的革命活動，但事實上並沒有存在過客觀的革命形勢，當然也就談不上存在甚麼“革命階段”了。直至世界大戰進行了三年之後，由於帝俄在戰爭中屢遭失敗，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困難，人民愈來愈不滿，才出現沙皇統治的政治危機和革命危機，從而導致二月革命的爆發。

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專制統治，卻出現兩重政權的局面，一方面成立了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另一方面工人、士兵卻自動地組成了工兵蘇維埃。這個為列寧稱做巴黎公社式的半政權的工兵蘇維埃從一開始便為孟什維克等的妥協政黨所把持，按照“革命階段論”的觀點，孟什維克把蘇維埃自願地作為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附屬物，甘願充當資產階級政權的奴僕。而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卻無力去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它不能給人民以和平，卻繼續奉行沙皇帝國主義的戰爭政策，把人民繼續推向戰爭的深淵。它不能解決農民的土地要求，卻繼續維護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它更不願人民獲得自由、平等的權利，卻暗地同反動的

貴族、軍官、士官生勾結，串通一氣要向起義的人民進行反攻。這一切都說明二月革命雖然推翻了沙皇的統治，而革命的民主任務並沒有完成，革命還在向縱深發展，工人、士兵、農民群眾還在為爭取和平、麵包、土地而繼續進行鬥爭，客觀的形勢表明只有無產階級奪取全部政權，才能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列寧以他的敏銳的政治眼光，一回到彼得格勒，便提出他的有名的“四月提綱”。他指出：“俄國當前形勢的特點是從革命的第一階段向革命的第二階段過渡，第一階段由於無產階級的覺悟和組織程度不夠，政權落到了資產階級手中，第二階段則應當使政權轉到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手中。”他號召為“全部政權歸蘇維埃”而鬥爭，因為“蘇維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不要議會共和國（從工人代表蘇維埃回到議會制共和國是倒退了一步）”，而要“從下到上遍及全國的工人、雇農和農民代表蘇維埃共和國”。列寧認為只有蘇維埃政權才能爭得到和平、麵包和自由。他批評那些堅持“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口號的以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為代表的老布爾什維克們說：“這個公式已經過時了，已經完全不適用了，已經殞死了，要使它復活是徒勞無益的”。“現在誰只談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民主專政，誰就是落在生活的後面，因而實際上跑到了小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這種人應當送進革命前布爾什維克古董保管庫去”。列寧非常清楚，俄國革命的實踐已經清楚地表明，在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與無產階級專政之間已經不會有“無產階級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地位了，實際的階級鬥爭已經用“工兵代表蘇維埃”取代了“無產階級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而“工兵代表蘇維埃”就是巴黎公社式的工人政府，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形式。列寧認為“工兵代表蘇維埃會比議會制共和國更快更好地發揮人民群眾的主動性，它們會更好地、更實際地、更正確地決定怎樣才能採取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以及究竟能夠採取那些社會主義的步驟”（以上引文均見《列寧全集》中譯本第二版第29卷17、115、117、138、144、147、148等頁）。

但是，在二月革命後，阻止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奪取全部政權的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所以列寧在1917年7月所寫的《革命的教訓》一文中指出二月

以來的經驗時說：“俄國革命的教訓是：勞動群眾要掙脫戰爭、饑荒和地主資本家的鐵鉗，就只有同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決裂，認清他們的叛徒嘴臉，拒絕同資產階級實行任何妥協，堅決站在革命工人這邊來（如果貧苦農民支持他們的話），才能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引導人民無償地奪取土地，獲得完全的自由，戰勝饑荒，消除戰爭，達到公正的持久的和平”，實現“和平、自由、麵包”的口號（《列寧全集》第32卷第64頁）。

根據二月革命後實際階級關係的變化及俄國無產階級的政治要求，列寧不為自己提出的、現在已經變成“僵化的”舊公式“工人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所拘囚，無私無畏地拋棄這個舊公式，勇往直前地帶領布爾什維克號召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組織起來、團結起來，為實現工農代表蘇維埃單獨掌握全部政權進行鬥爭，終於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開闢了通向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

在十月革命四周年時，列寧總結俄國1917年2月到10月的革命經驗，他說：“我們比誰都更徹底地進行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我們是完全自覺地、堅定地和一往直前地向著社會主義革命邁進，我們知道社會主義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間並沒有隔著一道萬里長城，我們知道只有鬥爭才能決定我們（終於）能夠前進多遠，能夠完成崇高任務中的那一部份，鞏固我們勝利中那一部份”，“我們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問題，作為我們主要的和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主義工作的「副產品」順便解決了”。“考茨基、希法亭、馬爾托夫……都不能了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這種相互關係。前一革命可以轉變為後一革命。後一革命可以順便解決前一革命的問題。後一革命可以鞏固前一革命的事業。鬥爭，只有鬥爭，才能決定後一革命能夠超過前一革命到甚麼程度。”（《列寧全集》中譯本第二版第42卷169、170、172頁）列寧對俄國革命的這些總結性的話，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難怪越飛在他的遺書中說到列寧生前曾親口對他說：1905年黨內關於革命戰略問題的爭論，對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列寧自己。

列寧所以能夠摒棄他自己提出的並堅持了十餘年的布爾什維克的舊公式：工人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這正是列寧偉大之處，說明列寧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並不以自己個人的意志強加於人，強加

於階級，強加於廣大的革命群眾。他只是同階級一起，同革命群眾一起在革命鬥爭的實踐中，深刻體會階級和群眾的政治願望和要求，總結鬥爭的經驗，從而提出正確的口號來動員群眾進行鬥爭。事實上，列寧當初提出“工農民主專政”這個舊公式時，既注意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同社會主義革命截然不同的方面，也注意到兩者的關係。他認為必須把兩種革命極嚴格地區分開，但是，他又說：“難道可以否認前後兩種革命的個別枝節成份在歷史上互相交錯的事實嗎？難道在歐洲民主革命的時代沒有許多社會主義運動和爭取社會主義的嘗試嗎？難道歐洲不是還有許多民主性質的事情要由將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去最終完成嗎？”“社會民主黨人永遠不應當，而且一分鐘也不應當忘記，無產階級為了爭取社會主義，必然要同最主張民主共和國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這是毫無疑義的。唯其如此，社會民主黨絕對必須是一個獨立存在的階級性十分嚴格的獨立的政黨”（《列寧選集》第一卷575-576頁）。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所以在二月革命後出現新的階級鬥爭形勢下，列寧才毅然決然地拋棄舊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公式，堅決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為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而進行鬥爭。

俄國革命的實踐證明，從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的統治，到10月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奪取了全部政權，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這就表現為俄國革命發展的不斷性。在經歷了俄國革命的實踐之後，列寧和托洛茨基這兩位無產階級革命的巨人，終於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問題上走到同一條道路上了。

（未完待續）

更正

1. 本刊今年第3期第9頁右排第8行的「哈佛市」應為「劍橋」。
2. 本刊今年第4期第15頁左排倒數第15行的「阿里戈」應為「艾琳達」。
3. 同期第35頁第一段第7行「地板上我們的子彈空殼」，應為「地板上找到的子彈空殼」。

特此向讀者、譯者深致歉意。

2000年總目錄

總期數 頁數

香港

199	2	反對橫徵雜稅，劫貧濟富！.....	振言
199	3	林巧英冤獄的啟示.....	微波
199	4	我在香港的日子.....	(轉載) 林婕
200	2	保衛新聞言論自由！反對京官干預侵奪！.....	微波
200	4	仁政還是苛政？助貧還是欺貧？.....	振言
201	2	成立三年來的香港特區政府.....	振言
201	4	終身進修！撤銷語文基準試！.....	微波
202	2	徹查及防止對學術自由的干預！.....	軍行
202	4	反對惡人先告狀，聲援被迫害學生！.....	微波
202	6	強烈譴責政府政治迫害！.....	32團體和205位人士
202	7	和平示威是公民權 立即修改公安惡法.....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202	8	立法會舊瓶舊酒.....	振言
203	2	公安惡法 必須修改！.....	軍行
203	3	從立法會補選談到特首的推選.....	振言
203	4	官商加強壓榨 市民苦上加苦.....	微波
203	5	強積金可以保障你嗎？.....	(轉載) 陳瑩

梁國雄參選專頁

202	10	長毛參選宣言.....
202	11	政綱略要.....
202	11	如何保障基層勞工權益??.....
202	12	特區政府違反勞工權益事件簿.....
202	12	為何要結束一黨專政??.....
202	12	答客問.....
202	12	梁國雄的過去、今日與未來.....
202	13	長毛的抗爭簡歷.....
202	13	十大理由支持長毛.....
202	13	中共十大違反人權事件簿.....

中國

199	5	與權錢結合的貪污腐敗.....	張開
199	8	舊愛、新歡.....	麥尼爾

總期數 頁數

199	9	世貿協議為中國資本主義復辟鋪路.....	梅茵
200	10	立即停止迫害，釋放法輪功等被捕者！.....	張開
200	14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為帝國主義廣開門戶.....	《工人先鋒報》
200	16	中國政府承認有三億貧民.....	《工人先鋒報》
201	9	「六四」十一週年看中國社會的抗爭.....	張開
201	11	天安門母親不再悲傷.....	(轉載) 丁子霖
201	12	遼寧工人的抗爭.....	史丹譯
201	14	職工憂什麼？.....	(轉載) 朱運濤
202	18	市場經濟導致生產很不安全.....	張開
202	22	官賊論.....	(來論) 王克江
202	23	中俄新關係及與帝國主義間的關係.....	阿舍卡爾
202	25	資本主義殺人累累——從多佛港悲劇談起.....	《階級鬥爭》
203	6	簡評中共制定「十五」計劃的建議.....	張開
203	8	工人被侵權 維權鬥爭多.....	張開
203	11	中國貿易是「黃禍」？.....	華爾卡
203	12	致中國八大民主黨派的公開信.....	余懷兆

台灣

200	6	台灣大選面面觀.....	軍行
201	7	陳水扁就職後的兩岸關係.....	軍行
202	14	台灣人民的決定必須受到尊重！.....	巴勒特

國際

199	10	世貿會議成為抗議戰場.....	史丹譯
199	11	世貿社會條款與社會反抗.....	霍爾曼
199	16	分離主義運動動搖印尼政府.....	霍理
199	18	印尼婦女勞工領袖訪問記.....	蘭尼
199	20	團結支持東帝汶.....	(轉載) 第四國際國際執委會
199	21	革命二十年後，伊朗學生要求政治民主化.....	巴勒特
199	23	英國政壇再向右傾.....	多納特
199	25	記英國一宗工會鬥爭.....	[英國] 一名罷工工人
199	26	美國總統選舉的首場戲.....	巴勒特
199	32	巴西南里州的重要政治勢力——工人黨.....	莊信
199	33	巴西阿雷格里港的急進左翼政府.....	莊信
199	34	另一次古巴革命.....	厄格紐
199	34	古巴的農業成就.....	謝撥德

總期數 頁數

199	35	資本主義垂死掙扎與無產階級領導層危機（二）..... 《社會主義者行動》
200	17	西雅圖「反世貿組織」運動內望..... 拉文德
200	20	工人是歷史的動力..... 哈爾曼
200	22	慶祝日本廢除外僑指模制度..... T君
200	22	車臣戰爭——俄聯盟民族問題的後遺症..... 索納特
200	24	普京尋求一個「強國」..... 喀魯克
200	27	美國插手哥倫比亞，和平前景暗淡..... 哈特曼
200	29	英國工黨左派改良主義的局限性..... 特爾弗
200	32	資本主義垂死掙扎與無產階級領導層危機（三）..... 《社會主義者行動》
201	15	這是「訊息時代」嗎？..... 羅賓遜
201	17	資本主義的純利潤是來自新經濟？..... 基爾米斯特
201	19	歐盟向世界霸權邁進..... 韋卡曼
201	22	日本警界組織性腐敗現象一瞥..... 高島義一
201	24	克林頓和國會要「挽救」社會保障..... 溫斯坦
201	26	巴基斯坦絨手套內的鐵腕..... 馬奎斯
201	28	德黑蘭的攤牌？..... 阿斯曼
201	29	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資本主義復辟內望..... 庫爾馬諾夫
201	30	俄國資本主義復辟第一時期的終結..... 馬列維斯基
201	31	第五屆研究托洛茨基國際會議..... 霍道尼
201	33	尋訪托洛茨基的出生地..... 霍道尼
202	27	日本又為棄改和平憲法、復行戰爭權力大造輿論..... 高島義一
202	29	駐韓美軍地位協定的現狀..... 趙京譯
202	30	沖繩允許美軍基地存在、讓沖繩從屬及合併於日本的論調..... 國富建治
202	32	不要新的勞動法！..... 全俄保衛現存勞動法行動協調委員會
202	33	俄羅斯的抗議浪潮..... 《工人國際報》
203	24	什麼是經濟全球化？..... 加特
203	26	反全球化青年運動在興起..... 塔利
203	27	捷克反「國基會」峰會前夕..... 《工人權力報》訪問
203	29	世貿組織會嚴重損害你的健康..... 李斯特
203	31	工人階級把米洛索維奇推翻..... 普拉夫錫克
203	34	把塞爾維亞革命推進到底..... 日爾曼
203	36	公元2000年美國大選..... 團結社
203	38	面向未來..... 第9次聖保羅論壇會議宣言
203	39	南韓汽車工人罷工帶來國際團結機會..... 楊萍譯
203	40	讓亞洲成為無核區..... 《達卡宣言》
203	40	有薪分娩假期權利受威脅..... 史丹摘譯
203	41	圓值下跌的國度..... 恩克奈爾

總期數 頁數

203	43	英工黨決定把醫療服務進一步私有化	里斯特
203	44	爭奪利潤 破壞海洋	謝潑德

巴勒斯坦特輯

203	14	巴勒斯坦的反抗	蘭斯
203	16	巴勒斯坦人民爭取獨立之戰	瓦爾肖斯基
203	18	拆解以色列建造的耶路撒冷神話	瓦爾肖斯基
203	20	黎巴嫩局勢新發展	哈達德、霍尼格—柏納斯
203	23	兩千年來反猶太人的謊言	蔚然輯譯

讀後感

199	39	就《「先知」引起的話題》而論	(來論) 馬懷士
201	34	真理在前進中——《失去強制的烏托邦》一文讀後	田友

書評

200	38	《先知三部曲》評介	馬騰雲
201	37	《先知三部曲》評介(二)	馬騰雲
203	46	評增山太助的《戰後左翼人士群像》	通口篤三
203	48	《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	前戈

歷史研究

202	34	斯大林謀害我的生命	托洛茨基
-----	----	-----------------	------

讀書雜記

203	52	歧途與正道(上)	林子
-----	----	----------------	----

英譯

199	42	Corruption and graft in China an incurable disease	Zhang Kai
200	43	Stop repression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dissidents!	Zhang Kai
201	42	Ongoing struggles on the 11th anniversary of June 4 in China	Zhang Kai
202	42	Market economy induces severe industrial hazards	Zhang Kai
203	62	Chinese working class counter infringements on their rights	Zhang Kai

Chinese working class counter infringements on their rights

Zhang Kai

With China launching the market economy, all types of enterprises, in particular the privately owned ones, unabashedly go after profits and squeeze whatever they can from the workers. Infringements of workers' rights have become rampant, and newspapers such as *Workers Daily* or *South Workers Newspaper* have been reporting on workers' petitions to the authorities or even workers' actions. The following is based on these reports.

Infringements on workers' rights are most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1. Irregularities in the employment system. The Labour Law stipulates that labour contracts in black and white should be drawn up between the employer and the employees, with clauses clearly stipulated as to the term of service, nature of work, labour safeguards and conditions, remuneration, and conditions for termination of contract. However, many enterprises now lay off large numbers of workers but at the same time employ labourers coming from the countryside or casual workers. They seldom enter into any labour contract with these workers, and if any labour disputes arise, the workers have no way to safeguard their legitimate rights. Even in cases where contracts have been drawn up, the management refuse to comply with the conditions.

2. Deprivation of the right to employment of large numbers of workers. The "iron bowl" of the past has now turned into "clay bowl" under the Reform. The management has the powers to impose dismissals or retirements in the name of increasing efficienc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no exception. For example, the Geophysical Explorations Institute, a subsidiary of the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Geological Bureau, ordered 260 staff to "collective resignation". Each person was given a one-off compensation of RMB 20,000 (USD 2,500) which meant to release the management of any ties with or insurance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staff. The Institute actually earned profits of RMB hundreds of thousands and even up to a million during 1995-98. After the 260 staff members were sacked, new staff members were recruited.

3. No guarantee of wages. Deferred payment or non payment of wages are common and grave. The *Workers Daily* of 1 Nov 1999 commented that "it is really 'news' to hear that anyone can now receive their wages regularly every month. Whether they are state owned or privately owned enterprises, the prevalent phenomenon is delayed payment of wages. The amount involved is startling." Investigations made by the *Workers Daily* show that even if the enterprises are not running on a deficit, they still defer wage payments and divert the funds to other usages. Some enterprises pay wages in kind – whatever stocks that cannot get sold and stay in the warehouse, so some workers are "paid" clothes or charcoal. Some issue the workers with a blank piece of paper making promises of compensation. Some enterprises, in the name of putting workers on "probation", employ workers at a cheap rate for a short term and then dismiss them when the "probation" period is over.

4. Arbitrary prolongation of unpaid working hours. Many enterprises force workers to overtime work violating the maximum number of overtime working hours allowed by the Labour Law. For example, a big shoe factory in Zhongshan, Guangdong Province, which is run on joint capital from Chinese and foreign investments, had for six months been compelling workers to over time work until midnight, and not even did workers get a holiday on May Day. In Panyu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Xingtai Shoe Factory, also run on joint investments, had workers do over time work for a minimum of four hours every day for over six months. Some enterprises operate on paying the workers not by their hours of work but by tasks, and the standards set by the management force workers to be able to finish them only by over time work.

5. Compulsory deposits, shares or loans. Many enterprises force workers to pay several thousand yuan of deposit or shares, or else they will not get the job or the remuneration. In 1999 alone, in Jilin Province, the Labour Department, with its inspections and interventions, managed to recover for 200,000 workers illegal deposits amounting to 55 million yuan. The newspaper report said that the phenomenon was prevalent and was not specific to any place, and the reasons were that the enterprises used this as a means to amass capital, and their employees, in order to retain their jobs, failed to fight back.

6. Industrial hazards and lack of safety precautions. Labour casualties are high, since the management does not care for safety measures and workers are prone to accidents due to their fatigue after long hours of intensive work. Though required by law, most enterprises are reluctant to buy labour insurance for the workers. As at the end of 1999, only an average of 37.5% of workers were insured.
7. Violation of personal safety of the workers. There have been occasional reports on how enterprises conduct illegal body search, abuse and assault on workers. In Guangzhou, one enterprise had a wounded worker put under illegal detention for over a month for fear that the worker would complain against his industrial accident.

Why are such phenomena so rampant? The reasons include:

1. The enterprise management hold absolute power over employment or dismissal of workers, and the large "reserve army" causes workers to tolerate harsh working conditions and remuneration.

2. The government laws are inadequate and are more protective of the management than of the workers.

3. Many officials are keen on developing their local economies and are prejudiced towards the investors.

4. Many enterprise unions compromise with the situation, and workers do not get support from the union.

Yet, compelled by the worsening situations, workers have no choice but to fight back, either by strikes or protests, or by taking the management to court. For example, in Beijing, 5,234 such court cases for 1999 increased by 64.2% over 1998. Of these, collective labour dispute cases numbered 242, an increase of 78.5% over the preceding year. A suburban county of the Beijing District witnessed an increase of labour disputes of 5.7 times from 1995 to 1999. The Shanghai Labour Bureau statistics also yield similar trends, that labour disputes were increasing by an annual rate of about 30%. The labour disputes in Beijing in 2000 also sounded alarm: the first six months saw dispute cases and involved workers around delayed wage payments increase by 120.37% and 118.1% respectively over the same period in the preceding year.

Due to censorship, newspaper reports of workers' strikes and protest actions are limited. According to *China Labour Bulletin*, there had been increased strikes and sit-ins since 1999. Some recent actions in 2000 included a sit-in strike of 1,000 workers of Arsenal Factory 3508 in Chengdu starting from July 10, 2000, demanding satisfactory dismissal terms for the workers when the factory closed down. On August 5-6, over 1,000 workers and family from the state-owned coal mining company blocked the traffic and demanded sufficient livelihood subsidies. 6 organisers were arrested. On September 25, 500 workers from a state owned steel factory in Yunnan Province blocked the railway linking Chengdu and Kunming, in protest of a rumoured dismissal of workers. The waves of worker protests are prompted by the worsening conditions, and they cannot be simply contained by high-handed measures.

25 November 2000

HONG KONG

- 2 Revise the notorious Public Order Ordinance! Jun Xing
3 From legco election to selection of SAR Chief Zhen Yan
4 Government and big business squeeze hard on citizens Wei Bo
6 Can the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protect you? Chen Ying

CHINA

- 6 On CCP's drafting of the 15th Plan Zhang Kai
8 Chinese working class counter infringements on rights Zhang Kai
11 China trade, the Yellow Peril? C.Walker
12 Open letter to 8 Chinese democratic parties Yu Huaizao

SPECIAL ON PALESTINE

- 14 Rebellion in Palestine R.Rance
16 The Palestinian war of independence has begun M.Warschawsky
18 Myth and demystification M.Warschawsky
20 A tremendous victory Haddad, Honing-Parnass
23 2000 years of anti-Jewish lies (tr) Wei Yan

INTERNATIONAL

- 24 What is globalisation? M.Gatter
26 A stunning success J.Tully

- 27 Mobilising for Prague *Workers Power* interview
29 WTO can seriously damage your health! J.Lister
31 Serbia erupts in revolution D.Plavsic
34 The revolution has to continue L.German
36 US Election: for independant politics *Solidarity*
38 *Facing the Future* *Sao Paulo Forum* Declaration
39 Korean auto strike (tr) Yang Ping
40 For a no-nuke Asia Dakka Conference
40 Maternity leave in danger (tr) Shi Dan
41 Japan: land of the falling Yen D.McNeill
43 UK: Is Labour set to privatise more health care? J.Lister
44 Race for profits is destroying oceans R.Sheppard

BOOK REVIEW

- 46 On *Portrait of the Post-war Japanese Left* (1) Tsunoguchi
48 On *Selected Works of Zheng Chaolun* Qian Ge

STUDY NOTES

- 52 The right path and the wrong path (1) Lin Zi

ARTICLE IN ENGLISH

- 62 Chinese working class counter infringements on rights Zhang Kai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27卷 第5/6期 (總第203期)

2000年12月31日出版

出版人：十月書屋

編輯：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督印人：陳昌

地址：九龍觀塘敬業街65號敬運工業大廈14樓N座

電話：9846 3428

傳真：2346 5268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電郵地址：or@earthling.net

Address：G.P.O.BOX 10144, HONG KONG

Tel.No.：(852) 9846 3428 Fax：(852)2346 5268

E-mail Address：or@earthling.net

【十月評論內一切具名文章，並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承印：藍馬柯式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鰂魚涌華蘭路十四號

益新工業大廈16字樓C座

電話：2563 1068

定閱：(本地) 每年港幣八十元

(外地) 平郵：每年US\$15

空郵：亞洲US\$18

其他US\$22

Subscription Rates:

Hong Kong: HKD\$80 per year

Overseas Surface Mail: US\$15 per year

Air Mail (Asia): US\$18 per year

Air Mail (Others): US\$22 per year

目錄

香港	2	公安惡法 必須修改!	軍行
	3	從立法會補選談到特首的推選	振言
	4	官商加強壓榨 市民苦上加苦	微波
	5	強積金可以保障你嗎?	(轉載) 陳瑩
中國	6	簡評中共制定「十五」計劃的建議	張開
	8	工人被侵權 維權鬥爭多	張開
	11	中國貿易是「黃禍」?	華爾卡
	12	致中國八大民主黨派的公開信 (來論)	余懷兆
巴勒斯坦 特輯	14	巴勒斯坦的反抗	蘭斯
	16	巴勒斯坦人民爭取獨立之戰	瓦爾肖斯基
	18	拆解以色列建造的耶路撒冷神話	瓦爾肖斯基
	20	黎巴嫩局勢新發展	哈達德、霍尼格—柏納斯
	23	兩千年來反猶太人的謊言	蔚然輯譯
國際	24	什麼是經濟全球化?	加特
	26	反全球化青年運動在興起	塔利
	27	捷克反「國基會」峰會前夕	《工人權力報》訪問
	29	世貿組織會嚴重損害你的健康	李斯特
	31	工人階級把米洛索維奇推翻	普拉夫錫克
	34	把塞爾維亞革命推進到底	日爾曼
	36	公元2000年美國大選	團結社
	38	面向未來	第9次聖保羅論壇會議宣言
	39	南韓汽車工人罷工帶來國際團結機會	楊萍譯
	40	讓亞洲成為無核區	《達卡宣言》
	40	有薪分娩假期權利受威脅	史丹摘譯
	41	圓值下跌的國度	恩克奈爾
	43	英工黨決定把醫療服務進一步私有化	里斯特
	44	爭奪利潤 破壞海洋	謝潑德
書評	46	評增山太助的《戰後左翼人士群像》	樋口篤三
	48	《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來論)	前戈
讀書雜記	52	歧途與正道(上)(來論)	林子
總目錄	58	2000年總目錄	
英譯	62	Chinese working class counter infringements on their rights ...	Zhang Kai